

目 录

走上革命的道路·····	(1)
向毛委员汇报·····	(8)
三月暴动·····	(17)
敌人反扑·····	(24)
井冈山失守前后·····	(32)
重整旗鼓,坚持斗争·····	(39)
东、西边山的艰苦岁月·····	(43)
蔡会文、方维夏英勇牺牲·····	(49)
潭湾会师·····	(54)
与敌周旋于东乳山区·····	(58)
游击队改编开赴抗日前线·····	(64)
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	(68)
两次去南方局汇报和学习·····	(74)
韶山的斗争·····	(81)
几支游击队·····	(86)
南下支队在湖南·····	(91)

向中原局和上海分局汇报	(98)
世纪社和湖南大学学生运动	(105)
农村武装斗争	(113)
统一战线与湖南和平运动	(122)
促进程潜、陈明仁起义	(132)
开展反白崇禧的斗争	(142)
华中局的重要指示	(151)
和平解决湖南问题	(159)
迎接解放	(168)
周里简历	(174)
后记	(179)

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2年，我在酃县第二高级小学第九班毕业后，报考了设在衡阳的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当时师范学校有优越性，一是教员比较好；二是学生不交学费、伙食费；三是毕业后当教员是个“铁饭碗”。因此报考的人很多。“三师”在湘南24个县招生，名额有限，不管多少人报考，大县只录4名，小县只录2名。酃县是小县，每年报考“三师”的有五、六百人，只录取2名，考生竞争很激烈，还时常发生考试舞弊的事。

我读高小时，每学期成绩都在前三名，考“三师”是有几分把握的。在县里预考，我的成绩是第一名，小学教员黄元吉的儿子是第二名，第二名的姓名忘记了，县督学周炎卿的儿子周海清是第四名。如果我们去“三师”复试，周海清会考不赢我们。周炎卿在县里是监考，便利用职权，将我们前三名考生的试卷抽掉，让儿子周海清去“三师”复试，录取了。我们愤愤不平，闹到主考的县知事那里。可是县知事庇护周炎卿，我们没有闹出结果来。

1923年，我在长沙道南中学读了一期书后，因交费太多，家里经济困难，又想去考“三师”，可是又怕试卷被周炎卿抽掉。这和我们周姓两个房族闹宗派斗争也有关系，学阀周炎卿和讼棍周德玉是一房的，我们是另一房的，他们经常欺侮我们这一房。他们又是劣绅，称霸城乡。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叫周策海，上次考试找县知事闹过事，很可能又不让我投考三师”。怎么办？我找

读小学时的教员黄元吉商量。他帮我出了一个主意，要我改名周礼。他说：“周炎卿不知道你改了名字，就不会与你为难了。”于是我用周礼的名字再次报考“三师”。在县里预考初取15名。我在县里预考第一名、“三师”复试又是第一名录取了。

我进“三师”是第28班学生。当时“三师”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有许多进步的教员和学生。学生会很活跃。我和一些同学在接受革命思想之初，还只讲爱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帝国主义。1925年5月15日，上海的日本资本家枪杀罢工的纱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10余人。28日，青岛日本海军陆战队枪杀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8名，枪伤、拘捕数十人。30日，上海又发生英国巡捕逮捕声援工人斗争的学生百余人，随后开枪打死打伤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的群众数十人的“五卅惨案”。这时我们积极响应党号召的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参加了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当时的湖南省长、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已经依附直系军阀吴佩孚，在长沙镇压群众运动。他部下驻衡阳的第四师师长唐生智为爱国将领，还能顺应潮流，因此衡阳掀起了反帝高潮。

1925年6月6日，衡阳成立“湘南青沪惨案雪耻会”。8日，举行了数千人的游行示威，并罢工、罢课、罢市一天。游行时我们走在学生队伍前面，高喊“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不买英日货”等口号。我们还到湘江码头上去检查“洋船”，抵制英国、日本的货物。

学校里的共产党员发现我们这些积极分子，便介绍一些进步书刊给我们看，引导我们走革命的道路。23班有个酃县同乡同学刘寅生，是在学校入党的，任“三师”党支部书记、湘南学联负责人。他介绍我看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和《向导》等进步书刊，经常和我谈革命形势、革命道理和共产主义的

理想、前途。他是第一个对我进行革命启蒙的共产党员。

我和一些同学还参加了夜校工作。“三师”的工人夜校，是毛泽东同志 1921 年和 1922 年两次来“三师”讲演和指导革命活动后，党组织遵照他的指示办起来的。夜校吸收校工和附近农民入学，教他们识字、读书、打算盘，讲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

当时农民运动正如暴风骤雨般地兴起，农民协会有权力有武装，要打倒土豪劣绅和反动势力。吓得一些大土豪劣绅逃往上海、汉口，中等的土豪劣绅就躲到长沙、衡阳。这场革命运动对我教育很深，促使我接受马克思主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夜校，我们就讲田、土是农民开的，稻谷是农民种的，为什么农民缺吃少穿，贫穷困苦；地主不劳动，为什么吃得好，穿得好，有钱有势；以及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的。从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阶级剥削和压迫，讲到工农要翻身，工人就要参加工会，农民就要参加农民协会。用“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折不断”的比喻，说明工农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力量就大了，就能打倒土豪劣绅和剥削阶级。通过夜校，联系实际讲革命道理，教育和发动工人、农民参加革命的群众运动。

在“三师”，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很激烈。1923 年曾发生驱逐反动校长刘志远的大学潮，50 多名学生被开除，教员、共产党员张秋人被迫离校。1925 年彭德芳任校长，他是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派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共产党，很反动。1926 年，“三师”又发起倒彭运动，我们把他赶走了。教员蒋啸青是共产党员，我们推举他当了校长。

大革命时期，“三师”广大师生拥护国共合作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拥护广州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北伐，支持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支持讨吴（佩孚）驱赵（恒

惕),支持新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率部北伐,革命气氛非常热烈。1927年“马日事变”后,革命运动处于低潮,蒋啸青和一些共产党员也被迫离开了学校。蒋啸青是我们的好校长,耒阳人,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时在耒阳牺牲,同时被害的还有他的儿子蒋乐群、亲弟蒋次青、堂弟蒋式麟,都是“三师”学生、共产党员,一门英烈。

我在“三师”读了三年书,刘寅生要我去长沙国民党湖南省党校学习。当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6年北伐军占领了湖南。1927年3月在长沙筹办了一所国民党湖南省党校,培训党务、农运和军事干部,实际上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合办的党校。刘寅生知道我的思想进步,有入党的要求,就介绍我报考这所党校。省党校在全省招生,我就在衡阳报考。考试科目为政治、国文、常识,还有口试和验体格。口试主要是招生人员找我们每个考生谈对形势和革命的认识。一位招生的同志和我谈话后,感到满意,马上告诉我:“你考得不错,有希望。”以后榜上果然有名。4月初,我们被录取的学生一起从衡阳坐轮船到长沙,去党校报到入学。

党校设在长沙市又一村教育会坪原省立第一中学,有政治、农运等班,我在政治班学习。全校有男女学生800多人。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智兼任校长,当时他随北伐军到汉口去了。副校长凌炳是国民党左派,不久加入共产党。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夏曦和党员谢觉哉、戴述人等都是省党校委员会委员。谢觉哉任秘书长,李达任教务主任。讲课的老师许多是共产党员。夏曦、易礼容讲农民运动,郭亮讲工人运动,谢觉哉讲党史,李达讲哲学,还有讲妇运、青运和军事的。学生穿蓝色制服,佩符号,女生剪短发。早晨出操,半天学政治,半天学军事。党校只办了一个多月。国民党第三十三团反动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的“马日

事变”后，党校就被迫停办了。

那是5月21日晚上，星光黯淡。我们入睡后，突闻枪声四起。大家不知出了什么事，惊慌中纷纷往外跑。一些学生冲出校门时，遭到机枪扫射。校门出不去，许多学生又集结到校内操场。我和一些同学踏着围墙边的一堆杉树，爬墙跑出。我跑进水风井附近的一条小巷子，到了一个卖小菜的老百姓家里。他是客家人，听到我讲客家话，又是逃难的学生，就留我在他家住宿。第二天，我要他的儿子去党校门口打听一下情况。他儿子回来告诉我，党校门口有卫兵站岗，许多学生进进出出，搬走被包箱子。我便向这家人道谢，回到党校。卫兵看到我是学生，也没有阻拦。走进学校后，只见一些门窗捣烂了，到处乱七八糟，许多学生的箱子被子钱物被官兵抢走了。我睡的是上铺，被子还幸存铺上。一些回校学生纷纷议论，说省工会、省农会被打死了人，抓走了人。他们匆匆拿着行李走了。这时党校已被宣布取缔，我也拿了行李，去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乡学生黎育教和刘平章那里住下。

到“一师”后，黎育教、刘平章和我一起分析时局，认识到大革命形势已经发生变化，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攻占上海、南京后，首先是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屠杀。反动军官夏斗寅、许克祥也先后在湖北、湖南发动反革命叛乱。当时一片白色恐怖，长沙更是乌云密布，腥风血雨，反动派气焰嚣张，连日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我在“一师”住了几天，有个晚上也遇到敌人来搜枪抓人。

有一天，黎育教对我说：“现在长沙党的机关、工会、农会都被破坏了，全省反动派到处抓人杀人。我的党员身份公开了，在湖南站不住脚，要到汉口去找党组织。你打算怎么办？怕不怕？”

还干不干？”我说：“怎么不干，坚决干，砍脑壳也不怕，革命到底！”他又问刘平章干不干，刘平章也说干。黎育教说：“对，就是要干，要革命。你们就回鄱县去，秘密恢复农民协会，三三两两，从小到大地发展农会组织。以后我们再联系。”

5月底，我便和刘平章一起回鄱县。刘平章回到五都两江口家里，我回到七都凉桥家里，隐蔽地做发动农民的工作。

那时鄱县也到处是白色恐怖。党的负责人有的被捕，有的逃散，鄱县特别支部书记李却非下落不明。农民协会被取缔，农民自卫队的枪支被缴。省农会特派员、共产党员朱子和等同志被敌人杀害了。我回家后，发动贫雇农周策长、周策勉、谢祥福等五六人，组织了一个农会小组。7月间发展到3个小组。同时，我和五都的刘平章、九都安坑的姚晓园等都有密切联系。

7月下旬的一天，忽然黎育教和邝光前一道来到我家。黎育教说：“汉口汪精卫和蒋介石一样叛变革命了。我在汉口站不住脚，就回鄱县了。”他问我工作做得怎么样。我汇报了发展农会小组的情况。他高兴地说：“你胆子大，搞得不错。我们要把秘密农民协会搞起来，继续干。”在谈论当前形势的时候，我们认为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叛变不是偶然的。他们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投降帝国主义，必然反共反人民。我说：“反动派到处屠杀革命者，但是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革命者的鲜血决不会白流，反动派的日子长不了。剥削阶级一定会被消灭，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黎育教和邝光前看到我工作积极，对革命满怀信心，又知道我早就申请加入共产党，在党校还填了入党志愿书，因为“马日事变”没有来得及办入党手续，他们就在我家里介绍我加入共产党。黎育教领我念了入党誓词：“阶级斗争，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纪律，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他说：“阶级斗争，努力革命，就

是要把工人、农民发动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为实现共产主义，不怕牺牲个人。要坚决服从党的纪律，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不讲价钱。要严守党的秘密，对自己的父母妻子都不能讲。随身要带火柴、小刀，遇到危险，就用火柴烧秘密文件，拿刀子和敌人拚。”

我入党后，就由黎育教、邝光前和我组成一个临时党支部。黎育教要我当支部书记。我说：“我是新党员，怎么好当支部书记？”他说：“我和邝光前太红了，许多人知道我们是党员，本地如果呆不住，还会要走的。别人不知道你是党员，你可以隐蔽下来，秘密开展工作。支部书记还是你来当吧！”

有了党的领导，我们更加积极地宣传党的革命主张，发动群众，发展党员，恢复农民协会。我首先在凉桥农会小组中吸收贫农周策长、周策勉、谢祥福等入党，继续发展农会组织。我又介绍“三师”同学刘平章、姚晓园、张平化等入党，要他们都做发动农民、恢复农民协会的工作。我还联系了西乡的段凤、段瑞等，恢复了西乡的农民协会。于是，农民运动又在酃县各地发动起来了。

向毛委员汇报

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队伍到了宁冈。我们支部几个党员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兴奋，都说，毛委员要是能够来酃县领导我们起义就好了，农民运动又可以轰轰烈烈地搞起来。

10月中旬的一天，我在杨溪湾同学廖珩家里，看到一支队伍从对面树坳大路上过身，往水口方向走去。我赶上去一看，军旗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还有斧头、镰刀的标记。这不就是我们盼望的秋收起义队伍来了吗！我高兴地赶回凉桥，找了周策长等几个党员商量怎么办。我是支部书记，大家要我去接头，汇报、请示工作。凉桥离水口40多里路，第二天天刚亮，我吃了早饭，朝水口走去。在快到水口的路上，我遇见一支队伍，就问：“你们是工农革命军吗？我找你们的负责人。”一位同志说：“是的。你找负责人，到前面团部去问吧？”路上又碰到一位高个子军人，他看到我是学生样子，问道：“你们这里办了农会吗？”我说：“农会都被反动派取缔了。”他又问：“还有没有共产党员？”我说：“我就是呀！我们党支部要我来找你们部队负责人汇报哩！”他问了我的姓名，我也问了他的姓名（后来忘记了）。接着他又问：“你知道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吗？”我说：“听说毛委员在浏阳，平江一带领导了秋收起义，要是来我们酃县就好了。”他一笑，说：“好吧，我带你去见一位负责人。”

高个子军人带我到水口朱家祠，团部就设在这里。祠堂里摆了一张四方桌子、两条长板凳，一位30多岁、高身材、穿便服的同志坐在一条凳上，正在握笔办公。高个子军人向那位同志介绍：“这是周礼同志，酃县的党员，来找组织关系，汇报支部工作的。”又对我说：“这就是毛委员，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马上起身亲切地和我握手，招呼我坐在旁边那条凳上。

毛泽东同志问：“你在哪里读过书？”我说：“在衡阳三师28班。”他又问：“你们这里还有支部？”我说：“是马日事变后秘密成立的临时支部，我是支部书记。开始三个党员都是长沙回来的学生，以后又发展了几个农民积极分子入党。”他接着问：“原来的党员呢？”我说：“有的被抓，有的被杀，有的跑了，特支书记李却非不知去向。”

我接着汇报：“省农民协会的特派员朱子和同志，是湘潭人，被反动派枪杀了。农民自卫队几十支枪被收缴，农会也都解散了。我们在七都、五都、八都、九都恢复了几个农会小组。”毛泽东同志说：“你们还搞了这个，很好！就是要把农民协会恢复起来，先找那些受剥削最重，受苦最深，对土豪劣绅最恨的农民参加。”

当我汇报找了一些学生做工作，还发展了几个学生入党时，毛泽东同志说：“知识分子活动能力强，起桥梁作用，干革命要有知识分子。但是我们主要依靠工农。农民是农村里的主力军，要多找满脚泥巴、满脚牛屎的农民做朋友，把他们发动起来革命。”又说：“你算算看，农村里是地主多还是农民多，谁的力量大？就说你的家乡，有多少土豪劣绅，又有多少农民呢？”我回答：“劣绅有周德玉、周炎卿，还有几个地主。农民占绝大多数。”他说：“是嘛，你们把那些农民组织起来，力量就大了，就可能把土豪劣绅打倒。”

谈话中，有人送来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毛润之同志收”。这

时我才知道毛泽东同志又叫毛润之。毛泽东同志看完信后，又问我酃县敌人的情况：我汇报酃县现在没有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南乡和东乡有挨户团，南乡挨户团头子叫陈大观，有30多条枪；东乡挨户团头子叫贾少隶，缴了农会自卫队一些枪，共有七八十条枪。

毛泽东同志听完我汇报后，向我谈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他说：“由于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以及我们党内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使这次大革命遭到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目前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工作十分艰苦，但是要看到光明和希望，要看到敌人内部矛盾重重，要看到受剥削、受压迫的工农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敌人在农村的力量比较薄弱，我们要发动农民，恢复农会，搞武装斗争。”他还说：“革命就要不怕杀头。现在到处是白色势力，你们还搞共产党，办农会，这就不错嘛！你们在酃县要发展党的组织，要放手发动农民办农会，要敢于向土豪劣绅作斗争。农民不组织起来，一盘散沙是不行的。组织起来还要搞武装，先搞梭标鸟枪，再夺敌人的枪，我也可以给你们发几根枪。”

接着，毛泽东同志又问酃县的地形，要我详细画个图给他。我对一些地方不熟悉，画了一半就画不下去了。我说：“我画不全面，我去找一张现成的酃县地图来好不好？”他点点头说：“那更好。”于是我同高个子军人到朱家祠小学校，找到一张旧的酃县地图给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又要我给部队找一个向导。我说回去找一个党员来。他又要我留下通讯联络地点。我说可以通过我岳父家联系，地点是黄挪潭乡苦菜冲刘家俊家里，刘家俊是我爱人的弟弟，他家离我家只有10里路。写下联络地点后，我便向毛泽东同志告辞回去。

高个子军人送我到门口时说：“还交给你一个任务，你到茶

陵去侦察一下敌人的情况好吗？”我说：“好，明天就去。”当天我赶回凉桥。

回家后，当晚我就向支部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随即找了党员刘清黎到部队去当向导。我又邀党员周策长一道去茶陵探听敌人情况。他经常帮人去茶陵挑运货物，对茶陵比较熟悉。

第二天，我和周策长清早动身。到茶陵有两百来里路，走了一天多，下午到达茶陵县城。我们找了住宿的伙铺后，就到茶馆里去喝茶。茶馆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是传播新闻的地方。这时喝茶的人多半是谈“清乡”的事。我们打听到湘东清乡司令罗定即将带领 1000 多人，兵分两路，一路走酃县西乡，一路走酃县县城，“进剿”工农革命军。

我们探得消息后，赶快回酃县，向团部的高个子军人汇报了这个情况。当晚我住在水口。第二天吃过早饭，动身回家时，听到吹集合号，部队准备出发了。高个子军人告诉我，毛泽东同志说：“罗定人多，这次不跟他打，他来，我们就走。”

后来听说，毛泽东同志带来水口的一团人，只有七八百人枪，走的时候也是兵分两路。一路由一团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一连人急行军，经船形往安仁，转过去打茶陵县城，掏罗定的老窝。一举攻破茶陵县城，缴了几十条枪，还打开牢门，救出了被监禁的“政治犯”和受难的老百姓。部队当天撤出县城，经和尚庄去江西宁冈，上井冈山去了。另一路由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经八都、下村，折向江西遂川的大汾圩，遭到地方反动地主武装肖家壁部袭击。于是部队又分两路，三营由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带领往桂东一带活动，毛泽东同志带领团部和其余部队经黄坳、荆竹山上了井冈山，在大井和当地的王佐部队会合。

湘东清乡司令罗定正带领部队气势汹汹地进入酃县，扬言

要“剿灭”工农革命军时，突然听说工农革命军攻占了茶陵，大吃一惊，马上掉转屁股往回跑。当他带领喽罗兵回到茶陵县城时，工农革命军已经撤走了。

11月中旬的一天，我到井冈山去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工作，听说毛泽东同志穿草鞋磨烂了脚，没有见到他，见到了宛希先向他汇报工作后，宛希先要我再去茶陵侦察敌情。我又回家邀了周策长一起去茶陵，了解到茶陵敌军人数不多等情况。我向宛希先汇报后，工农革命军第一营立即突袭茶陵，打败罗定部队，第二次攻占了茶陵县城。11月28日，成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任主席。

那次我在水口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后，毛泽东同志给湘南特委写了信，要特委派人加强酃县工作的领导，并将我的联络地点告诉了特委。11月间，从衡阳来了一个姓欧阳的工人，找到我岳父家，说要找周礼。我岳母问他：“你找周礼有什么事？”他说：“我在衡阳开饭菜馆子，周礼在我那里吃饭欠了帐，我是来找他讨帐的。”我岳母不相信，就说：“周礼不在这里，不晓得哪里去了。”那个同志没有办法，只好走。路上碰到乡丁，盘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还是说找周礼讨帐的。这时恰好刘寅生的哥哥、打入黄挪潭乡公公所做工作的地下党员刘承向来了，对乡丁说：“他是讨帐的，莫管他。”乡丁走后，刘承向问那个同志：“你找周礼到底有什么事，同我讲不要紧。”那个同志说：“有人托我给部队送信，说要找周礼才晓得地方。”刘承向马上托人告诉我这件事。我知道是湘南特委派人来送信给毛泽东同志的，就要周策长把他送上井冈山去了。

1927年冬，黎育教和毛泽东同志的弟弟毛泽覃（参加过南昌起义），一起来到我家。毛泽覃是朱德同志派他去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联系的。我立即派周策长送他们上井冈山。

不久,李却非也找到我家来了。他在“马日事变”前是共产党的酃县特支书记,又是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事变后离开酃县了。这次从长沙回来,要去找部队。我又陪他一起上了井冈山。这时毛泽东同志外出了,见到宛希先。李却非拿出一张白纸,说是省委的介绍信。信是用五倍子水写的,用明矾水一浸就显出字来了。宛希先问:“省委有什么指示?”李却非说:“省委现在的方针是暂时停止发展党员。”宛希先眉头一皱说:“哪有什么停止发展的方针。”他把我叫到另一间房里,问我:“你认得他吗?他是党员吗?”我说:“认得,反革命事变前见过,他是酃县特支书记。”宛希先这才放心,但是不赞成停止发展党员。李却非当时留在部队工作。我回家后,仍然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

不久,湘南特委派特委委员刘寅生来了。他原在耒阳担任县委书记,这次是派来酃县加强党的领导的。那天我去羊角岭黄元吉家,在羊角岭附近路上碰见他,他后面跟随一乘空轿了。我们见了面,都高兴极了。他告诉我,他是从湘南特委那里来的,因为酃县水口一带认得他的人多,怕暴露,所以请两位同志抬轿子作掩护,经过水口一带时就坐在轿子里不出面,这次回酃县,也只能隐蔽活动。他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就到这里黄元吉家。他说和我一起去,转过身,就将藏在轿杠里的文件拿出来放进口袋,并要两位护送他的同志转回去。在黄元吉家,我向刘寅生汇报了工作。晚上,他就秘密地回到不远的下坪自己家里去了。

刘寅生回酃县后,工作进一步开展了。我和他一起到了南乡、东乡、西乡(酃县没有北乡),发展党组织,指导各地恢复农民协会,搞农民武装。一些进步学生知道我在水口和工农革命军接了头,听说“周礼来了”,就主动来找我,要求参加工作。我们在西乡找到段瑞、段凤等党员,成立了支部。党员潘祖浩也在潘家圩

一带积极开展工作。西乡和十都青石岗等地工作进展较快，发展了农会，正在组织农民武装，作暴动的准备。

中村的周介甫是到我家里来找我的。他原先办过农会，和我们联系后不久入党，工作积极，中村一带很快恢复了农会，打开了局面。张平化也是这时入党的，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在我家屋后山棚里举行的入党仪式。那次还有两个农民入党。刘寅生讲了话，勉励他们发挥党员作用，努力革命。

1928年1月，我们计划把南乡挨户团的30多条枪搞过来，作暴动准备。那天按照约定的时间，何国诚、何史良从龙潭来，经过中村时邀了周介甫，路过大塘时邀了刘先觉，一起到羊角岭黄元吉家吃了中饭，又一起到黄挪潭我家开会。我们商量，南乡挨户团队长陈大观是个文人，不懂军事，过了旧历年在水口开会改组挨户团，我们推选何国诚当指导员，把枪杆子抓到手。何国诚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他父亲是南乡大士绅何鼎臣。何鼎臣和实际操纵南乡挨户团的大豪绅李芝是好友，推选何国诚当指导员，估计李芝和一般豪绅都会同意。

可是事机不密，打醮坪的劣绅张少棠、张济昆通过刘先觉的堂兄弟刘仁报讯，知道刘先觉在黄挪潭开了会，便告诉了挨户团队长陈大观。他们把刘先觉抓到打醮坪学校里审问。刘先觉是个胆小鬼，经不起威胁利诱，一五一十都讲出来了。劣绅们审出搞枪密谋，惊慌失措，凶相毕露，议定旧历除夕晚上，带挨户团将参加黄挪潭秘密会议的人，一个一个抓起来杀掉。陈大观不敢作主，去请示李芝。李芝考虑到其中何姓二人都与何鼎臣有关系，何国诚是他的儿子，何史良是他的堂弟，何鼎臣不会同意杀人的。他便于旧历12月30日下午，请了何鼎臣和南区区长何国瀚等几个豪绅来他家开会商量。会上分了两派，一派以反动区长何国瀚为首，主张“都要杀掉，一网打尽，以免后患”；一派以何鼎臣

为首，提出“年轻人误入迷途，不可不教而诛”，反对杀人。最后李芝说：“今后各家子弟，由各家长严加管教好了。”因此当晚便没有抓人杀人。李芝的二媳妇刘仲寰是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也是共产党员，知道这些豪绅开会研究杀人的事，便请人连夜送信告诉我。我立即通知大家注意隐蔽，春节后再计划新的行动。

这时全县党支部和农会都发展较快，我们准备成立酃县特别区委，领导全县工作。当时找湘南特委请示比较困难，刘寅生便上井冈山去找毛泽东同志请示。毛泽东同志随部队到别处去了，没见到，刘寅生留下一封信就回来了。2月春节后，刘寅生又和我去井冈山找毛泽东同志汇报、请求指示工作。天气还冷，我和刘寅生都穿着棉袍子。走到下井，见到何长工同志，他是新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的党代表。这个团是由井冈山当地称“绿林好汉”的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改编的，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告诉我们，毛泽东同志带第一团到遂川县的黄坳去了，此去有几十里路。我们便请了当地一个老百姓带路，天黑赶到黄坳，在城隍庙里见到了毛泽东同志。

我向毛泽东同志介绍：“刘寅生同志是湘南特委派来的。”毛泽东同志亲切地和我们握了手，说：“我已经看到刘寅生同志的信了。”刘寅生说：“我们是来汇报请示工作的。”毛泽东同志说：“你们走累了，明天再谈，今晚就睡在这里吧！”

我和刘寅生都是穿的草鞋，沾满泥土，洗脚睡觉时，毛泽东同志从里面房里拿了一双布鞋给刘寅生，接着望了我一下说：“你也没有鞋子换。”又从房里拿了一双布鞋给我。我们洗脚后，随着毛泽东同志走进里面小房间。房里矮桌上点了一盏桐油灯，两旁有两张床铺，一张是老百姓的挂了帐子的铺，毛泽东同志睡的；一张是临时搭的木板子铺，已经睡了一位同志。毛泽东同志

指着靠墙角挂帐子的铺对刘寅生说：“你睡那角角里。”又对我说：“你和那位同志搭铺。”毛泽东同志也是穿的长袍子，一起脱衣睡觉时，他还问刘寅生多大年纪，哪年入党，在“三师”哪个班读书。刘寅生说他 24 岁，1924 年入党，在“三师”是 23 班学生。第二天起床时，我又把草鞋穿上，想把布鞋还给毛泽东同志，可是鞋子不见了。原来鞋子是同床那位同志的，他早起后穿走了。

这天上午，我们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酃县工作情况。毛泽东同志说：“你们发展了党组织，恢复了农会，工作有了基础，可以准备武装暴动了。部队 4 月间到酃县来，配合你们暴动。”他批准我们成立酃县特别区委，刘寅生任书记，邝光前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我们临走时，毛泽东同志还给了我们 100 块银元，做工作费用。

从黄坳回酃县后，我们在黄挪潭乡下坪刘寅生家开了特别区委会。这时全县已发展到 10 多个支部，党员 100 多人，农民协会发展到上万人。特别区委研究了暴动计划，准备 3 月下旬全县举行武装暴动。

三月暴动

酃县 1928 年的 3 月暴动，是酃县农民运动中的一件大事。这次暴动，是在毛泽东同志指导下，在工农革命军的支持和配合下举行的。农民暴动如火如荼，遍及东南西三乡，参加暴动人数达 3000 多人，在酃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酃县特别区委于 2 月中旬在下坪开会，作出全县暴动计划后，区委委员就分工到各乡支部部署工作，要求各地充分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农民武装，作好斗争当地土豪劣绅的准备，3 月下旬全县东、南、西乡同时举行暴动。刘寅生和我走南乡水口、中村，经船形、塘田去西乡，一路上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传达到各支部，积极组织暴动。在西乡路上碰到段凤，他留我们住在他家里，把支部书记段瑞找来，一起研究了西乡暴动工作。

这时黄挪潭刘承向派人来西乡找到我和刘寅生，说毛泽东同志派戴奇、邱笛来黄挪潭了，有急事要我们赶快回去商量。我和刘寅生马上改走近路回黄挪潭。

我们经过酃县县城时已经天黑，为了避开岗哨，就抄小路从湘山寺翻山而过。山上林密草深，又下着大雨，我们穿的又是长袍子，眼前黑糊糊的，连连摔交，爬不上去。我们只好回头走接龙桥，沿着山边转过来，经过城外画眉桥上大路，走山路，一个通宵走了几十里。第二天上午赶到下坪榨树下刘寅生家里，见到了戴

奇、邱笛。

戴奇是东乡人，“三师”同学，在部队任连党代表。他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说部队提前在3月中旬来鄞县，暴动也要提前，在部队到达鄞县之前行动，否则部队一来，土豪劣绅逃跑了，打土豪就找不到斗争对象了。于是我们决定暴动提前在3月上旬举行，工农革命军来后，各地暴动武装再与部队会合。当时分工：我指挥十都、九都、七都，邝光前指挥八都，刘平章指挥五都，段瑞等指挥西乡，周介甫指挥中村，邝远暄指挥茅坪，朱才亮指挥水口，刘清黎指挥泥湖、板溪，刘承向指挥黄挪潭。随即通知各地负责人，速作准备，同时举行暴动。

特别区委重新计划和部署全县暴动后，我到了九都的石洲、安坑，住在安坑一户农民家里。随即找张平化、姚晓园等开会研究工作，分头发动组织农民武装，在一个晚上同时暴动打土豪。石洲有个劣绅张少文，他和东乡团防局头子贾少隶（外号“贾屠夫”），打成一片，很反动，是个恶霸，我们决定先拿他开刀。这天晚上暴动时，张平化没有来，我和姚晓园带领200多人，打着红旗，手拿梭标、大刀、鸟枪，悄悄包围了张少文家。首先派人去敲门，说是送信的。他家始终不开门。我们便冲开门进去，要抓张少文，可是搜了半天也没有搜出来。原来张少文看情况不妙，躲在楼上天花板里，我们没有搜到，他就漏网了。当晚我们打开他家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

暴动迅速在全县各地掀起。邝光前、肖冒范、杨以达等在一村成立暴动队，打了肖冒其等土豪。朱才亮等在水口组织暴动，二三百农民围攻大土豪李芝的家院，抄了他的家。刘平章在两江口组织了暴动。西乡虽然反动势力控制很严，这次有的地方仍然搞起了暴动。随后在潘祖浩领导下，还成立了西乡游击总指挥部，有1000多人，杀了霍凤梧等大土豪。

我们在石洲、安坑组织暴动后，听说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分三路进入酃县，我便带了 100 多名武装农民，循着攻克酃县县城的那一路部队走向水口方向赶去。途中汇合两江口刘平章指挥的暴动队伍，一起经水口到了中村。三路工农革命军已到达中村驻下，周围都是革命军队。我和刘平章带领的暴动队伍，加上中村和其他地方的暴动队伍，共 400 多人，驻在中村街上。

中村位于酃县南部，与桂东、资兴交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毛泽东同志是率领部队去湘南策应湘南暴动的，在中村休整了 10 来天。他亲自给部队上政治课，组织部队开展群众工作，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3 月 19 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委和酃县特别区委在中村周南学校开了联席会议。会议研究了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建立地方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等问题。经批准，中共酃县特别区委改为中共酃县县委，刘寅生任书记，邝光前任组织部长，周礼任宣传部长。还成立了共青团酃县委员会，万达才任团委书记。接着又成立了党的中村区委会，何建础任区委书记；成立了中村区工农兵政府，盘华坤（瑶族）任主席。县委又从农民暴动队伍中选出 100 多人，组成了酃县赤卫大队，由何国诚任大队长，戴奇为党代表。毛泽东同志还给赤卫大队发了 8 条枪。

为了发动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同志带头深入农村访贫问苦，作社会调查。当时有的农民对打土豪没收来的粮食、财物不敢要，担心部队一走，土豪劣绅领着挨户团回来杀头。对这样的农民，有时候就在晚上将没收的东西送上门去。毛泽东同志在访问农民时说：“一块小石头，能够砸破大水缸。只要我们组织起来，就象一块块坚硬的石头，不仅能砸破你们村里土豪劣绅这些小水缸，还能砸破蒋介石这个大水缸。”这个生动的比喻，

对大家教育很深，鼓励了农民敢于和反动势力作斗争。

3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同志在中村圩头召开了3000多人参加的军民诉苦大会。大会由县委书记刘寅生主持。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话，讲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道理，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种田人，一年到头累得要死，还没有吃，没有穿；土豪劣绅不劳动却吃得好，穿得好。我们要吃饭，要穿衣，要翻身求解放，就要起来闹革命，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接着有上10个穷苦农民上台诉阶级苦、血泪仇。全场高呼“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大会根据群众的要求，当场处决了两名有罪恶的土豪。

毛泽东同志和酃县县委书记刘寅生等同志经过研究，派出一批部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在道任、中村、联西、心田、深渡、龙潭等乡作社会调查，发动农民开展分田运动。周介甫等同志在道任乡分配土地，由农会造册，每户分多少田，分哪些田，统一写好竹牌子，上写户主、座落、田界、面积，由各户将牌子插在分到的田里，群众叫“插牌分田”。

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中村土地革命，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最早的土地革命的试点之一。毛泽东同志和酃县县委认为道任乡搞得好，要其他乡都参照道任乡的方法分配土地。

这次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来酃县，是遵照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的指示，去湘南策应朱德、陈毅等同志和湘南特委组织发动的湘南暴动的。工农革命军在酃县支持、配合酃县暴动后，即开赴桂东。酃县县委考虑县赤卫大队新成立，只有100多人、8条枪，缺乏训练，没有经验，敌人打过来会顶不住，便要赤卫大队跟随工农革命军去锻炼一个时期。

部队一走，县委估计敌人会疯狂反扑，县委机关必须隐蔽下来，防止敌人破坏。邝远隍家住离中村不远的茅坪，他在那里成

立了党支部，恢复了农民协会，群众基础较好。县委机关便秘密设在茅坪附近大山里一个瑶族农民家里。县委在茅坪开会研究，认为暴动没有搞起来的地方，要继续发动群众组织暴动。县委派我去八都坳头。我在那里和邝光前一起又组织了第二次暴动。

在坳头，我们很快发动了二三百农民，打土豪，开仓济贫，还组织了农民武装。我把这次暴动情况写了报告送给县委。刘寅生看报告后对我说：“坳头搞起来了，你还有点办法。你再回黄挪潭乡，把那里的暴动也搞起来。”

黄挪潭的暴动原先是刘承向负责，没有搞成功。我回凉桥已是4月上旬了。这是我第三次组织暴动。暴动那天，凉桥一带到处是标语：“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大翻身”。我们先派武装农民，把住在上张家坳的土豪周炎卿父子抓了起来。这天在凉桥附近山上的婆婆仙庙里开大会，周围三四十里的地方来了五六百人。农民武装多数人拿梭标，也有拿大刀、鸟枪的，红旗招展，声势浩大。大会斗争了周炎卿父子，又押着游行到凉桥，农民们一声喊“杀”，就把这两个家伙处决了。

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策应湘南暴动之后，随即又迎接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朱德的部队和湘南农军上井冈山。4月中旬，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在资兴与肖克领导的宜章农军独立营会合了。这时，敌军湖南吴尚第八军和江西杨池生、杨如轩的两个师“会剿”工农革命军，尾追工农革命军和湘南暴动队伍。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又从资兴来到了中村。

县委书记刘寅生知道毛泽东同志到了中村，便和团县委书记万达才到中村去，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酃县工作。毛泽东同志说：“酃县暴动是有成绩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不要到处杀人烧屋，不是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不要杀。对一般地主和土豪劣绅要

区别对待。土豪劣绅的房子也不要烧，房子可以分给农民住嘛，为什么要烧掉？搞这种烧杀政策是脱离群众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3月初湘南特委派了特委委员周鲁当代表到宁冈，批评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并根据党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示精神，取消了由毛泽东同志任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师党委，何挺颖为书记，毛泽东同志只任师长。工农革命军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致使湘赣边界大部地区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当时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有这样一个口号：“烧烧烧，烧尽土豪劣绅的房子；杀杀杀，杀尽土豪劣绅的头。”湘南不少地方“左”倾盲动。王佐带领的部队烧杀也比较厉害。酃县农民暴动时也烧了地主一些房子，杀的人中也有可以不杀的。毛泽东同志不赞成乱烧乱杀。但是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以及出于对敌人大搞烧、杀、抢的仇恨，一些地方乱烧乱杀的现象，仍然没有制止下来。

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从中村出发，轻过水口，进入酃县县城。为了掩护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向井冈山转移，4月20日，第一团在县城附近接龙桥和敌人吴尚第八军一个团及茶陵挨户团打了一仗，把敌人打得狼狈逃往茶陵。第一团团团长张子清在指挥战斗中负伤。部队随即撤出县城，经坂溪到了十都。刘寅生、万达才也随部队到十都，并通知我到十都开县委会。会上，刘寅生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不要乱烧乱杀的指示，研究了当前工作。开完会我又回到凉桥。

这天我们正在婆婆仙山里开农协大会，江西敌军一个团从凉桥路上过身。敌军尾追工农革命军，已经拖得精疲力竭了，又怕工农革命军打到他们的江西老巢去，因此匆匆忙忙走黄挪潭近路，急行军回江西。

敌人大队伍过去不久，我们还没有散会，忽又听说有10多

个士兵，由农民领着上山来了。我们紧张起来，100多名武装暴动队员准备和敌人拚一场。这时，先上来的农民到婆婆仙庙里对我说，这是敌军的一个班，在下坪到处找人问共产党在什么地方，说是投奔共产党，便把他们带到这里来了。于是我要这个农民把一班士兵带进庙来，欢迎他们起义投诚。这个班有3支号、12条枪，班长还抽鸦片烟。他们一路上又饿又累，看到我们宣传士兵们要提高觉悟，不要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便脱离大队伍，投诚过来了。

我把敌军一个班投诚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刘寅生，建议接收这一班人，编入县赤卫大队。这时县赤卫大队已随工农革命军去宁冈，刘寅生便派刘承向来凉桥，带领这班人暂到黎树洲大山上驻下来。刘寅生并通知我到五都张平化的舅父家去找他，要我回县委机关工作。

敌人反扑

1928年4月下旬,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酃县,在沔渡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会合。5月4日在宁冈砦市举行了庆祝两军胜利会师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兼党代表,后陈毅继毛泽东任军委书记。5月20日在宁冈茅坪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被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别委员会书记。随即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袁文才任主席。

酃县的敌人在工农革命军离开酃县后,立即反扑过来,大搞“清乡”。地主武装挨户团到处搜山抓“暴徒”,抓到就杀。敌人还到处贴布告,悬赏捉拿刘寅生、周礼、刘承向等。许多革命同志牺牲了,许多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的房子被烧了,斗争十分残酷。但是,我们怀着坚强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一颗革命的红心,为了党的事业,坚持革命到底。县委的同志相约:被敌人围了就冲,被抓就拚,捆住了手脚就咬,英勇牺牲为革命。

在革命征途中,千千万万的革命志士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不怕牺牲。但是,也有人怕苦怕死,有的后退当了逃兵,有的甚至当了叛徒,成为革命的敌人。酃县三月暴动后,由于叛徒林立卓的出卖,使县委机关遭到了破坏。

县委机关原先秘密设在中村附近的茅坪,那里的群众基础

虽好,但地方偏远,不便领导全县工作。经张平化介绍,县委机关搬到靠城区五都下江洲他的一个姓吴的亲戚家里。当时县委机关除刘寅生和我外,还有张平化、黄元吉、邝远暄、刘家相、周策长等工作人员。为了开展工作,县委派张平化回九都,周策长、刘家相回七都,同时派邝远暄去衡阳与湘南特委接头。不久我们听到不幸消息,邝远暄途经西乡时被捕,挨户团将他押到中村拷打;周策长回凉桥后,也被挨户团抓住刑讯,他们都英勇牺牲了。

县委派张平化回九都工作后,我们不便再住在他的亲戚家里,于是又通过刘平章新发展的党员林立卓介绍,县委机关搬到南岸段家垅离林立卓家一里多路的贫苦裁缝段各善家里。段家在山冲里,单家独户,段裁缝经常外出做工,他爱人肖吉秀帮我们做饭菜。刘寅生、黄元吉(县委秘书长)、刘平章(县委干事兼五都区委书记)和我,都住在右边小房里,白天不外出活动,平时购买食物用品,都由林立卓代办。

这时全县都是白色恐怖,我们又听到了周介甫、朱才亮等同志英勇牺牲的消息。周介甫是工农革命军离开中村后,挨户团来“清乡”,他躲在白米石山上被搜捕的。他受尽敌人各种酷刑,遍体鳞伤,宁死不屈。敌人将他从中村押往县城时,用铁丝穿过他的手心拖着走,在去水口途中将他枪杀,并砍下头送到县城示众。

5月中旬的一天,我们请林立卓去水口买些硫磺、白硝、准备做瓶装炸弹,还请他帮我们买点菜。下午他就把硫磺、白硝和一些鸡蛋送来了。晚上,他又送来一只鸡,说怕我们没有菜吃。他喘着气,手有些颤抖,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我们没有要他买鸡,为什么突然晚上送鸡来?为什么又这么紧张?他出门回家时,我便和刘平章偷偷跟着他,准备去他家探听情况。那天晚上下大雨,我们跟到半路,想起他家有一条恶狗,狗一叫就会被发现,我们

岂不是什么情况都探听不到？于是我们又转回来了。晚上大家不放心，鞋也没有脱就和衣睡下。半夜时突然狗叫，我们起来听了一阵，向窗外看了一阵，没有发现什么动静，又睡了。

天刚蒙蒙亮，段裁缝的爱人肖吉秀起来做饭，开门发现屋对面小路上有几个敌兵，慌忙关上门告诉我们。这时敌兵在外面大喊大叫起来：“抓住！抓住！”刘寅生说：“敌人是乱喊的，不要慌。”他沉着地把一些秘密文件都烧掉。这时我们知道林立卓叛变了，可能是他告诉敌人，说我们有炸弹，敌人怕死，晚上围了屋不敢冲进来，天亮了还是不敢冲进来。黄元吉打开左侧门一看，屋前被敌人包围了；再打开后门一看，屋后高墙上也有敌兵。我看到情势危急，一声喊“冲”，黄元吉和我首先从前门冲了出去。刘平章接着冲出时，中了敌人枪弹，被打死在门口。我提着一个只有一尺多宽的红色精致小皮箱，冲出门往田里跑时，情急生智，将皮箱往田埂下一丢。敌人以为里面有钱，都去抢皮箱，其实里面空空如也，装的文件都烧了。我和黄元吉便乘机爬山逃跑。

这时刘寅生还在屋里没有出来，敌人便放火烧屋。刘寅生爬上茅屋顶，想跳到屋后山墙上逃走。可是没有跳过去就被敌人枪弹打中，滚到墙下牺牲了。县委机关就这样被叛徒告密，遭到了破坏。

事后我们才知道，林立卓是被当地大地主家的周树职威胁利诱而叛变的。林立卓去水口买东西回来后，周树职把他叫去审问，他就把我们和行动都说出来了。于是周树职带了挨户团一排人，深夜包围了我们。周树职是刘平章的姐夫，可是他视共产党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就连亲妻弟也被他打死了。

这次事件给我们教训很深。当时湘南特委是“左”的指导思想，要攻占城市，强调做好近城区的工作，对我们也有影响。五都靠近县城，敌人力量较强，群众基础又不太好。林立卓是新入党

的富裕中农，没有经过严格审查和斗争考验。县委机关不应该设在这里。而我们对林立卓产生怀疑后，仍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当晚迅速转移，使党组织受到损失。这说明我们的革命警惕性是不高的。

那天我和黄元吉逃上山后，敌人仍然穷追不舍，不断向我们开枪，子弹“噗”“噗”地把路上的泥巴打得翻跳起来，还喊“抓活的”。我们攀着树枝，一连爬了两座山。黄元吉的鞋子也掉了，喘着气说：“我们最好不要走散了。”他身上还有10块银元，分了5块给我，怕我走散了没有钱用。我左手撑在树上休息，一松手就看到了树上的血印。这时才发现左手受了枪伤，忙用手巾把伤口包好。

可能是我爬山时留下了血迹，不久敌人又跟踪追来了。我们赶快跑下山，穿过田垌，再爬过一座小山，隐藏到田垌中一堆茅柴里。透过茅柴空隙，看到前面有两个人在耙田。一会儿来了一个送饭的喊他们吃饭，并说：“你们不要走。早上打死了两个，跑了两个，有个带了花。他们跑不了，周围大小路都放哨卡死了。你们发现了就抓活的，有赏。”田里人回答：“不要紧，见到就抓。”我们才知道，这两个人都是挨户团放哨的。我想起了离这地方不远的杨溪湾同学廖珩的家，于是和黄元吉商量，先到廖家去躲避一下。

我们饿着肚子躲到天黑，等两个放哨的走了，便改了方向往西爬山走，终于到了水口去县城大路的山上，听得见河里水响。我们沿着放杉树的山沟溜到山下的小路上，再往县城方向走了约5里路，从棖树坳乘渡船过河，到杨溪湾廖珩家门口时已是深夜了。我向黄元吉介绍：“廖珩中学毕业后在长沙开了一个机房，他家在本地有权有势，家里只有一个母亲，也是不怕事的。我们等天亮再进屋，只说是从长沙廖珩那里来的，听听消息。你扮挑

夫,就说担子放在伙铺里了。”于是我们忍着饥寒,等待天明。

天亮了,我们便去廖家敲门。廖珩娘开门一见是我,说:“哟,是周礼,这么早从哪里来呀?”我说:“从长沙廖珩那里来的。”她忙把我们迎进屋里。我悄悄告诉她:“廖珩和我都是共产党员,他要我回来听听消息,问一下你,这个时候能不能回家。”廖珩其实是无政府主义者,此时我只好扯一个谎。廖珩娘说:“不要怕,我家谁敢动,你叫他回来好了。”她招呼我们坐下,又说:“昨天南岸打死刘寅生、刘平章两个共党分子,走了两个,不晓得是什么人。”她望了我和黄元吉一眼,看样子对我们有些怀疑。我说:“我们要回黄挪潭,请你找个人帮忙打听一下,从这里去板溪圩场的路上,有没有挨户团的岗哨。”

吃过早饭,她便要她家里的长工去打听消息。我提出到山上去躲避一下,说是怕摆渡的般夫对我们有怀疑去告密,其实也是怕她家长工去告密。我们躲在廖家屋后山上,远远看到一排军队走樟树坳大路往龙溪方向去了,我想就是那些围屋要抓我们的家伙。他们没过河来,我们才放心。

中午,廖珩娘提着饭篮子上山来了。她装做找牛的样子,口里喊:“牛哪里去了?”其实是找我们,送饭给我们吃的。我们有些不放心,没有出来,饿了一餐,傍晚才去她家。她家长工已经回来了,说沿路到板溪圩场都没有看到军队和放哨的。我们吃过晚饭要走,廖珩娘炒了两升糯米,煮了30个鸡蛋,给我们带到路上吃。临走时我们向她道谢,还给了她一块银元做伙食费。天刚黑,我们就动身回黄挪潭了。

我们是想回黄挪潭后,再去找部队,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县委机关被敌人破坏的情况。借着月色,一路安全过了板溪,再走茶垅上花树坳,沿途都没有碰见行人。到花树坳山顶时已经天亮,太阳升上来了,朝霞映红满山杜鹃花。我们找到一个偏僻的石

洞，在洞里吃炒糯米和熟鸡蛋，还采吃了带露水的杜鹃花止渴。随即又上路。当晚走到秧田垅坳上，离凉桥还有 20 里。我和黄元吉感到很累，山风吹来又觉寒冷，想去路边一个姓黄的熟人家里休息。黄元吉敲了敲窗子，黄家老爹听到了，问道：“是哪个？”黄元吉说：“是我，黄元吉，还有周礼。”老爹颤兢兢地说：“你们还冒走呀，到处出了布告抓你们，抓到一个赏银元 300 块，还说窝藏你们的要杀头哩！”他的意思是催我们远走高飞，怕开得门。黄元吉在窗外说：“你有酒吗？天气冷，搞点酒吃。”老爹说：“有酒，有酒。”窗格子小，酒壶拿不出来，黄元吉就对着伸出来的壶嘴巴喝了几口酒。老爹问我喝不喝，我说我是不喝酒的。我和黄元吉辞别老爹，边走边商量怎么办。黄元吉说离这里不远，就是九都板坑楼，那里有个要好的家门，是个开明小士绅，到他那里去借宿吧。

走到板坑楼过去的小村子，已是深夜。黄元吉去敲小士绅的窗子。小士绅知道是黄元吉来了，忙起床开门，请我们进去，安排歇宿。他说这地方没有放哨了，要我们睡到天亮，再换个地方躲一躲。我们睡了两个多钟头，天蒙蒙亮时他把我们喊醒，送我们到一个山棚里，白天送饭来吃。我们休息了一天，晚上又回头经过秧田垅，走下坪拱桥，从羊角岭上坳，到了黄元吉家里。在他家住了两天，白天躲在山上，晚上回来睡觉。我们听说县委派出和部队联系的刘清黎，到了梨树洲的下洲，决定去找他一道寻找部队。

我们头天出发，第二天夜晚到了梨树洲，在下洲一个姓黄的家里见到刘清黎。这个姓黄的参加了农会，又是红帮（即圈子会）的人。刘清黎告诉我们，县赤卫大队在大院一带活动，

到大院要经过经水江，那地方山高路险，人烟稀少，土匪出没，当地老百姓参加圈子会的多，要请这个姓黄的带路才好过

去。于是我和黄元吉、刘清黎，还请了这个姓黄的，四个人都拿了梭标上路。我们暴动时打过张天坳的土豪，担心从那里路过时遇到反革命的报复，手中有了武器，刘清黎又学过武术，我们就胆壮了。过张天坳时没有出事，但看到黄挪潭方向冒烟。是反动派烧房子吗？我的房子早被反动派烧了。我说，可能是赤卫大队来了，烧地主豪绅的房子。

我们路过苦菜冲时，到我岳父家里打听消息。岳父告诉我们赤卫大队一来，挨户团跑了，土豪劣绅也躲开了。赤卫大队侦察到大劣绅周德玉躲在上洞野老婆家里，于是围屋冲了进去。搜了一阵没有搜到周德玉，便放火烧屋。谁知周德玉躲在楼天花板上，被烧死了。赤卫大队开仓济贫后，又往回走了。我们在岳父家吃了饭，便往大院方向去追寻赤卫大队。一路顺利到了大院的桥头，看到赤卫大队正在做饭吃。大家见面，非常高兴，听我说到刘寅生、刘平章牺牲了，又不禁悲痛万分。这时赤卫大队包括投诚的那一班人，有了五、六十条枪。我们便领着赤卫大队去井冈山，在茅坪又见到了毛泽东同志。

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酃县县委机关遭到破坏的情况，请求派干部重新组织县委会。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这里有两个酃县干部，一个李却非，一个黎育教，你要哪一个？”我说：“最好两个都回酃县工作。”毛泽东同志说：“可以，就由你们三人负主要责任。”于是5月下旬，重新建立了酃县县委会，李却非任书记，黎育教任组织委员，我仍任宣传委员。

一个晴朗的日子，毛泽东同志在茅坪慎公祠召集酃县县委工作人员和县赤卫大队100多人开大会，作报告。我担任记录。毛泽东同志说：“别看国民党一时势力很大，他们四分五裂，军阀混战。他们在楼上打架，我们在楼下团结一致。他们是压迫剥削人民的，没有群众基础。他们到处设关卡，抽捐要税。我们到处

打他们的关卡，群众就很欢迎。城市被他们控制，但是，农村是我们的，群众是我们的，我们可以创建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指示：“你们回去要放手发动群众。首先搞好中心区工作，建好党，建好政，搞好武装，进行土地革命。只要群众觉悟起来，为自己的利益作斗争，就是铜墙铁壁了。敌人几次打井冈山，就打不进来。有了中心区，再向前发展。环境好，就大踏步前进；环境不好，就稳扎稳打。不要盲目冒进，要波浪式前进，逐步扩大根据地。”

他还说：“干革命要靠工农，没有知识分子也是不行的。我们开会做记录，就靠他嘛！”毛泽东同志指了指我，接着说：“我们要团结革命的知识分子，为工农服务嘛！”

县委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建设中心区域，然后波浪式地扩大根据地的指示，确定以靠近井冈山的大院、青石冈为中心地区。县委设在东坑。参加县委的还有张平化、万达才、姚晓园、邝光前等。6月上旬成立酃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徐鼎燕。同时设三个区委会：第一区姚晓园为区委书记，以青石冈为中心向十都发展；第二区张平化为区委书记，以石洲为中心向九都发展；第三区周礼兼区委书记，以大院为中心向七都八都发展。我们按照这个部署，很快开展了工作。

7月下旬，县委派出酃县赤卫大队，歼灭盘踞在九都青平石的反动民团，缴枪20余支，土炮2门，打开监牢，营救了30多名革命同志。后来赤卫大队又游击到五都南岸，活捉了叛徒林立卓，当场处决。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湘赣特委的领导下，酃县的党组织和工农兵政府不断得到巩固、发展，县赤卫大队也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1928年7月，大院区、青石冈区以乡为单位插牌分田，一片兴旺景象。从而形成酃县苏区在1929年1月井冈山失守前的最好时期。

井冈山失守前后

1928年7月,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湘赣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不察当时实际情况,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红军去湘南的决定,只知形式地执行省委要红军向湘南发展的指示,并附和红军二十九团官兵回宜章家乡的情绪,在军委也未能阻止的情况下,将红四军第二十八、二十九团拉往湘南。这两个团攻打郴州,先胜后败,撤出战斗。二十九团被敌人打散,收集不过百人。二十八团也有损失。8月,湘赣敌军会攻井冈山,因红四军主力去湘南,湘赣苏区除酃县损失较小外,其余各县相继失陷,党组织和红色政权大部分被敌人破坏。在历史上称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八月失败”。

9月,红四军主力回师井冈山,恢复根据地。1929年1月上旬,为了粉碎湘赣两省敌人第三次“会剿”,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到外线打击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王佐部队留守井冈山,各县赤卫大队配合作战。月底井冈山失守,红五军突围往赣南与红四军会合,王佐率三十二团转入深山与敌人周旋。酃县赤卫大队在县军委负责人何国诚率领下,从八面山峭口突围,往酃县大院退却。敌人追到大院,酃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徐鼎燕、妇女部长周亚水和革命群众20余人惨被杀害。这时,酃县苏区只剩下第三区的石禾坪、走马洲、上洞、中洞一带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

2月初，酃县赤卫大队在下村遭敌军袭击，何国诚负伤离队。部队由万达才、张秉仁等率领向西乡转移，在澎溪遭敌军袭击，100多人的赤卫大队全被打散，只剩2人回到黄挪潭，编入第三区赤卫队。团县委书记万达才在西乡被俘后，于酃县县城就义。

2月上旬，县委组织委员黎育教从八都来到石禾坪，说县委书记李却非动摇逃走了，还带走一支驳壳枪。他主持召开紧急会议，重新组成临时县委，黎育教为县委书记，周礼为组织委员，张平化为宣传委员，邝光前为军事委员兼游击队长，郭天录为团委书记，周晓春为妇女指导员。

这时，敌人在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的同时，又在政治上采取欺骗政策。他们召开赤卫队员家属会议，欺骗和威胁家属们上山把参加赤卫队的子弟找回去，说什么只要他们回家种田，不要办自首手续，只开个大会，每人发个通行证就可以自由行动了。其实是骗人的，发通行证就是向敌自首登记，开会就是开自首会。结果还是有一些政治上动摇的人，被家属喊回家里去了。

当时处于革命低潮，全县只有三四十人坚持下来。负责干部只剩下黎育教、周礼、张平化、邝光前、郭天录、李克如等，还有通讯员刘家良，共七、八个人。赤卫队剩下12条枪，也没有人背了。于是我们在深夜把枪拆下来，枪筒灌上茶油，用杉树皮包好，枪栓放在坛子里，分别埋在石禾坪一个山冲里。没有几天，参加埋枪的通讯员刘家良也跑回家里去了。我们怕他叛变告密，几个人又连夜把枪挖出来，埋到另外一户贫农屋后，忙了一个通晚。好在刘家良没有叛变。当地反动的团总问他：“周礼到哪里去了？”他说：“走散了，去哪里不知道，可能到江西去了。”

这时候，原一区区委书记姚晓园，三区工作人员周道隆、周

策畅、刘清黎等 10 余人，政治上动摇，都向敌人自首了。他们几个人自首后，又被敌人关在牢狱里，挖墙洞越狱时，除刘青黎外，其余的人都被敌人杀害了。携枪潜逃的县委书记李却非，逃到安仁太湖仙庙里当了和尚后，反动派也不放过他，将他逮捕杀害了。

1929 年 3 月，蒋介石和桂系军阀的战争爆发，湘赣两省敌军撤离边界，宛希先、何长工、王佐等领导根据地军民收复了井冈山。酃县县委、区委和基层支部都恢复了活动。我们把埋藏的枪支取出来，重新组织县、区赤卫队和乡暴动队。4 月，黎育教调湘赣边界特委工作，推选我为县委书记。5 月，湘赣边界特委在宁冈古城召开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增选我为特委执行委员。不久，酃县赤卫队正式成立，邝光前任队长，发展到 60 余人枪，打土豪，筹款子，先后镇压了黄挪潭清乡队头目孟金龙、周传振。12 月下旬，在九都板下楼召开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刘清远当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在酃县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下，革命声势日益扩大。

1930 年 2 月，湘赣特委通知我去永新县城开会。当时还通知各县负责人要带县赤卫队去，说是准备配合红军主力打吉安。因酃县赤卫队刚重建不久，人数少，就没有要我带去。我和通讯员各带一支手枪去参加会议。刚到永新县城时，特委秘书长陈正人就告诉我：“袁文才、王佐搞独立性，昨晚红五军派部队来解决。袁文才是在房内由朱昌偕带几个人冲进去枪杀的。王佐是听到枪声冲出门外在城边河里淹死的。这件事处理得太不好了。”

事前湘赣边界特委负责人朱昌偕、王怀等向彭德怀反映：袁文才、王佐在会议上威胁特委，要将边区武装归他们指挥和改编；请红五军去解围；否则边区党的领导人都有危险。朱昌偕、王

怀等反映的情况不实,结果彭德怀连夜派红五军第四纵队去永新县城,与朱昌偕等配合,击毙袁文才,王佐逃出县城时淹死在河里。袁、王部队大部分改编,小部分在王佐的哥哥王云隆率领下回五井,投敌叛变。

袁文才和王佐出身贫苦家庭。因不满地主豪绅压迫,两人曾参加绿林组织,并结拜为兄弟。井冈山是他们的根据地。1926年受大革命影响,袁文才将所部改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任总指挥,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佐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1928年入党。

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在来到井冈山。袁文才和王佐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使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站住了脚,发展了湘赣边区,并成立了湘赣边区工农兵政府。1928年袁、王部队接受工农革命军改编。袁文才先后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三十二团团团长,红四军军委委员,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界第一、二届特委委员,宁冈县委书记,红四军参谋长等职。王佐先后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三十二团副团长,红四军军委委员,中共湘赣边界第一、二届特委委员,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三十二团团团长,红五军第五纵队司令等职。他们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对袁、王事件,毛泽东同志以后才知道。他说:袁文才和王佐是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的错杀事件。彭德怀同志在往事回忆中也说:如果朱昌偕反映的情况与事实不符,那么我就犯了轻听轻信的重大错误。解放后,追认袁文才、王佐为烈士。

袁、王被错杀后,本来是湘赣革命根据地中心的井冈山一带地区,成了敌人的统治区,给周围各县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湘赣边界的中心也只能转移到永新县了。

1930年3月,我因病离职到红军医院治疗,兼任医院政委。张平化同志接任酃县县委书记。

1931年2月下旬,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在广西领导左右江起义的红七军,在湘粤边界作战失利后,军长张云逸率军部和五十八团1000余人,到达酃县黄挪潭和石洲、板下楼一带休整。当时正值春节期间,酃县党政部门发动群众慰劳部队,送猪肉青菜,送年糕果点,三区歌舞队为红七军演戏唱歌,妇女们为他们洗补衣服,送布鞋草鞋,如同亲人。红七军指战员说:“走了半年路,打了半年仗,从没休息过。到了苏区,就象回到母亲怀抱,感到无限温暖。”

这时,我们得到消息,敌军汝城匪首胡凤璋部一个团尾追红七军到了坪湖、上洞。我马上写信派人送到板下楼红七军驻地,告诉了张去逸同志。张云逸同志说:“根据地人民这样热情,这样好,我们一定要保卫根据地,坚决打。”他亲自率红七军一部,在酃县赤卫大队配合下,翻过将军山,分路围攻敌人,三区赤卫队也随红七军行动。根据地的人民纷纷参战,给部队带路,抬担架,救护伤员,送茶送饭。部队在羊角岭、瓷器窑一带,将敌军击溃。敌人到处逃跑,在瓷器窑过河时,我们一个小小的赤卫队高声喊:“缴枪不杀,宽待俘虏。”一次缴获敌枪30余支。这次战斗共毙、伤、俘敌200余人,缴枪110余支。

红七军将这次战斗中缴获敌人的枪支,送给酃县赤卫大队扩大地方武装,并派军政干部梁文光、何德胜等留在酃县,加强地方武装的领导。酃县赤卫大队扩编为一个连,由60多支枪增加到150多支枪。不久王震同志率领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来迎接红七军,在酃县十都圩会师。随后,攻克酃县县城。6月,红七军和湘东南独立师再次攻克酃县县城,随即开拔去江西永新县。

1931年10月,中共湘赣省委成立,王首道任省委书记。酃

县属湘赣省委领导。

11月，酃县赤卫大队扩编为湘赣工农红军独立第九营，雷学文、何德胜先后任营长，梁文光任政治委员，有200余人。1932年3月，敌陈光中师一部纠集酃县挨户团，分两路袭击十都根据地。驻在小江村的红九营进行反击，将敌人击退，俘虏30余人，缴枪40余支。在战斗中，红九营营长何德胜、政委梁文光壮烈牺牲。

1932年12月，湘南特委巡视员、湘南白区工作团主任黎育教，从郴县出发赴江西永新向湘赣省委汇报工作，途经酃县下村红白区交界处时，被国民党守望队抓住，英勇牺牲。

1933年夏，敌人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后，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我们酃县和江西遂川苏区的红军，在敌军王东原第十五师一个旅和王樊德第二十八师一个旅的进攻下，也越战越苦。敌人采取堡垒推进，步步为营，进行蚕食和抢光、烧光、杀光的政策，使两县苏区仅剩下11个乡，红军损失也很大。在这危急关头，两县县委按照湘赣省委指示，于1933年8月在酃县十都乌石下召开联席会议，成立酃遂中心县委。涂步云任书记，委员有邓秉其、周礼、黄洪、范品梯、易美才、陈章彩、何荣庠、曾科娥等。11月，涂步云调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工作（后叛变），湘赣省委派陈山继任书记，并补选邓秉其为副书记（后因临阵逃跑被撤职）。这时我已病愈恢复工作。1934年1月，酃遂中心县委决定我任酃遂游击队指挥员兼政委。

酃遂游击队当时的任务，是开创荆竹山新苏区，并将江西遂川县的上下溪、黄坳一带辟为游击区。荆竹山的反革命势力，是以圈子会成员为主的几十个人的地主武装。这些家伙不但经常抢劫荆竹山人民的钱粮，还在晚间偷袭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桃源洞。1934年3月,我们游击队进入荆竹山后,发动群众,摸清敌情,一举歼灭了这窝“地头蛇”,并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地头蛇”一除,群众拍手称快,游击队声威大震。随后我们在牛角垅、荆竹山一带开展了土地革命。

1933年8月,湘赣省军区命令李宗保带一个小部队,与酃县独立营(第九营)和遂川县独立营(第十营)合编为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团长李宗保,政委邝珠权。9月,酃县又以各区赤卫队为基础,在十都藤棚山组建了100多人的独立新九营。营长何炳山,政委先后由酃遂中心县委书记涂步云和陈山兼任。1934年春,酃遂游击队并入新九营,新九营由我兼任政委,营长先是何炳山,后为周锡寿。

在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中,临时党中央先实行“左”倾冒险主义,后又实行退却逃跑主义的错误领导,以致节节失利。1933年10月敌王东原师占领酃县后,纠合酃县保安团,对根据地实行步步为营的碉堡政策,进行“围剿”。1934年春,红独四团在大院竹子溜击败王东原部一个营,后又在平湖蒲田与敌王东原部遭遇,浴血奋战,敌我双方伤亡惨重。酃遂中心县委原在中洞办公,后经过藤棚山转移到桃源洞。

1934年7月,陈山调湘南工作,由我接任酃遂中心县委书记。这时敌王东原部和酃县保安团配合,分路“进剿”革命根据地,实行“抢光、烧光、杀光”政策,根据地遭受严重破坏。敌人同时实行经济封锁,使根据地没有盐吃。我们不得不放弃“与苏区每寸土地共存亡”的老观念,带领新九营到白区打游击,既解决我们的物资需要,又扩大了游击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突围长征后,地方党组织和部队指战员进入了艰苦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重整旗鼓，坚持斗争

1934年秋，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导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为探索战略转移路线，8月，红六军团奉命离开湘赣根据地，开始突围西征，进入湖南。10月，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红军主力进行战略大转移，告别苏区老幼乡亲，开始长征。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在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委司令员项英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以及南方各地党组织领导下，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在8省10多个地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

湘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紧密依靠群众，开展了湘粤赣边界和湘南10余县的游击战争。3年中，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配合红军主力长征和全国各地的革命斗争，打击和牵制了敌人，保存了革命的火种，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了一批党和军队的骨干。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后，蒋介石一面调动40万大军围追堵截；一面以几十万兵力包围革命根据地，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府“死灰复燃”。刹时间，黑云滚滚，一场暴风雨随即向革命根据地袭来。

不久，苏区几乎全部被敌人占领了。遂川全县沦陷，革命老

相继跑来鄱县。鄱县原苏区中心地带如大院、斗米湖、南流、青石岗，四外都筑有敌人碉堡。我们的根据地仅仅剩下桃源洞周围几块荒无人烟的大山区。这时，敌人一方面派重兵“围剿”红军游击队；一方面大搞移民并村，每5至10里或交通要道都构筑碉堡，把老百姓赶到碉堡附近围子里，隔断游击队长与群众的联系。他们实行经济封锁，断绝我们的粮食油盐来源，妄图困死饿死我们。

然而，我们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群众总是帮助我们，将敌情告诉我们。我们了解到，国民党正规军都驻扎在县城、石洲、大院一线，其它地区碉堡里都是些七拼八凑的挨户团。我们就避强打弱，专选敌人力量薄弱的碉堡打。我们先向群众调查和实地侦察，然后派两个班包围碉堡，卡住敌人的脖子。敌人龟缩在乌龟壳里动也不敢动，眼睁睁地望着我们进村做宣传搞粮食。这就叫“虎口掏食”。有时条件成熟，就干脆来个“连锅端”。如大院过去二、三十里地的江西坳有一座碉堡，里面有挨户团20来人。我们去了一个排将其包围，敌人凭乌龟壳顽抗。我们便在群众支持下搞了许多柴禾，堆放在碉堡下，用太上老君八卦炉烧孙猴子之法，点燃后，霎时烟熏火燎。我们齐声喊：“缴枪不杀！”敌人乖乖地举手投降了。我们缴获了十几支枪，将碉堡炸毁，镇压了当地一个恶贯满盈的大土豪，把浮财分给群众。老百姓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红军又回来了”！

敌人还玩弄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新花招。他们改变以往的到处烧、杀、抢的政策，而代之以“欢迎自首自新”的政治欺骗，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还逼迫红军、共产党员的亲戚朋友到游击队来做“规劝”工作。敌人造谣，说什么：“朱（德）、毛（泽东）被捉，你们还躲在深山老林里干什么？”“只要悔过自新，发个自首证给你，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敌人的这一套，虽能欺骗少数动摇

分子,但在坚定的革命指战员面前,只能是枉费心机。

那时,斗争环境确实很艰难。苏区搞不到粮食,要到百多里外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去买。买不到的时候,只好吃笋干、野菜、蕨根。经常没有盐吃,四肢无力,后方红色医院的伤病员就更苦了,无粮又无药,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由于敌人集中兵力搜山追击,我们的活动只能声东击西,昼伏夜行。为了甩掉敌人,我们日夜兼程在方圆数百里的崇山峻岭中回旋。没有一定的住处,有时我们在大山上搭茅棚,有时就睡在树林里。下雨了,就在岩洞里或大树下躲一躲。实在太累了,就背靠背,闭上眼睛打个盹。战斗无穷期,生活极艰苦,大浪淘沙,也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自首叛变了。

独立新九营营长(忘记了姓名,他是江西人)就是这时叛变的。有次他带部队到白区去搞粮食,我留在后方整顿合并的酃遂游击队。这时他已准备投敌,故意把部队拖疲劳。他召集连排干部开会,在会上散布消极悲观情绪,说什么红军游击队没有出路了。他和几个江西遂川人密谋,商量投敌,提出把政治委员周礼杀掉,还可以立功。他一面写信通敌,叫敌人来打我们;一面带部队回来,准备杀我。我们住在山上,只有二十余人。他带着部队来到山下,离我们住处还有三、四里。副营长也是江西人,但他是坚决革命的,知道营长的叛变阴谋,在部队回山下驻扎后,就要一个是酃县人的号兵,赶快上山来告诉我,说营长准备叛变了,会对我下毒手。我考虑了对策,便派人通知营长带一个人上山来汇报情况。他却带了一班人,有五六支驳壳枪。我决定先动手,把游击队武装人员散布在山头,派一个班下去,见到他就突然把他的枪缴了。当场宣布:酃遂中心县委书记兼政治委员周礼命令,将策动叛变投敌的营长予以逮捕。随他来的一班人,证明他是想杀了周礼政委然后投敌的。我们审问他,他也承认了。于是

我立即下令,将他枪毙了。和他有密谋的5个人,经过教育分化,作了对证,便没有处决他们。当时敌人接到他的信后,也在他们后面不远跟来了。他原打算里应外合,投敌立功,结果阴谋破产。我们及时将他处决后,立即决定副营长带领部队100多人上山,迅速转移。我们离开驻地时,看见敌人走大路过来了,离我们只有三、四里路远。结果他们不见游击队踪影,扑了个空。

敌人为了消灭苏区,消灭红军游击队,采取“军事进剿,政治自新,经济封锁”的恶毒方针,对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的处境也就越来越困难。特别是敌人对苏区的封锁,我们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才能到白区去购买一点粮食和盐。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逼得我们不得不到白区去开辟工作。

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留得火种,仍可燎原。红军主力长征后,湘赣省委决定重整旗鼓,坚持斗争,开辟新的游击区。1934年冬,在桂东成立了湘粤赣特委,开始组建湘粤赣边区游击支队。湘粤赣边区重新燃起了革命的烽火。

东、西边山的艰苦岁月

在湘粤赣三省交界的罗霄山脉南部,有一座绵亘数百里、地势非常险要复杂的大山。它东连江西的上犹、崇义,西接湖南的资兴,北至桂东,南达汝城和广东的仁化、南雄,峰峦起伏,沟壑纵横,有的茅草丛生,有的古木参天,正是打游击的好地方。按地理位置,当地人习惯称之为东边山、西边山。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湘赣省委部署开避新的游击区,派红军独立第四团和第五团到东、西边山开展斗争。红独四团来东、西边山后,兵分两路活动。团长李宗保带了两个营300多人,在西边山资兴边界的一庵子及附近宿营。他政治上动摇,在庵子里召开干部会议,提出向敌人投降。有个连党支部书记坚决反对叛变,被他开枪杀害。随后他带了一个连和一个自动步枪班,到资兴青腰圩向乡团总欧九如投降了。政委旷珠权住在另一个山头,他也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一天晚上诡称“下山了解情况”,一个人潜逃叛变。随部队行动的原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方维夏和顾星奎等同志,克服重重困难,收集和整顿部队,保存了90多人枪,转移到东边山的上庄、下庄、青洞、泥塘一带活动。

1935年春,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领300多人来到桂东东边山,先后与红独四团、五团余部,以及红军独立二十四师七

十一团、七十二团余部会合，组建了六、七百人枪的湘粤赣边区游击支队。蔡会文任支队司令兼政委，游世雄任副政委，李国兴任政治部主任。蔡会文、游世雄、李国兴、张通、王赤等参加湘粤赣特委为委员。此时，特委书记陈山，宣传部长方维夏，组织部长李国兴。湘粤赣特委和游击支队总部设在赤水仙。支队下辖7个大队，每个大队50至100多人枪，划分7个地区，开辟了新的游击根据地，扩大了游击区。

张通带领的红独五团80多人枪编为湘粤赣游击支队第一大队后，奉蔡会文命令，到酃县、桂东、资兴边境开辟新的游击区。张通在边境没有站住脚，就退到酃县。他找到我，谎称蔡司令、陈山命令他去湘赣省汇报情况和搞无线电台，要我们酃县新九营护送。因1934年8月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时，我们酃县新九营和张通率领的红独五团在井冈山黄洋界一带一起活动过，彼此认识，也就相信他了。我们派了100多人，90多支枪护送他们。从酃县十都出发，一股劲冲出了包围圈，进入白区。我们知道敌人每个碉堡里不过三四十人枪，沿途虽然枪声阵阵，但我们根本不理睬。张通说：“你们真有本事，走老虎身边过而泰然自若。”我说：“敌人一是虚张声势，给自己壮胆；二是看到我们过卡，表示欢送。”说得大家都笑了。我们熟悉本地环境敌情，只两天就到了茶陵的十八团地方。因为酃县后方我们还有几十个伤病员战士，所留给养不多，而且十八团离湘赣省委驻地不远了，我们打算撤回。但张通再三恳求“帮人帮到底”，要我们送他到茶陵、攸县、莲花交界的湘赣省委谭余保部队里去。我只好带领20多人组成两个加强班回酃县，其余70多人枪继续护送他们。

我刚回到酃县，就碰上蔡会文派来的交通员刘家运等二同志。他们将蔡会文和陈山的手令交给我，说张通违抗命令，不听指挥，自由行动，决定撤销其职务，并要我将他扣留，部队由我指

挥。但手令来迟了，张通已经走了。后来，张通去湘赣省委途中遇到敌人，打了几次败仗，队伍被打散，不少同志牺牲。他一个人跑到谭余保那里。谭余保同志很气愤，说：“你把自己的队伍搞垮了不算，还把周礼的部队也拖垮了！”便把不听指挥并搞垮部队的张通，按军法处决了。

1935年秋初，湘赣省委调我到湘粤赣特委和湘粤赣游击支队司令部工作，并通知带部队同往。我们从酃县桃源洞出发，在桂东的东边山找到了陈山和蔡会文，将部队编入支队司令部直属队。这时，支队副政委游世雄和政治部主任李国兴，已带了3个大队到桂东的西边山开避新游击区去了。陈山、蔡会文决定由我接任特委组织部长兼任支队政治部主任。

在革命处于低潮、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要准备作长期艰苦的敌后斗争。特委和支队司令部决定改变斗争方式，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每个大队编成十几人至三四十人的小分队，隐蔽在各个山林，一面做群众工作，一面进行游击战。我们仍然采取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的生意就做，赔本的买卖不干”，牵着敌人的鼻子满山转。

为了开辟新的游击区，特委和支队司令部派出7个工作团，每团2至4人，到汝城、桂东、资兴和江西的上犹、崇义，以及广东的始兴等地开展群众工作，组织贫农团，建立党的组织，进行游击战争。

有了立足的游击根据地，有了与我们血肉相连的群众，我们的队伍一天天壮大，发展到七八百人枪，开辟了方圆900里的游击区。湖南的酃县、茶陵、桂东、资兴、永兴、汝城，江西的上犹、崇义、遂川、大余，广东的始兴等县边境，都是我们活动的范围。在那崇山峻岭，苍苍林海间，扬起了一面一面的革命红旗。

东、西边山游击斗争的发展，震惊了敌人。国民党反动派从

广东开来铁甲兵教导团，从江西调来铲共团，还有湖南何宗汉保安十九团，衡阳警备营，桂东、汝城的铲共义勇队，以及我们游击根据地周围十几个县的反动地主武装，都纠合起来向我们东、西边山进行“会剿”。在蔡会文司令领导下，在各地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下，我们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会剿”。

李宗保投敌后，被反动派省政府主席何键委任为“安抚专员”，有次带领 300 多人枪，挂起“五县铲共义勇队”的破旗，来袭击游击队。蔡会文作了先诱敌深入，再切尾退敌的战斗部署。游击队选了 60 多名精壮小伙子组成突击队，在桂东彩洞迎击敌人，随即择荒山小路撤退。李宗保率部追到东边山一座大山里，只留下两个班把守入山口木雀的碉堡。这时游击队一分为二，一部分继续东放一枪，西放一枪，牵制迷惑敌人；另一个 30 多人的小分队则甩开飞毛腿，迂回绕过敌人，攀岩越涧，夜袭木雀碉堡，敌人两个班都成了俘虏。李宗保忽闻木雀碉堡被破，料知中计，急令退兵。游击队一声号响，杀声四起，又打死敌人 4 名，俘虏一批，缴枪几十支，敌人纷纷夺路逃命。

敌人在“进剿”我们游击队时，还对东、西边山群众进行镇压和血腥屠杀。他们把凡是给我们送过信的、送过食物的、打过掩护的、亲友参加游击队的，统统诬加“通匪”、“济匪”、“藏匪”、“匪属”罪名，抓起来关押或杀害。

由于敌人大举拉网“清剿”，强迫移民并村，联保连坐，还组织“跟脚队”、“看火队”，发现脚印和烟火就包围搜山，使我们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那时，我们常常三五天吃不上一餐饱饭，只好用竹笋、蕨根、鸡冠花等野菜填肚子。

在极困难的环境下，部队有叛变的，有逃跑的。然而以蔡会文为首的坚持革命到底的一批同志，仍镇定自若，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蔡会文找干部、战士谈心。他说：“毛泽东同志开创并

冈山革命根据地时，还不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今天我们有武装，有群众，又有广阔山岭回旋游击，是可以克服困难，狠狠地打击敌人，创建一个广大游击根据地的。”没有饭吃，蔡司令带头挖野菜，还说：“你们看这苦菜多水嫩，多好吃。”他还带领战士们上山打兔，下溪捉鱼，叫做“山珍海味”。

为了对付敌人“清剿”，我们分成二三十人的小分队活动，昼伏夜出，翻山越岭，沿溪溯河，不用说脚印，敌人连我们的影子也找不到。我们还利用早晨大雾时煮饭，烧烟子少的干柴，煮一次吃几顿。这就使敌人的“跟脚”、“看火”枉费心机。

蔡会文和方维复都很注意思想教育，经常给同志们讲形势，任务和共产主义理想、前途，给党员上党课。那时，部队百分之二三十是党员，我们按毛泽东同志讲的把支部建在连上，组织生活严格。党课第一课讲党的性质和共产主义目标。蔡会文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到国民党那里去升官发财，不在家里享清福，甘愿来吃苦？根本原因就是抱定了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第二课讲党的民主集中制。第三课讲党的团结和纪律。党员有来自中央苏区的，有湘赣省的，有赣南的，有当地的，我们就讲互相尊重、加强团结的重要性。

蔡会文、方维复还教大家唱歌，大意是：“红军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不可乱胡行；打土豪，财物要归公；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工农的东西，不可拿半分；上门板，捆铺草，房子扫干净；解手找茅厕，洗澡避女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要记清。”

通过教育，游击战士们提高了觉悟，深深扎根在群众的土壤里。党员、干部吃苦在先，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战斗中连长牺牲，党支部书记顶上；党支部书记牺牲，排长、班长、党员顶上，前仆

后继,英勇战斗。

我们纠正了过去湘南特委执行的乱烧、乱杀、把商贩统统当做“奸商”等“左”的作法,实行了“打倒土豪劣绅,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保护工农利益,团结兄弟民族”的政策,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运用机警灵活的游击战术,使东、西边山游击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

蔡会文、方维夏英勇牺牲

1935年秋天，敌人增派湘粤赣三省兵力进行“清剿”。有一天，湖南军阀何键部三个连进攻我们司令部，群众给我们报了信。我们正准备转移，敌人一个前哨连已经进山来了，其余两个连每连相隔四、五里地向我方蠕动。我们隐伏在山岗上，透过茅草丛林，看得清清楚楚。蔡会文当机立断地说：“送上砧板的肉不吃，送上门的敌人不打，尚待何时？先吃掉他们一个连再说。”

当时，我们司令部及直属队，还有伤病员，加起来才七八十人。蔡司令即作部署，我们左右迂回拉成口袋阵势。眼看敌人到了跟前，蔡司令一声令下：“打！”正面火力居高临下，如雨点集中扫射；两边滚木擂石似山崩地裂，砸向敌人。敌人慌乱不知所措，应声倒下一片。“同志们，冲哪！”接着，我们一个泰山压顶，猛虎扑羊，连伤病员都忘了病痛，一股劲冲了下去，打得敌人魂飞魄散，死伤50多人，其余的只好乖乖地举手投降。特委书记陈山带了五六个战士在另一个山头，也虚张声势，一声喊缴了敌人一个班的枪。敌人前面这个连被歼灭后，后面两个连便闻风逃走了。

1936年初春，由于广东敌军加强对游击队的“围剿”，形势日趋紧张。我们驻在东边山一座海拔一千二三百米高的朱冠山赤水仙下面的山腰里。山顶赤水仙庵子附近驻有敌人一个营，山脚的上堡墟驻有广东军阀余汉谋部彭霖生一个团，东面江西上犹营前墟还有敌人一个团驻守。上下左右的敌人，离我们都只有

二三十里。山顶上的敌人不敢来侵犯我们，山脚下广东敌人因有叛徒李宗保告密，知道我们分散游击，便以连为单位，步步为营封锁我们。几乎所有的村庄都驻有敌人，使我们无法接近群众。

有一天，敌人一个营进山袭击我们。此时支队司令部和特委一共只有四五十人枪。哨兵报告说，敌人已经沿着小路向我们驻地袭来了。我们就分路撤退。陈山带了七八人朝另一个山头转移。我带了二三十人冲下山沿山溪突围。蔡会文带了十几人向山坳上撤退。那时，我们每天都约定，如果打仗分散了，第二天就到某个山头集合。这天上午打仗被冲散后，我带队伍到了预定的那个山上。不久，陈山派警卫员来送信说，陈山被枪伤挂了花，来不了。蔡司令怎么样？大家焦急地等待着。等到第二天下午，几个和蔡会文在一起的战士和湘赣省委派来的交通班突围出来找到我们，一见面就说：“蔡司令危险，被敌人包围了。”第三天，蔡司令的警卫员江德辉最后突围出来，见到我们，泪如泉涌，一头扑在我的怀里，泣不成声地说：“蔡司令壮烈牺牲了！”这消息象晴天霹雳，一下子全体战士心都碎了。大家摘下军帽，向着蔡司令遇难的山头鞠躬默哀。

原来，那天我们被冲散后，天下大雨，山溪水暴涨。上午，我们是手拉手过河到到预约山上的。下午蔡会文来时，已不能过河了。于是他带战士们转回去，。途中发现地上有饭，断定是自己的队伍，急忙追上去，才知是湘赣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派来联络的王用济交通班 12 人。他们会合后，20 多人又回到朱冠山，在山腰中一个空屋里住下。蔡会文派管理员陈钧亮去买米，不料陈钧亮下山时被俘投敌了。第二天天刚亮，这个叛徒带着一些穿得破破烂烂化装成农民的敌人上了山，迅速冲过来。接着敌人一个营压来了。“叭！叭！”哨兵鸣枪报警，被敌击倒。蔡会文举枪还击，掩护同志们撤退，不幸身负重伤。警卫员江德辉要背着他撤

退，他命令江德辉：“你们赶快冲出去找周礼！”蔡司令被俘后宁死不屈，他拒绝敌人用竹椅抬去请功，拚命抗争，被敌人杀害。蔡会文同志是湖南攸县人，1926年入党，牺牲时年仅28岁。

“正是青春好年华，
赤心为党为国家，
壮志未酬身先卒，
血染遍山杜鹃花。”

这是我对他的深深怀念。蔡会文将军永垂不朽！

蔡会文牺牲三天后，我们回到原先被敌人包围的那座山上，找到了右手负伤的特委书记陈山。陈山下令给我：“司令员蔡会文已经牺牲，我也挂了花，请周礼同志代理特委书记，担任党和军队的领导及指挥工作。”陈山要我带领第六大队和司令部直属队迅速突围，把敌人引走，这样他也安全了。我带着这数十人突围转移后，没料到只几天，陈山和三个警卫员就被敌人包围抓走了。后来，听陈山警卫员刘家运说，陈山被俘后，在单独送往衡阳医院治疗时投敌。以后，他带着敌人来搜山。找到西边山游击队，谎称是从敌人队伍是潜逃出来的。他在游击队进行反动宣传，暗害游击战士。游击队负责肃反工作的原湘赣省保卫局干部顾星奎发觉后，在洪水山将他逮捕，就地枪决。

不久，西边山游击队又遭到敌人进攻。游世雄带了一个大队转移到酃县去了。我带着六大队和司令部直属队突围后，先走八面山，然后转移到酃县的西坑宿营。这天晚上，放了几道暗哨。清晨，哨兵警觉地发现对面山上有人走动。我们分析，可能是自己的队伍。随即进行侦察联络，果然是游世雄带来的一个大队。迎着朝霞，我们这两支部队共200余人又会合了。我拿陈山手令给游世雄、李国兴看，一起商议决定：游世雄代理湘粤赣游击支队司令员，我任湘粤赣特委书记兼支队政治委员，李国兴任政治部

主任。

不料没有多久，我们在报纸上又看到方维夏同志在桂东下庄仙背上被敌人杀害的消息，指战员无不放声痛哭。我是1935年秋天在东边山第一次见到方维夏的。他是湖南平江县人，1924年入党，1927年8月曾参加南昌起义。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56岁的老人了。他为人耿介刚直，刻苦耐劳，到过苏联学习，满肚子的马列学问。虽然年近花甲，但精神矍铄，干劲很大。部队行军刚坐下来休息，他就忙着做宣传；一打仗，他就带着左轮手枪参战。部队在一个大山里整训时，他主办了几期干部训练班。有次东边山开特委会，他还要我派二三十人去学习。他给干部上课，讲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讲党和红军的铁的纪律，特别用苏联红军的英雄事迹，鼓舞大家的斗志。1935年冬，方维夏因年老体衰，又眼睛近视，随部队行动很困难，特委决定让他留在“后方”。那时，在新的游击区，所谓“后方”就是边远的大山上，他和老伴身边仅带了几个警卫战士和一个采购员，住在桂东大山中一个临时用茅草搭起的棚子里。1936年4月，由于敌人封锁很严，很难买到米。游击队员莫犹斌、郭先古、黄光古去山下筹粮，被国民党沙田乡长郭英汾抓后叛变。敌人仍要他们以送粮为名回到山上。叛徒们上山后，卑鄙地先后杀害了方维夏身边的两个警卫员和方维夏夫妇。

松涛呼唤，江水悲咽，人民永远怀念方维夏烈士。

在我们突围后，东边山一个团的敌人尾追我们到了酃县。我们不少指战员是酃县人，熟悉人情地理环境。敌人却象盲人骑瞎马，被我们几个圈子一绕，就晕头转向，不知我们的去向。在一个蒲芦谷口，我们突然杀了个回马枪，毙敌10余人。然后几个夜行军，就甩掉了尾追的敌人。当地的敌人都是挨户团，人数不多。有天晚上挨户团来袭击我们，被我们打死几个，他们便不敢来犯

了。

我们在酃县活动了一个多星期。因敌人并村，把老百姓赶进碉堡附近围子里，我们给养困难，难于打开局面。这时，我们从找到的国民党报纸上，看到在茶陵、安仁、酃县边境的潭湾，还有个陈梅连游击队，又听说湘南特委机关也在那里。于是，我和游世雄带领部队，回经八面山，日夜兼程 300 多里，奔向潭湾会师，迎接新的战斗。

潭 湾 会 师

1936年4月下旬,我和游世雄、李国兴率领游击队200余人,来到安仁潭湾的神堂背,与茶(陵)安(仁)酃(县)永(兴)边区委员会负责人陈梅连领导的游击队100多人胜利会师了。潭湾地区,是一块方圆百里,巍然屹立在敌军围困中的游击根据地。陈梅连领导的游击队,就活跃在这一带崇山峻岭之中。

当天,陈梅连安排我们住宿在福星村蛇形李家一个小村里。他考虑到我们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的疲劳,提出要我们好好休息,由他们的游击队来站岗放哨。我们欣然接受他的好意,只在驻地放了一个卫哨。这晚同志们睡了几个月第一个安稳的好觉。

第二天,我们正准备吃午饭,突然从陈梅连派来的第二道了望哨处传来“兵!兵!”两声清脆的枪响。接着,枪声大起。原来,从桂东一直尾追我们的一个团的敌人又跟上来了。陈梅连部队在第一道山岗上了望的哨兵,擅自撤回吃午饭去了,没有报警。这样,当敌人蠕动进村,第二道了望哨哨兵发现,急忙鸣枪发出信号时,部队转移已来不及了。狡猾的敌人顺着山溪从三方面包围我们,一下子就到了离我们驻地只有二三百米的溪坎。我们的哨兵开枪击倒两名敌人,其他敌人慌忙滚下溪沟。用密集火力向我们扫射。

我们一声号令:“冲啊!打这帮狗强盗!?”由湘赣省委派来的交通班首先向敌人下面冲了过去。但房外是一片开阔的稻田,敌

人火力很猛，将他们压了回来。以后，我们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而且伤亡很大。当时，我们驻扎在一个坐北朝南、东西走向约三四十米的祠堂里。祠堂东、南、西三面筑有围墙，背靠北边一座大山。于是，我们错误地沿用了在酃县大院死守阵地的经验，凭围墙设防抵抗。但敌人人多武器好，又凭借山溪掩护，迫击炮如闷雷在屋前左右爆炸，机关枪“哒、哒、哒”，弹如飞蝗，把我们封锁在院子里。“轰隆！”围墙被炸塌了一截，坚守在围墙边的一些战士牺牲了。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和游世雄考虑到三面受敌，而我们弹药有限，难于固守，决定立即从后山突围撤退。一声令下，同志们爬上屋后陡坡，进入山林。打掩护的同志最后突围时，爬山速度慢，一些同志又中弹牺牲。

我们突围上山腰时，率先转移已达山顶的陈梅连游击队以为我们是敌人，便居高临下向我们放了一阵枪。我们也以为是敌人包围了我们，就一边还击，一边退到另一山坡。陈梅连见我们回击枪声稀稀疏疏，才知道发生了误会。于是，我们会合转移，甩开了敌人。

这次战斗后不久，陈梅连带我们找到了湘南特委。因原特委书记王涛 1934 年跟着中央红军长征去了，其职务由徐克全接任。1935 年冬，湘南特委机关转移到潭湾。这次，我们见到了徐克全，还有特委组织部长刘霞、团特委书记陈亚元、团特委副书记王崇甫等。于是，湘粤赣特委与湘南特委也在潭湾会合了。

1936 年 5 月 27 日，我们在潭湾杉木垅召开了两个特委的联席会议。湘南特委出席会议的有徐克全、刘霞、陈梅连、陈亚元等；湘粤赣特委出席会议的有周礼、游世雄、李国兴、王赤等。会上，双方汇报了各自的工作情况，总结了这次蛇形李家战斗的教训。根据当时的形势，为了加强领导，统一湘南党的领导机构，会议决定撤销湘粤赣特委，合并成立新的湘南军政委员会及其领

导下的新的湘南特委。会议推选徐克全为军政委员会会主席，周礼为副主席兼湘南特委书记，游世雄为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刘霞为组织部长，李国兴为宣传部长，陈梅连及各县负责人为委员。

两个特委合并后，正准备在潭湾一带继续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这块游击根据地时，敌人调动了比我们多数十倍的兵力，对我们进行重兵“围剿”。在这新的严峻考验面前，我们队伍中的少数意志薄弱者，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倒，看不到光明的前途，有的逃跑，有的叛变。首先是湘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克全动摇了，弃枪携款潜逃。当时，敌人跟踪追击我们。有一天晚上，徐克全把我们特委几个负责人带到一座大山上。他借口到山下老百姓家探问消息，下了山，直到第二天天亮还不见回来。我们急忙下山寻找，在岔路口捡到徐克全佩带的驳壳枪。那时，我们有个规定，带枪逃跑，抓了是要枪毙的。显然，徐克全是弃枪逃跑了。我们担心他投敌叛变，于是马上转移。后来，既没有看到他带敌人来进攻我们，也未见他登报自首。据说他拐走一笔款子和两斤金子，到一个庙里当和尚去了。

徐克全逃跑后，湘南军政委员会无形中取消了，只剩下湘南特委。特委随即在潭湾土坡里，召开了一个特委主要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徐克全逃跑后的应变措施，部署下一步工作。我们考虑到整个湘南有工作基础和群众基础，又有开展武装斗争的实力。除潭湾和桂东东、西边山的游击队外，在郴县、宜章和广东乐昌、乳源一带活动的有李林的“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在耒阳、安仁、永兴一带活动的有刘厚总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湘南特委管辖的地区有24个县，我们不能局限在潭湾小块地区活动。因此，特委重新进行了分工和部署：游世雄分管军事，仍回桂东，积极巩固和发展东、西边山游击根据地，指挥这一带的游击队；管宣传的李国兴和管组织的刘霞分管茶、

安、酃边区和潭湾的游击大队；我仍担任特委书记，管全面工作，先去视察湘南各县工作，并找李林、刘厚总的游击队。这样，大家分头行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波澜壮阔的武装斗争，使游击区星罗棋布，既可分散敌人兵力，又可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

在送走游世雄、王赤的大部队后，我便告别了潭湾的亲人，和刘霞、李国兴分别带了几个通讯员，去安仁、永兴、两衡（衡山、衡阳）等地视察工作。

当时，在我们部队中，有一支非常活跃又能吃苦耐劳的女子班。她们8个人，常给我们缝补衣服、做鞋子、采药治病。从酃县到东边山，又从东边山到潭湾，她们有时做宣传工作，有时参加救护伤员，有时担当后勤重任。我的爱人肖三妹，就是女子班的一员。在潭湾时，肖三妹参加茶、安、酃县委（亦称茶、安、酃、永边区委员会）武工队，后增补为县委妇女部长。我离开潭湾后，县委派肖三妹、刘四妹到山口圩段家湾做群众工作。1936年冬，敌人进攻潭湾，贪生怕死的潭湾游击队中队长周二苟威逼肖三妹一起叛变投敌。肖三妹严词拒绝，坚贞不屈，被周二苟杀害于芒麻垅。肖三妹又名韩三妹、韩三凤，1910年8月出生于酃县十都秧田垅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她7岁当童养媳，1928年参加革命并入党，是酃县最早的女游击队员之一，牺牲时年仅26岁。解放后，叛徒周二苟被人民政府枪决。

我们离开潭湾不久，陈梅连游击队被敌人打散，陈梅连被捕牺牲。

与敌周旋于乐乳山区

1936年秋,我和李国兴从潭湾来到安仁,见到安仁县委书记谢竹峰,研究工作。接着我们到衡山、衡阳,找到了两衡工委书记张春林(又名林长春,外号“白毛”)。刘霞也来了。在衡阳、衡山、安仁边境的四方山,我和刘霞、李国兴开了一个小会,认为四方山是一个小天地,有党组织,群众基础好,准备在这里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但四方山只有零星住户,本地扩兵成问题。于是,我们先在衡阳铁子塘,派了一个姓林的干部和一个本地姓唐的地下党员(后叛变),以做谷芽糖生意为掩护,搞了一个落脚点。同时,我和李国兴各带一个通讯员,通过地下党员许作霖,在他家五塘铺和茶皂,分别开设一个卖布匹、油盐的杂货铺和烟铺,以便开展活动。

当时我作为许作霖的家门,化名许崇德。我看过一些医药书籍,一面做要杂货生意,一面为群众看病。我给贫苦农民看病不收钱,群众和我们关系很好。

不久,在宜章、郴县和广东乐昌、乳源一带活动的游击队队长李林,知道了湘南特委在衡阳四方山活动的消息,便带了二三十人,来找特委。因中途遇强敌,部队被打散。李林带几名战士回乐昌,派该部副队长蒋玉林到四方山,找到了我们。当时,我正准备去宜章、乐昌,苦无向导。于是我和刘霞、李国兴商量,决定我去乐昌和李林游击队及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

1936年9月,我和许作霖、蒋副队长化装去广东。我扮作卖鸡的老板,许作霖和蒋副队长各挑一担鸡,从衡阳的车江乘火车到广东的乐昌坪石。下了车,我们就将鸡便宜卖掉一担。然后由蒋副队长带路,到了设在广东乳源县梅花沙河镇的乳源县工委负责人贺畔朵的一个通讯站,许作霖即回衡阳。

沙河镇是个丘陵区,有20多户人家,那里住着一个国民党的退伍团长,与我们游击队有来往。蒋副队长说,李林部队的一批驳壳枪就是托他买的。我们特地登门拜访了这位团长,和他谈了革命形势和我们的政策,还送了几只鸡给他。

第二天,站里通讯员送我们进大山,找到贺畔朵。他原是随中央红军长征路过坪石时留下来做地方工作的。据他说共留下七、八人,现在只剩下他一人,其他人有的被敌人杀害了,有的走了。他在这里发展了几十名党员。组织了7个支部。他向我汇报工作后,就带我去坪石的皈堂,再走几里路到了坳丘,找到了宜(章)乐(昌)县工委负责人谷子元。他们安排我任在一户姓李的农民家里,户主的儿子李水生给我当通讯员。几天后,李林也带着几名战士来了。

在坳丘李家,谷子元同志向我汇报了工作和当地情况。我也谈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工作意见。我谈到发动群众,要进行阶级教育,启发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我编过几道顺口溜,如:“月光光,金黄黄,穷人肚里闹饥荒。”“牛耕田,马吃谷,农民种田土,地主收租谷”。在农民当中一下就传开了。

李林领导的游击队,经历了几起几落。1934年秋,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来资兴、汝城,开辟新的游击区,将李林带领的游击队改编为该团的教导连。李林不满意团长李宗保专横跋扈的作风,带了一个通讯员离开部队回郴县活动。1935年春,他在郴县找到了地下党组织,并串连红军长征留在当地的6名伤病员,组

成“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李林任大队长。下半年，游击队发展到 30 多人。1936 年春，他到广东坪石找到谷子元，又到乳源找到贺畔朵。在这里，通过贺畔朵找到那个退伍团长，买了一些新驳壳枪，扩大了队伍，活动在郴县、宜章、乐昌、乳源一带。夏天，游击队在郴县一个山头遭敌袭击，伤亡 20 多人，只剩 10 多人。下半年又发展到 20 多人。他和蒋副队长带队伍到衡阳四方山来找湘南特委。因沿途遭敌人跟踪追击，在宜章境内受损失，又只剩下 10 来人。后在宜章一个山头宿营时，被敌包围，除李林、杨绍良和黄凤(女)外出及蒋副队长来找特委外，其余同志壮烈牺牲。

在我见到李林时，当地游击队仅有 6 人 7 条枪，即李林、蒋副队长和 4 个战士。我们住到坪石进去 10 多里的深水坝曹金芳(永兴人)窑厂里。一天下河游泳，不慎又淹死两个战士。这样，游击队只剩下 2 官 2 兵，另有三、四人在别处活动，已不成其为队伍了。经过研究，决定改为武工队，我也参加，由李林任队长，以宜章、乐昌为中心开展斗争。谷子元去桂阳、嘉禾、临武一带，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开辟工作。

武工队既打击敌人，又做群众工作。我们组织了贫雇农团，挑选青壮年组成不脱产的游击组。通过贫雇农团领导农民抗租抗税，一般中小地主来收租就轰走，恶霸地主民愤大的经群众决定，由武工队查明后逮捕枪毙。这样，地主恶霸再也不敢来了，形成了几小块群众武装割据的根据地。仅几个月时间，几名成员的武工队发展到 60 多人枪的不脱产的游击队。我们还组织了 300 多人不脱产的群众性的游击组。参加贫雇农团的有几千。

坪石地处两省三县(湖南宜章、广东乐昌、乳源)交界，活动范围大，加上群众拥护和帮助，反动派很难“剿”到我们。一次，敌人从乐昌县调来两个连“进剿”。我们游击队迅速转移到大山上

去了,当地游击组各归各户,一下子销声匿迹。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实力,也摸不准我们的去向,只好偃旗息鼓回县城。

在坪石附近,我们的群众基础比较好。我们还把工作做到敌人碉堡里面去了,外攻内应地打了几个敌人碉堡。每次出击,我们都预约时间地点。在侦察了解敌人的情况后,晚上我们下山,游击组、贫雇农团闻风而动,集合几百上千人上路,声势浩大,卡道口,断援兵,围碉堡。敌人只好举手缴枪。如坪石附近有一个五六百人的村子,几个地主老财靠碉堡武装保镖。我们发动群众,做守碉堡人员的分化瓦解工作,向他们讲明政策,不杀不抓,只缴武器。在攻打碉堡的那天,他们果然投降,我们缴获了十几杆枪。

打土豪劣绅,我们也都在晚上。我们规定打土豪得来的东西,分配政策是实物完全归当地游击组和群众,金钱抽百分之十五归游击组,其余都归游击队。群众每次参加打土豪都得到实惠,很满意。

在坪石开展工作后,我又乘车到衡阳,去找李国兴联系。这天到了五塘铺,当地一个老百姓看到我就打招呼:“出事了,你快些走。”我请他搭口信给许作霖,到衡阳市一家旅馆来找我。

第二天,许作霖就来衡阳找到我了。他告诉我,他从坪石回家后不久,在铁子塘当乡长的姐夫就来告诉他:“你们中间出了叛徒,叫你那几个伙计快走!”原来,当地有个大革命时期的老叛徒,怀疑我们几个外乡人,威逼熬谷芽糖的那个姓唐的地下党员供出了我们的来历。这个老叛徒马上报告乡公所邀功。乡长又赶紧通知了许作霖。许作霖说他接到通知后,以朝南岳山菩萨为名,连夜将李国兴送往南岳,姓林的干部和我原来的警卫员小罗也转移到四方山去了。

我没有找到李国兴,随即回坪石。以后一直没有李国兴的音

讯。

1937年春，我带一个通讯员（祁阳人），由坪石去耒阳视察工作。在耒阳株木山的山棚里，见到县委书记李振鹏和游击队长刘厚总，听了他们的汇报，向他们介绍了李林游击队的情况。一起研究了工作。他们还谈了周兆奎（又名周朝桂）的叛变情况。周兆奎原是耒阳县代理书记，带枪投敌，叛变后带着敌人到处设卡子，企图抓共产党员和游击队的指战员，但全部落空。国民党反动派感到他没有多大用处，还是把他杀了。我和通讯员在株木山山棚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以挑杂货担为掩护，仍回坪石。

当时，在敌人“围剿”、封锁下，我们听不到党中央的指示，也看不到上级的文件。我们在开辟新游击区的斗争实践中，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改变了过去“左”的烧杀政策和侵犯工商业者的一些作法。在农村，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民愤很大的恶霸地主。对一般地主豪绅，只要他不反共，不再欺压老百姓，就不杀他。对保甲长，也只要他不反共，不办坏事，就让他继续当。有的保长还是“白皮红心”，表面上敷衍敌人，实际上为我们办事，通报敌情。同时，我们学会了做统一战线工作，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和小商小贩的合法利益。商人到乐昌、广州贩运粮油布匹、日用百货，这既有利群众，也方便我们。因此游击队允许他们做生意赚钱，不去侵犯，这就使群众感到游击队不是敌人诬蔑的“土匪”，而是为人民谋利除害的，纷纷靠拢我们。

坪石有一个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老百姓恨之入骨。一天，乘他讨儿媳妇大办酒席的时候，我们十几个人化装成客人，身藏短枪，前去“贺喜”。筵席上，当他洋洋得意地举杯鸣谢宾客时，我们闪电般地将这个恶霸逮捕，并拿出早已拟好的布告，当众列数他的罪恶，将其镇压。我们杀了这个恶霸，但不连及他的亲属子女，没有拿他家分文财产，也没有拿客人送的礼金。这下影响很

大。群众都说：“游击队为民除害，只办首恶。”但“杀一儆百”，一般地主豪绅也就不敢放肆作恶了。

经过一年多时间，游击队发展到 100 多人，同时建立了一些党的基层组织。在这种好形势下，我们一些同志又产生了麻痹思想。1937 年秋，敌人大举进攻沙河镇大山，我们闻讯转移隐蔽于深山密林中。敌人找不到我们，便把我们的住户抓住捆绑审问，但一无所获。狡猾的敌人便伪装撤退，实际上一部分敌人仍埋伏在我们的住户房子周围。贺畔朵同志沉不住气，要回住处。我们劝告他，等户主通知我们，敌人走了再回去。他不听，过早地下山。结果，一进屋便被敌人包围抓住，后送往乐昌坐牢。敌人多次提审逼他供出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情况，贺畔朵同志坚决不招供，英勇牺牲。

游击队改编 开赴抗日前线

红军主力长征后，在三年南方游击战争期间，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多么渴望得到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1938年1月，原湘南特委书记王涛以八路军的公开身份来到坪石，住在他原来老联络点的饭铺里。刚好我派到坪石办事的通讯员来到这个饭铺，饭铺的同志告诉他：“党中央派王涛同志回来了，到坪石来找周礼！”通讯员随即把王涛接来坳丘。

我们见到王涛同志就象见到亲人一样，非常高兴。王涛向我们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以及党的方针、政策。他说我这次回湘南的任务是：把湘南党领导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一部分，开赴抗日前线；成立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推动湘南的国共合作，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还告诉我，刘霞在牺牲前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湘南特委还存在，由周礼负责，所以他来坪石找我。

原来，四方山分手后，湘南特委组织部长刘霞，团特委副书记王崇甫，还有地下党员邹代富、刘泽华等4人，分两组在耒阳、安仁边境活动。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大搞“清乡”，王崇甫被敌人吓破了胆，受不了艰苦斗争环境的考验，便起叛心。一天，王崇甫和刘霞住在安仁县的王家背，王崇甫先偷了刘霞的快慢机手枪，然后用自己的白郎林手枪向刘霞背上打了一枪，随即带着两支手枪仓皇跑到耒阳坪田投敌。刘霞带伤走到邹代富家，要邹代富；

的儿子通知当地共产党员赶快躲避。刘霞随即转移到耒阳丹田高岭一个庙里。请了老中医陈海清治伤。王崇甫叛变后,带着敌人来捉刘霞、邹代富、刘泽华和当地党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几天内抓了100多人,邹代富的父母、妻儿和岳父母都被抓。因叛徒龙辉廷告密,敌人又派叛徒王崇甫带兵到丹田高岭将刘霞抓捕,连夜押往耒阳县城。刘霞是耒阳人,大学生,他从中央苏区随红军长征到湘南,奉命留下坚持斗争。他被捕后,耒阳国民党县长软硬兼施,要他自首,刘霞宁死不屈。关押期间,敌人逼他写信劝我们下山,他坚决不写。他在狱中写了一首诗:“不顾家来不顾身,只为国家与人民,漫道十年驰驱苦,真金岂怕火来焚!”1937年9月,刘霞被敌人杀害。临刑时他还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在此以前,他秘密地写了一封信给党中央,汇报了湘南特委的情况。因此,毛主席派陕甘宁边区统战部副部长王涛以八路军中校秘书的身份,来湘南工作,并在坪石找到我们。

我们见到王涛后才知道,国民党当局于1937年10月2日正式宣布,将南方江西、湖南、福建、广东、浙江、湖北、河南、安徽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新四军的成立,标志着南方各游击队的斗争,步入抗日救国的新阶段。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分局还发表了《告南方各游击队的公开信》。

王涛和谢忠良、刘伟文等同志是1937年底,从延委出发来湘南的。他们到郴州后,王涛即以八路军代表名义,同湖南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黄少谷、保安司令欧冠(后陆瑞荣),洽商将湘南中共领导的几支游击队编入新四军事宜。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团结抗日;在郴州设立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下山整训,编入新四军,开赴抗

日前线，整训期间供给由当地政府负责。

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湘南地区活跃着由原湘南特委领导的三支游击队，这时都进行了整编。

一支是蔡会文（已牺牲）、游世雄等领导的活动在桂东、汝城和江西上猷、崇义一带的湘粤赣游击支队。我曾在这支游击队任政治部主任，代理湘粤赣特委书记，后兼政委。1937年10月，新四军负责人项英、陈毅派人送信给游世雄，说明国共合作抗日，指示游击队集中待命，并派人与当地国民党政府谈判，准备改编为新四军。游世雄等随即到桂东桃寮与国民党代表郭大为（郴州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谋）、黄存善谈判，随后又到汝城与郴州保安副司令胡凤璋和汝城县县长会晤，商谈了游击队下山整编有关问题。当时商定：以桂东沙田地区为游击队集中地点，60华里内由游击队设防。游击队下山集中时200余人，改称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队。通过整训扩军，1938年2月从沙田出发开赴江西时为300多人，后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及第三营一部。王涛来湘南时，这支游击队已奉令整编，因此王涛没有去这支游击队联系。

一支是李林领导的活动在宜章、郴县和广东乐昌、乳源一带的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后改称抗日红军游击队。王涛来湘南和我联系后，我即通知李林，一方面集合游击队员，进行形势和任务学习，动员整编；一方面和国民党地方当局商定游击队整训地点和有关事宜。1938年2月，我们这支分散在乐昌、乳源、宜章山区活动的游击队100余人在坳丘集中，开往郴县良田。国民党当局认为良田是交通要道，担心在这里整训影响太大。于是郴州保安司令陆瑞荣亲自打电话给我，一面表示慰问游击队，一面商量部队整训地点。经协商，部队再开往宜章赤石整训。当时我们和郴州国民党有关方面议定，为避免冲突，国民党军队撤离

我们驻地 30 里,沿我们游击队从坳丘开拔到宜章、郴县所行道路两边让开 15 里。游击队到达赤石三望坪学校里住下,仍然保持警惕,战士们把学校围墙中的砖取下来做枪眼,作好战斗准备。整训中,由延安派来的八路军谢忠良等 4 位同志当教员(其中两位原是东北流亡学生)。谢忠良教军事,20 岁姓欧阳的同志和湖南学生陈润教政治,16 岁的王志萍教文化,教战士们唱《大刀进行曲》。我们还进行了扩军,游击区的群众热烈响应党的抗日救国的号召,发扬光荣革命传统,纷纷动员亲人参军,出现母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入伍的动人场面。经过整训、扩军,我们这支队伍扩大到 180 多人。3 月上旬,开往耒阳江头继续整训。

支是刘厚总领导的活动在耒阳、安仁一带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后改称抗日锄奸队。王涛和我们取得联系后,又到耒阳找到耒(阳)安(仁)中心县委书记谢竹峰和刘厚总游击队。他们先后同耒阳和安仁的国民党县政府代表谈判,达成游击队下山整训协议。随后,游击队在天门仙集中,经通水铺到江头刘氏宗祠整训。当地群众争着送来粮食、蔬菜、猪肉、鞋子,热烈欢迎游击队,游击队集中时五六十人,经过前段整训、扩军,达 150 余人。

两支游击队在耒阳江头汇合,继续整训、扩军。一个月后,李林带领的游击队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一大队,刘厚总带领的游击队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二大队。两个大队共扩充到 400 余人。4 月中旬,部队从江头出发,到灶市乘火车去江西。部队出发时,沿途群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热烈欢送。灶市上空飘扬着抗日义勇军的红旗,耒水两岸回荡着嘹亮的抗战歌声。火车载着抗日指战员驶向江西。部队到达江西新四军驻地后,改编为新四军军部特务营三、四、五连,李林任特务营副营长。刘厚总到新四军教导队学习,后任副军长项英的副官,在 1941 年“皖南事变”时叛变。

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

1938年2月,我依依不舍地离开共同生活和战斗的游击队,到郴州参加重新组成的湘南特委工作。新成立的湘南特委成员为:特委书记王涛,组织部长周礼,宣传部长卢良,职工部长蔡坚,秘书长余稼生,耒(阳)安(仁)中心县委书记谢竹峰,郴县县委书记张春林,桂阳县工委书记谷子元,桂东县工委书记顾星奎,永兴县工委书记黄平,宜(章)乐(昌)县工委书记肖林等。

同时,在郴州中山北街设立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湘南特委书记王涛兼任通讯处主任。公开工作人员有余稼生、张子芳、彭太保等。通讯处对外是新四军的留守机关,对内是湘南特委的地下党组织秘密联络点。当时我们曾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在郴州、桂东、耒阳分别设立新四军后方留守机构,但国民党当局只同意在郴州设通讯处。在桂东曾设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不久撤销。在耒阳只许设《新华日报》分销处,实际上也起通讯处的作用。

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的主要任务是:将湘南的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后,料理新四军后方勤务,做好新四军将士家属工作;宣传抗日救亡,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斗争,支援前线;同时为湘南特委秘密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提供有利条件。当时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新四军通讯处设立后,湘南特委就可以利用这个合法机构作掩护、半公开或秘密地进行党的工作。我住在离新四军通

讯处半里多路远的裕后街靠河边的原万胜旅馆旧址里。旅馆早已歇业，前门是国民党县政府开办的一个供销合作社，负责人是地下党员曹元养，掩护了我们的一些活动。

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认真做好前方将士家属的优抚工作。王涛、周礼、卢良、蔡坚等同志经常向家属们进行慰问，及时介绍前方将士英勇抗战的情况，鼓励家属们安心后方工作，搞好生产，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支援前方抗战。对家属们提出的要求，通讯处能办到的就尽量满足。家属们也把通讯处的同志当成自己的亲人，家属有什么事情，心里有什么想法，都找王涛周礼等同志谈。通讯处工作人员少，新四军将士家属又分散在湘南各县。因此湘南特委和各地党组织都配合和协助通讯处做好前方将士家属工作。李林的爱人黄凤是共产党员、原游击队战士，因新四军不许带家属而留在郴县良田老家。良田离郴州50里，我多次去良田慰问她，有次去还帮她的姐姐开药方治好了病。由于通讯处做好了家属工作，使前方将士能够安心抗战。

通讯处非常重视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5月，湘南特委和通讯处通过统一战线关系，由潘实芬、李达九等开明人士出面，集资筹办了牖智书店。书店设在通讯处楼下，负责人为地下党员左代运（后自首）。书店发行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新华日报》、《观察日报》、《群众》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进步书刊。书店还成立了读书会，组织进步青年学习，介绍读者阅读进步书刊、举行读者座谈会。同时创办了《老百姓周刊》，贴在街头和交通要道，宣传团结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道理，揭露日军侵略中国的罪行，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当时还成立了歌咏队，唱抗日歌曲，作抗战宣传。湘南其他县的党组织也利用各种关系，用各种名义，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培养进步分子和抗日骨干。如汝城开办星光书店，创办《星光》半月刊；宜章设立战地文化服务处分处；耒阳设

立《新华日报》分销处；桂阳创办战时中学，等等。湘南许多青年到通讯处要求参军抗日，保卫国家。1938年春节，郴州青年还组织了一支日货收缴队，收缴和烧毁日货。通讯处和党组织通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等活动，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又可以从中发现和培养信奉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为发展党组织打下思想政治基础。

1938年夏至1939年初，湘南特委多次在郴州万胜旅馆、汝城耕读村、郴县栖凤渡等地举办县、区、乡党员干部训练班；培训各级党员干部。在万胜旅馆举办的两期训练班，培训县一级党员干部，每期15天，学员20人左右。主要由王涛和我讲课，讲党的性质、任务，党的建设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和统一战线工作等。发给学员学习的有《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以及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著作。

王涛的公开身份是新四军中校，在公开场合穿军官服，到党训班讲课时，就改穿便服，秘密绕道来万胜旅馆。他讲课深入浅出，很有针对性。一些学员多年参加游击战争，钻深山老林，或从事地下工作，秘密活动，很少看到党的文件和革命书报，消息闭塞；同时经历残酷斗争，眼见许多革命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充满阶级仇恨，因此听说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一时想不通。王涛就针对这种思想，讲抗日战争形势和国共合作抗战的道理，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帮助大家提高认识，使大家的思想和工作，能够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坚持联合与斗争相结合的方针。

1938年秋冬，在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普遍开展抗日民众训练工作时，我们还通过民训员中的党员，在郴州、栖凤渡、良田等地举办民众训练班，与当地党组织联系，培养抗日骨干。从

1938年春天开始，湘南特委利用通讯处这个合法的机构，秘密进行党的工作，积极恢复和发展各地党的组织。宜章、郴县、汝城、桂东、桂阳、耒阳建立了县（工）委，永兴有党小组。1938年党员发展到700多人。1939年党员发展到1400多人，开始发展党员，主要找大革命时期入过党的和参加过农民协会的积极分子。首先了解他们的历史、政治态度，只要没有叛变和自首，拥护共产党，工作又积极，合乎党员条件的就可以入党。我直接联系的栖凤渡支部，支部书记就是大革命时期的女党员杨晓芝。随后我们又注意从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我还直接联系城区铁路工人支部，支部书记姓李，是火车司机，广东人。郴县由特委委员张春林兼任县委书记，党的工作很活跃，先后建立了6个区委。杨晓芝还担任了栖凤渡区区委书记。日军占领郴县后，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

当时国民党虽然口头上也讲与中共合作抗日，实际上推行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不允许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不允许宣传国共合作抗日救国，还派特务侦查和监视新四军通讯处，跟踪通讯处工作人员和来往人员。

革命队伍中也有一些人经不起考验，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威胁利诱下叛变自首。通讯处的秘书余稼生，就是被伪装参加抗日宣传活动的国民党特务蒋介石引诱叛变的（据解放后蒋介石交代材料）。据我了解，余稼生在中央红军长征路过坪石时，就离开部队，以后又脱离当地党组织，曾在乐昌国民党政府里工作。他来新四军通讯处工作后，有的事又引起我的怀疑。如我们每月只有4元零用钱，可是他却花40元买了一件呢子大衣，钱是哪里来的呢？有的同志对他经常打听别人的行踪，也产生怀疑。于是我和王涛商量，将他暗中清洗出党，不通知本人，并把他调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39年春，有天我和王涛出外散步，边走

边商量一些事情，在苏仙桥附近忽然碰到余稼生。王涛问他是怎么回来的，有没有介绍信。他说回来和黄星结婚，没有带介绍信。后来，我们通过国民党里的内线，知道余稼生向国民党报告了一些我们的情况。以后牖智书店负责人左代运自首，和他也是有关系的。好在他不知道其他地方的党员，不致影响各县党组织。我们随即向省委报告了这一情况。省委通知凡暴露了的党员，都要转移撤退。

1939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新四军驻平江嘉义通讯处主任涂正坤和罗梓铭等6位同志，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郴州形势骤然紧张。此时王涛已是省委委员，随后转移去长沙，由我担任湘南特委书记职务。

此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面目日益暴露，郴县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也在伺机破坏郴州新四军通讯处。幸亏县政府里有自己人，我们事先得到通知，顽固派快要向我们下手了。特委的同志便都隐藏起来，我也住到郊区一个地下党员家里，王涛的爱人张子芳把一些文件烧掉了。王涛的一支手枪也由特委宣传部长卢良带走，藏在他住的民主人士潘实琴家里。大家做好了应变的准备。

8月的一天上午，张子芳得到消息，国民党顽固派要采取行动。书店负责人左代运不知到哪里去了。通讯处和书店剩下张子芳和彭太保，张子芳还怀抱着生下没有满月的小孩。不到两个钟头，约一个排的国民党军警，包围了牖智书店。一个县政府的人问张子芳：“王涛哪里去了？”张子芳说：“到省里开会去了。”张子芳反问：“我们犯了什么法？”那人说：“你们进行赤化宣传，反对国民党。”他们打开王涛的箱子，里面是从延安带来的书。他们翻箱倒柜，一无所获，便把书店的进步书刊没收，查封了书店。张子芳抱了小孩到书店旁边巷子里地下党员刘星家里暂避。彭太

保把被军警丢在门外的行李铺盖，存放在斜对面豆腐店里。当国民党军警查封牖智书店时，一个地下党员的女孩子看到了这种情况，很机警地到我住的地方，把情况告诉了我。我即通知郴州党组织注意隐蔽，并把张子芳转移到裕后街开鞭炮铺的地下党员谷安昌家里。

这次事件前，省委组织部长郭光洲曾来郴州，通知我转移到长沙，去省委组织部工作。国民党封闭牖智书店的第二天，我便通过铁路支部的同志，买了两张去长沙的火车票。在他们的掩护下，当晚我和张子芳分别上了火车。我们没有坐在一个车厢里，见面时也不打招呼，装着不认识，谨防特务跟踪。第二天我们到了长沙，找到省委后，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国民党顽固派查封牖智书店，同时破坏了新四军通讯处。通讯处和书店人员离散后，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也就不存在了。

我去省委工作后，湘南特委由宣传部长卢良负责，卢良不久调来长沙又失踪了，湘南党的工作由谷子元负责联系。

1940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再一次发动反共高潮，并于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极力反共，大肆进行清查共党活动。许多共产党员甚至新四军家属惨遭杀害。家住郴县良田的新四军特务营副营长李林的爱人黄凤，也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后英勇牺牲。

解放后据郴州国民党特务交代，当时他们得到情报，说共产党在坪石一带和白石渡附近搞武装活动，有几十条枪，是湘南特委周礼领导的，他们想通过查封书店和捕人，侦悉周礼的情况，追捕周礼，结果连周礼的影子也没有找到。其实国民党特务的这个情报也是假的。当时湘南特委并没有搞什么秘密武装活动。直到1944年日军进犯湘南后，宜章、郴县、耒阳、永兴等县地下党组织和党员，才领导成立抗日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军。

两次去南方局汇报和学习

1940年9月,省委又决定我担任湘南特委书记,委员有谷子元、范卓等。湘南特委机关设在衡阳。不久改由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

这年2月,原湖南省委委员任作民向党中央作了《关于湖南诸般情形及党的工作的报告》,其中谈到湖南的政治情况:省政府主席薛岳积极反共,发生了平江惨案,不准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在湖南居住,调查和破坏中共组织,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等。党中央据此报告,于4月22日发出《关于湖南工作的指示》,提出“湖南党的工作总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你们无论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应按照这一方针来一个彻底转变。”

在此前后,各地暴露的干部,即调换工作地区,或去延安学习。同时加强党员教育、审查,将自首、动摇分子清除出党。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各地都在搜捕共产党员。湖南的一些党组织被破坏,一些党组织负责人撤退、转移或隐蔽起来,一些党组织失去联系,停止活动,还有一些党员自首、叛变。我们执行党中央关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工作方针,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同时严格审查党员,整顿组织,清理奸细。到1941年5月,湘南党组织经过初步整顿,耒阳、郴县、桂阳、宜章、祁阳、衡山等县,共有22个支部,109名党员,其他县的党组织尚

待整顿和恢复联系。

1941年7月，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通知我去重庆南方局汇报工作，并告诉我到重庆后的联络地点和接头暗号。

我化装成一个商人，一路应付国民党军警盘查，经贵州到了重庆。在重庆一家药店，找到了联系人。他带我到一条街道旁边等着。不久，一辆小汽车驶过来，“嚓”的一声在我们身旁停下。药店同志叫我赶快上车。我刚上车坐好，车又迅速开走。

车上坐着一位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同志，两道浓眉，目光炯炯，面带笑容。他亲切地和我握手说：“我是周恩来。你是湖南来的周礼同志吧！”当我知道他就是周恩来同志时，心里很激动，忙回答：“我是来向您汇报湘南工作的。”他说：“一路辛苦了，遇到不少困难吧。”接着他解释了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接我到办事处去。我才知道，当时重庆国民党特务如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周围的住户、卖纸烟糖果和做各种小生意的摊贩，不少是特务。我们做秘密工作的同志，要特别小心谨慎，进出八路军办事处，都有被特务跟踪逮捕的危险。坐周恩来同志的车去八路军办事处，特务便不敢公开拦车抓人，比较安全。

周恩来同志还向我说了这样一件事：不久前，湖南来的一个姓朱的交通员，清早从办事处下山时被特务抓走了。特务逼他到八路军办事处搞情报，他假意答应了，特务就放了他，他回办事处后，马上将这件事向领导上交代了。领导批评了他，将他开除出党，送到延安去了。我知道这个交通员叫朱忠源，后来在延安恢复了党籍。

周恩来同志用车接我到办事处后，对我说：“你就住在办事处，看文件，学毛主席著作，写工作报告，平时不要随便出去。”

以后，我就以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同住一起的还有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福建等省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周恩来同

志几乎每个月都作一两次形势报告,每次我们都和办事处的同志一起听。过去,由于地下工作环境,不仅很少听到党的形势报告,也很难看到党的文件。现在我们都如饥似渴地认真听报告,看文件,把要点记在心里。

搞地下工作有时也秘密传看毛泽东著作,但是哪有现在这样好的学习机会。毛泽东同志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刚一到,周恩来同志就要我们认真学习。我读了又读,重要的段落都能背下来了。比如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向社会作调查,要学会阶级分析的方法,要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要正确执行党的策略路线,等等,一直记在心里。我们还学习了毛泽东同志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毛泽东同志教育干部要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统—,批评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特别是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记得他给这种人画像;还引了这样一副对子:“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当时不允许带毛泽东著作和文件回湖南,靠自己背熟一些回来传达。

周恩来同志要我写一个工作报告。我在报告里,详细写了湘南斗争历史和现状,群众思想情况。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黑暗统治情况,湘南党的组织工作和抗日救亡群众工作情况,等等。过了几天,周恩来同志找我去他楼上的办公室谈话。他告诉我,看过我写的工作报告了。他说:“现在国民党反共,破坏国共合作抗日,同志们的斗争是很艰苦的。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党的组织要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方针。革命斗争是长期的,要吸取大革命时期的教训,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保存干部。党组织要搞单线联系,暴露了的党员和干部要撤退、转移。要建立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同时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与反共顽

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要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互相配合。党员干部要职业化,进入文化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多交朋友,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要深入基层发动工农群众,同时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团结抗日。

这期间,南方局组织部长孔原同志也和我谈了党的组织工作,并告诉我,湘南特委仍由湖南省委领导。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周恩来同志在办事处传达了中央指示,作了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形势报告。他随后通知我,回湖南传达党中央的这个指示和南方局的工作部署。并告诉我: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准备调走,委员文士桢和一个电台女同志也要撤退。原省委领导成员走后,就成立新的省工作委员会,要我担任书记。

1941年12月中旬,我离开重庆回湖南。1942年1月间,我按照南方局告诉我的省委在邵阳的联络点,去找高文华同志。第一次没有找到。第二次去才找到高文华同志,向他汇报了去重庆的情况和南方局的指示。

1942年3月,省委在湘乡街埠头召开工作会议,我参加了。高文华同志传达了周恩来同志关于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的讲话,和党员要勤业、勤学、勤交友,做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三勤、三化”的指示。我在会上也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还传达了毛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主要内容。我差不多把几个主要段落词句都背出来了。高文华同志还说:“你的记性真好!”

这次会议决定: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没有暴露的党员,要切实

做到职业化,隐蔽到各中小学校和工业、商业等部门里去,勤学习,勤业务,勤交友,扎根于基层,争取群众。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压迫人民的活动,要通过民主人士和地方实力派,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会后不久,文士桢同志和电台女同志撤退到延安去了。

这年冬天,高文华同志和他的爱人贾琏同志也撤退到延安去了。他们走之前,决定成立省工委的三人领导小组,以后省工委由我和张春林、刘鼎三人组成。

省工委在湖南沦陷前的一年多时间里,主要整顿、发展党组织,做抗日救亡宣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3年冬,张春林因肺病去重庆医治。

1944年5月下旬,正是日本侵略军向湖南大举进攻的前夕,我又接到南方局通知,去重庆汇报工作。这次我也作了去延安学习的准备。我仍化装成商人。经桂林、贵州到重庆,在路上走了近半个月时间。到重庆后没有几天,就听说日军占领涪口了,6月18日又占领了长沙。这次在重庆,除向南方局汇报工作外,还学习了整风文件,如《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件看后不准带走,一些重要内容全靠背熟记牢。这时,周恩来同志已去了延安,由董必武、王若飞同志负责南方局工作。王若飞同志在南方局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整风的阶段学习小结。他还多次和我谈工作情况,并作指示。

1944年7月间,董必武同志向周恩来同志并党中央,写了派干部去湘南组织抗日游击队的请示报告。提出日军将打通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线,敌后空虚,准备派周礼、张春林或谢竹峰回湘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张春林在重庆医治肺病,这时已出院,谢竹峰在我之前来重庆,后仍去延安。

10月间,王若飞同志和我谈话:“中央决定派一支部队南

下,创建湘粤赣革命根据地。你对湖南情况比较熟悉,就不去延安了,准备回湖南,和南下部队取得联系,开展敌后人民武装斗争。”

随后,南方局派我和张春林回湖南。董必武、王若飞等负责同志和我们布置任务,提出回湖南后,要做好恢复、发展和巩固党组织的工作;在敌后各县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在日军没有占领或暂时占领地区,党组织切莫过早暴露,以免国民党顽固派袭击和破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干部,仍应坚持隐蔽、精干、待机方针。

这时正是国民党军队从湘桂大撤退的时候。我和张春林从重庆搭上一辆货车,到了贵阳。在贵阳找到南方局贵阳交通站的负责人李鳌。他在贵州省财政厅工作。李鳌同志告诉我们,在日军进攻湖南时撤退到桂林的何大群、朱汉樵、王来苏、龙仲和我爱人常杏云等同志,在日军侵占广西时,已离开了桂林到了金城江,准备经过贵阳到重庆去找我。他们带的钱快用完了,缺少路费,生活困难。于是我留下一些钱,请李鳌转给何大群等同志,并转告他们,我已从重庆回湖南去了,他们不要再去重庆,可回湖南到湘乡县的薛家渡刘资生弟弟刘桂生家找我。

当时从贵州到湖南不通汽车,路上到处有国民党的军警特务盘查,山路崎岖,常有土匪出没。辰溪、洞口等地沦陷区还驻扎了日伪军队。我们通过李鳌,由邓晏如同志在贵阳开的书店办了一个通行证明,说我们是到湖南去买纸的。我化名唐积德,和张春林都穿长袍,装成做生意的人,和一些商人同路回湖南。途中经过不少国民党军警检查,遇有日伪军队驻扎的地方就绕道过去。走了半个月,才进入湘乡境内。从娄底过来不远,有乡公所盘查来往行人的哨口。乡兵检查我们的皮包,看到有几千元新票子,便借口说是假票子,要没收。我们和乡兵一起到乡政府,讲是

做生意带的钱。乡政府负责人看到我们给书店买纸的证明，又把票子退给我们了。我们终于安全到达薛家渡地下党的联络点，和当地地下党的负责人取得了联系。

韶山的斗争

1944年10月,我和省工委委员张春林从重庆回到湘乡薛家渡后,便和省工委委员刘鼎,还有刘资生等,一起在刘资生家开会,传达和讨论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有关指示和南方局的部署。会上,决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单线联系,秘密活动;二是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动群众抗日救国;三是派党员干部去湘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四是派一些党员进入基层政权组织,担任乡、保长,掌握乡保政权或建立两面政权;掩护党组织和地下工作;同时争取国民党的乡、保、甲长站到人民方面来,共同抗日。对伪维持会人员也进行争取教育,允许他们弃暗投明。

我回湘乡不久,何大群、王来苏、朱汉樵、常杏云等同志,在贵阳接到李鳌同志的通知,也从贵州回湖南,来到湘乡刘资生家。省工委即分配何大群、王来苏、朱汉樵等同志去湘南工作,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组织人民武装,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当时省工委指定湘南工作由谢介眉和何大群负责。在湘南各县活动的还有刘建安、刘东安、罗良名、范卓、徐行、何韬等同志。不久,成立了湘南人民抗日游击组织,宜章、耒阳、郴县、桂阳、永兴、安仁等地相继建立了抗日游击队伍,发动和依靠群众,打击日本侵略军。

同时,省工委在湘中一带开展工作。1944年冬,在湘乡溪口

山斗冲成立湘中工作委员会，书记周礼，副书记张春林，组织委员刘鼎，宣传委员刘资生，加强了湘中地区党的领导。

我和张春林商量，韶山有党的基础，有光荣的革命传统，韶山人民觉悟高，又为湘潭、湘乡、宁乡三县边界地区，便于开展党的工作。于是决定，将省工委驻地由湘乡转移到韶山。首先在韶山和湘潭其他地方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带动湘乡、宁乡，影响湘中各地。

张春林随即到韶山，恢复党组织，成立了直属省工委领导的韶山特别区委会，区委书记毛浦珠，组织委员李勋启，宣传委员周汉平，委员还有王玄、刘正平，下辖三县边界5个支部。后来除韶山区委外，又成立了高露、石潭区委和南熏区委，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湘潭、湘乡、宁乡边区县工委。

1944年冬，我化名唐裕后，常去韶山了解情况，研究工作。1945年春节后，我和常杏云也从薛家渡转移到韶山。通过新选举出的清溪乡副乡长、地下党员庞柱中，给我找了一个教师职业为掩护。1945年春天，我就在韶山李家祠堂小学当教员，实际上由我爱人常杏云教书，我主要做地下党的工作。

那时韶山属湘潭县清溪乡。日本侵略军占领湘潭银田寺等地后，清溪乡的老乡公所就不存在了。我去韶山时，便和区委商量，如何掌握乡、保政权，成立抗日武装。我们计划：首先要掌握基层政权，成立两面政权的抗日乡公所，也就是表面上是国民党的乡政府，实际上是共产党掌握的乡政府。然后成立乡自卫队，成为实际上由我们掌握的抗日武装。而要成立抗日的乡公所，就要先找一个积极抗日的思想进步又有威信的乡长。我们物色了当地开明士绅刘伯庚，他和地下党员毛浦珠、毛泽普（1938年去延安）是同母异父兄弟，准备动员他出来当乡长。区委新吸收了政治思想进步并创办思三学校的庞柱中入党，要他当副乡长。

刘伯庚是国民党员，毛浦珠去动员他和共产党合作，出来当乡长。区委新吸收了政治思想进步并创办思三学校的庞柱中入党，要他当副乡长。

刘伯庚是国民党员，毛浦珠去动员他和共产党合作，出来当抗日乡长时，他说：“国民党几百万军队尚且打不过日本人，共产党有什么办法！你们又搞共产党，要记得民国十六年的教训啊！”他说的“民国十六年的教训”，就是1927年5月在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湖南杀了不少的共产党员。毛浦珠告诉我，他找他大哥刘伯庚谈了三次，都没有说动他大哥。

于是我们商量，再动员他们的老母鹿二娣出面找刘伯庚。鹿二娣年轻时，在堂侄毛泽东的指导下，曾在清明时节带领一批妇女闹过祠堂，是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以后又支持儿子毛浦珠、毛泽普做革命工作。这天傍晚，她不顾寒风凛冽，路滑难行，拄着拐棍，由毛浦珠陪着来到刘伯庚家。晚饭后，围炉谈心。她说：“伯庚，娘跟你商量一件重要事情。满伢子（毛泽普）已经到了泽东那里，三五伢子（毛浦珠）也是共产党员，娘也跟他们走，如今就看你了。”刘伯庚听娘说这件事，好久没有开声，老太太又说：“好歹就在今晚，要嘛你就跟老弟和娘走，出来做事；要嘛你现在的就把娘和老弟捆起来，随你送日本也好，送给国民党也好。。刘伯庚听娘说这么重的说，忙说：“我当然跟娘走。不过，就是三五伢子他们领头，我不大放心。”意思是上面还要有党的领导人。

毛浦珠又把这次谈话情况告诉我，要我也去找刘伯庚谈谈。第二天晚上，我和毛浦珠一起到了刘家，向刘伯庚介绍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共产党的政策、韶山一带开展抗日斗争有利条件，动员他出来和庞柱中一起组织新的乡公所，抗日保乡。经过谈话，他欣然同意了。

不久，在当地开明士绅毛国翘和何海清等支持下，正式成立

了刘伯庚任乡长、庞柱中任副乡长的乡公所。随后刘伯庚也加入了共产党。

这个乡的部分保长,也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如韶山冲的毛特夫。就先后担任过清溪乡第七保、十五保的保长。庞甫元、谭大钧、彭承先、孙倬等,也都是经过党组织批准,在群众支持下,先后通过竞选,担任过保长。

乡公所成立后,积极筹备乡的自卫队。一方面搜集先前埋下来的旧枪,一方面由一些愿意抗日保乡的开明地主、士绅捐款买枪。成立自卫队时有10多条枪,以后增加到40多条枪。党员毛义担任自卫队队长。自卫队员都是经过挑选的可靠的农民,有的还是党员。地下党组织一直掌握着这支武装。

进步人士汤菊中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马日事变后和党组织失去联系(早些年恢复党籍),但仍做了许多有益于革命的工作。他和黄埔军校四期学生肖荣敷(也是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是郎舅,介绍肖荣敷到国民党的特务武装别动队(又名正义军)担任教导营第一中队长。随后地下党组织派党员周汉平、张孔修、钟耀夫、谭大钧等到这个中队(对外称大队)任书记官、军需、文书等职。于是肖荣敷改变别动队专门反共并以韶山地区为主要对象反共的作法,进行抗日。他把部队布置在日军据点狮子山周围,与日军打过遭遇战、进攻战,还杀了作恶多端的汉奸龙二麻子。

清溪乡三民主义青年团负责人彭友维,也搞了一个战时服务大队第31大队的武装,还想扩充势力,把乡自卫队的枪搞到手。1945年春,他们趁乡长刘伯庚没有防备,从三仙坳开会回家,途经大塘湾第31大队驻地时,把刘伯庚抓了关起来,逼他交枪。副乡长、地下党员庞柱中,就用了一个“天牌压地牌”的方法,先找当地著名士绅毛国翘想办法。毛国翘在蔡锷任云南省都督

时，在云南省当过县长。他和在蔡锷手下当过云南护国军师长的何海清（当地称乔八大人）是儿女亲家，就去找何海清商量。他们联名给驻在湘乡一带的国民党第七十三军的一个师长洪振国写信，由庞柱中亲自送给洪振国，请他出面调停。洪振国就骑上马，带了卫队，去大塘湾找三青团的彭友维。清溪乡自卫队和乡警也在附近作了战斗准备，湘乡县那边的南熏、风音、弦歌等乡都派乡警来支援我们。洪振国对彭友维说了硬话：“乡公所的枪是保卫地方的，你们不能要，赶快把刘乡长放了。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彭友维吓得出汗，只好放了刘伯庚。

当时韶山附近，有驻扎在银田寺和狮子山的日伪军队，有银田寺和敌伪维持会，有国民党的正义军，有三青团掌握的战时服务队第31大队武装，还有圈子会（川子会）搞起来的游击武装，情况非常复杂。我们除掌握乡自卫队外，还派人打入正义军教导营和战时服务队31大队。游击武装和日伪军队有过小的战斗。由于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日伪军队平时也不敢随便出来拉夫虏枪，骚扰老百姓了。

韶山地下党组织还通过党员、进步人士掌握的乡和部分保的政权，与敌伪维持会对抗，并且发动群众，开展了抗缴日军、伪维持会以及一些游杂队伍强征勒索和摊派粮款的斗争。

几支游击队

湖南沦陷后，日本军队在沦陷区杀人放火。强奸掳抢，无恶不作。老百姓非常痛恨，叫日本侵略军为“日本鬼子”。许多爱国人士，热血青年，到处揭竿而起，组织游击武装，打击日本侵略军。

有些国民党军队怕打日本侵略军，却要反共，欺压老百姓，老百姓把他们叫做“二本人”（湘潭方言叫“日本人”为“一本人”）。有一支被老百姓叫做“二本人”的反共的国民党别动队，名“挺进队”、“正义军”的，他们有美式装备，更是横行霸道，危害人民。在老百姓中流行一副对联：“挺鱼挺肉挺鸡婆，正当收入；进盐进米进法币，义不容辞。”这是对他们所谓“挺进”，“正义”的讥讽和鞭挞。

一些国民党反动军政人员、土豪劣绅、土匪、流氓，也打起抗日游击队的旗号，四出派粮派款，抢劫人民财产。他们还互相火并，“大鱼吃小鱼”，闹得鸡犬不宁，老百姓对他们也非常痛恨。

青洪帮也应时而起，龙头大哥占山头，各霸一方，招兄弟，大开山堂。入伙者每人交银洋3元、5元不等，说什么入了伙可以保身保家。一些游击队长都是他们圈子会中的头目。许多老百姓为保护自己，没有办法，只好加入圈子会。当时湘潭民间流传这样几句话：“日本鬼子梳子梳，二本鬼子篦子篦，游杂队用水洗，乡保长刮地皮。”说明老百姓受到重重压榨，过着暗无天日、

痛苦不堪的生活。他们要求组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盼望光复和解放。

省工委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关于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一面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或者派党员到抗日游击队去工作，争取领导权；一面和愿意抗日的游击队联系，争取他们靠拢共产党，或在国共之间保持中立，共同抗日。当时，省工委主要在以湘潭为重点的湘中地区活动。我和省工委委员兼湘潭县工委书记刘鼎、湘潭县工委组织委员张忠廉商量并决定：一、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开办党员训练班培养抗日骨干，组织抗日游击队；二、培养和串连抗日积极分子，组织以党员为骨干的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的抗日游击小组，宣传抗日，支持和配合游击队打击日伪军队；三、党员经批准可以参加国民党、三青团，担任乡长、保长等职务，掌握部分基层政权，为抵制日军、伪维持会和游杂队伍的强征勒索和进行合法斗争创造有利条件。

随即，我们建立了党领导的游击队，还争取了几支有名的游击队，打击日军，扩大了抗日的影响。

1944年秋，县工委委员张忠廉策动与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的贺侠，利用石门乡公所的30多条枪组织一支队伍，加入隶属国民党七十三军的游击队奋勇总队，成立挺进一队，贺侠为队长，党员陈松馥为副队长。随后又以该队名义，另组由县工委书记刘鼎直接领导的突击小队，有党员骨干杨汉钦、胡子霞、谭雄、杨太根、张梅勤等20多人参加。突击小队精干勇敢，机动灵活，经常在黄茅铺潭衡公路沿线伏击日军，用土制手榴弹炸毁敌人军车，破坏敌人军物资运输，夺取枪支弹药武装自己。有一天，他们和挺进一队的破坏大队配合，在黄茅铺附近伏击正在抢劫打闹的日军10多人，一次打死日军上10人，缴获步枪10余支。

湘潭沦陷后,出现一个传奇式的抗日游击队长马扬德,外号马福和尚。他生于长岭铺一个贫农家庭,幼年学裁缝,帮工。因生活困难,前途渺茫,在龙岩寺出了家,法名碧悟。念经拜佛之余,用心习武,练就一身武艺。他性情刚直,爱打抱不平。42岁时与黄花寺尼姑张福田一同返俗,结为夫妻。1944年6月湘潭沦陷后,日军烧杀掳掠,老百姓惨遭蹂躏。他义愤填膺,决心组织队伍抗日。他削篾为刀,与好友马杰在观音山下将一个掉队的日军刺死,夺得第一条枪。又一次乘敌人不备,用长绳将其勒死,夺得第二条枪。就这样组织起一支队伍,发展到60多人枪。

中共地下党良佳区委书记王春和,为争取马扬德抗日保乡,派地下党员唐兴、贺玉泉等4人参加马扬德游击队,贺玉泉任游击队参谋。县工委负责人张忠廉为争取这支游击队成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贺玉泉家和马扬德见面,向马扬德说明共产党抗日的方针政策,八路军、新四军的性质和纪律。马扬德很受教育,表示拥护党的政策,接受党的领导,坚决抗日,救国保乡。

1944年冬天,我在湘潭瓦窑塘,见到这里以教小学为掩护的县工委负责人张忠廉。他向我汇报了马扬德游击队的情况。于是我又和张忠廉一起到陈家垅竹丝塘贺玉泉家,约见了马扬德。这次主要商谈如何广泛地发动群众,联络其他武装,共同抗日。到年底,这支游队发展到150多人枪。

马扬德游击队经常出没在陈家、茶园铺、长岭一带,打击日军,夺取枪支弹药。因当时游击武装互相吞并争地盘,马扬德游击队先后遭国民党的七十三军奋勇总队一部和贺石生游击队的袭击被打散。1945年春节他集合旧部,再举抗日义旗,夺取敌人枪支,武装游击队,并要求地下党组织给他们配备党员干部,加强领导。省工委便派县工委负责人张忠廉亲自去游击队指导。县工委又派铁江区区委书记徐若飞到游击队任政治指导员,加强

游击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经我们同意，马扬德利用日伪给他的长岭铺护路大队长的名义，听编不听调，扩大队伍，从长岭到马家堰一带，配合当地游击队伍，打击公路上和湘江水上的敌人，屡建战功。

1945年7月底，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进入湘潭县。我在盐埠向王震、王首道汇报了马扬德和张鹏飞等游击队的情况。他们指示，马扬德可以吸收入党，并任命马扬德为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自卫军湘中游击队长，张忠廉为政治委员。随后，我和张忠廉就介绍马扬德入了党。

地下党组织还争取了张鹏飞游击队。张鹏飞入过国民党中央军校，当过连长，因对国民党不满，离队回乡。湘潭沦陷后，他不甘当亡国奴，为抗日保乡，在铁江坝地下党区委秘密支持下，借原国民兵训练基础，聚集了10多名抗日志士，组成忠信乡巡逻队。从一条枪开始，先后夺取了日军15条枪，成立了游击队。他们的誓言是：“宁可血战死，不当亡国奴，齐心协力，保卫家乡。”不久发展为一支拥有200多人枪的抗日队伍。

我和县工委研究，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争取教育这支游击队，成为与我们有密切联系的抗日武装。随即县工委负责人张忠廉派党员齐大康、王绍云等，参加到这支游击队里去做工作。游击队又名“飞部”，神出鬼没，日军惊呼为“大大的山狗”。1944年底，日军到坳柴冲虏掠。“飞部”在通向鬼子据点和伪维持会巢穴佛祖岭的石门岭埋伏下来。等日军带着抢来的粮食、猪牛进入伏击圈时，张鹏飞一声号令，队员们猛烈射击冲杀，20多名日军全部被歼灭，缴机枪一挺、步枪18支和一批战利品。这就是有名的石门岭歼灭战。

后来，南下支队也任命张鹏飞为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自卫军的队长。

湘潭县工委还争取了草莽英雄段四铁和马保忠等领导的游击队,使他们成为真正的抗日游击队。段四铁游击队有200余人枪,纪律较好,不骚老百姓。游击队长马扬德和段四铁都是汉流(圈子会)并有交往,县工委负责人张忠廉便在马扬德陪同下,亲自去汤丸子坳段四铁游击队驻地,会见段四铁,商谈联合抗日。不料第二天国民党专员、反共老手林芝云派来的政客蒋先余,也带了一个班的武装来找段四铁,企图拉拢、利用段四铁游击队。当场张忠廉和蒋先余就共产党和国民党对抗日态度的问题,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和舌战。张忠廉理直气壮地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抗日的功绩,驳斥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阐明了加强团结,停止磨擦,一致抗日御敌,才能挽救民族危亡的道理。这对段四铁影响很大。段四铁经过三四天时间的考虑后,向张忠廉表示,不接受国民党的收编、利用,更不会被日军欺骗拉拢,决定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共同抗日。张忠廉随即派党员陈作辑作联络员,加强和这支游击队的联系。

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湘潭县的党员已发展到600多人,以党员为骨干成立的抗日游击队,成为抗日游击武装的核心。党组织还掌握了一批乡保政权。如清溪乡的正副乡和自卫队长都是党员。石门乡有4个保的保长是党员,其中十三保的保长、保队副、经济主任、9个甲的甲长,都是党员。此外,还有一些和党组织有联系的进步人士掌握的乡、保政权。正是在这些基础上,湘潭县的抗日武装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南下支队在湖南

1944年11月10日，“国民革命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3800多人，在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的率领下，从延安出发，开始南征。南征目的是挺进华南，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辟湘粤赣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

1945年3月23日，南下支队从湖北通城进入湖南平江境内。为了便于在湖南打开局面，扩大影响，部队改称“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下属6个支队，1个直属大队，在平江、湘阴一带开展活动，并成立了湘东军分区。

当时，韶山地下党组织派到国民党正义军教导营第一中队当书记官的周汉平，看到正义军通报共产党王震部队数千人到达湘阴一带的机密快邮代电，马上告诉了我。我上年10月在重庆南方局汇报工作和学习时，已经知道党中央将从延安派一支部队来湖南的决定。于是省工委派张春林委员亲自去湘北迎接王震部队。

1945年7月下旬，南下支队除留下第六支队在湘阴、平江一带开辟湘北抗日根据地外，主力部队从长沙铜官渡过湘江，经宁乡道林进入湘潭。张春林回到韶山告诉我，南下支队到达楠竹山、石潭，往射埠方向去了。8月1日，我们派地下党员王世美和向保生到盐埠附近去找湘潭县工委负责人张忠廉，要他与南下支队取得联系。张忠廉又连夜派人赶来韶山告诉我，刘鼎和他已

经见到王震、王首道，并通知我和张春林去盐埠南下支队司令部会合。

8月2日傍晚，我和张春林赶到盐埠黄家湾黄家祠堂南下支队司令部。王震和王首道同志见到我们便热情地握手，对坚持地下工作的同志表示慰问。我们则表示热烈欢迎南下支队来湖南。8月3日，南下支队领导人和省工委周礼、张春林、刘鼎开了一个联席会议。王震、王首道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说明南下支队的任务，是向南发展，深入敌后，先到鄂豫皖边区，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取得联系，然后继续南下，与广东曾生领导的东江抗日纵队连成一线，力求开辟湘粤赣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南北呼应，互相支持，打击日本侵略者。我们汇报了湖南沦陷后的敌、我、友情况。南下支队司令部决定：留下南下支队第四支队300多人，协助地下党组织开展抗日宣传，发动群众，团结争取当地游击武装，开展敌后武装斗争。为了实行统一领导和指挥，成立湘中地委，书记周礼，委员徐国贤（支队长）、廖明、刘亚球、张春林、刘鼎。周礼兼任第四支队政治委员，原政治委员廖明任副政治委员。会上提出争取马扬德、张鹏飞等率领的游击队，成为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湘中扩大武装斗争，与湘北、湘南相呼应。会上并决定给马扬德、张鹏飞两支游击队以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自卫军湘中游击队的番号。王震同志还对我说：“马扬德肯跟我们走，表现不错，你们可以介绍他入党嘛！”

会后，我随即派人通知马扬德来盐埠，和他谈了任命他为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自卫军湘中游击队队长和入党的问题。他兴奋地接受任命，并要求入党。于是由我和张忠廉当马扬德的入党介绍人，在黄家祠堂举行了入党仪式，王首道和王震同志还讲话勉励了他。随后我们又刻发了抗日自卫军的图章，发给委任状，并派张忠廉为湘中游击队政委。

这几天，南下支队主力就在盐埠、射埠、锦石、花石一带活动。这几个集镇可热闹了。部队同志有在街头演讲的，有在河滩演话剧的。街上贴了《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四处写了标语。布告全文如下：

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

去岁湖南沦陷，	日寇肆虐横行
皆因抵抗不力	政府抛弃人民
本军奉命援湘	消灭万恶敌人
实行统一战线	团结一切好人
工农商学各界	军队地方士绅
不分阶级党派	皆愿相见以诚
一致联合对敌	展开民族斗争
独裁贻误国事	专制违反民心
唯有迅速改革	方能耳目一新
实行三民主义	恢复中山精神
建立联合政府	制止一党横行
取缔贪官污吏	扶持好人正绅
厉行减租减息	改善社会民生
取消苛捐杂税	买卖务求公平
反对强迫兵役	欢迎志愿从军
保障人权财权	维持社会安宁
严惩汉奸特务	悔过可以宽容
中国有共产党	华北有八路军
满布大江南北	则有新四大军
广东广西一带	抗日起义纷纷
德寇正在瓦解	日寇亦将土崩
苏联美英中法	保障战后和平

世界进步很快 中国岂能后人
愿我三湘子弟 一致义愤填胸
起来保乡卫国 充当抗日英雄
倘有汉奸国贼 敢于阻扰军容
自当痛击不贷 勿谓三令五申
特此剴切布告 仰各一体遵循

司 令 王 震

政治委员 王首道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三月

标语有：“反对独裁专制，成立联合政府！”“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等等。

当时农民正忙着抗旱，许多指战员帮农民车水。王震同志头戴草帽，和青年农民黄光悦共坐一架水车，脚踏水车车水抗旱。当他知道黄光悦的10岁妹妹黄友莲生病没有钱治，快要死了，随即到黄家访问，并要军医处医生急去治病。经打针吃药退烧，黄友莲病情好转。部队临走时，黄光悦的妈妈还带着病愈的女孩，来向王震同志道谢送别。

王震、王首道同志还派人到乌石寨彭家围子，探望彭德怀同志的亲属，把彭总司令的弟弟彭金华、彭荣华两位烈士的家属子女，接到盐埠司令部驻地住了几天。彭金华、彭荣华是1940年10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彭荣华儿子彭启超就在这次来部队时参军了。

8月5日，南下支队主力去石潭坝、菱角池一带。7日通过湘潭公路到龙船港。当天由马扬德游击队引路，在经过湘潭、衡山边境马飞龙游击队驻地时，马扬德派人去马飞龙部联系，请他们让路。马飞龙担心南下支队搞他们的枪。马扬德传话给他说：“你放心吧，这又不是国民党的部队。王震部队多的是枪，要你那

点枪干什么？”当时王震同志给马飞龙写了一封借道的感谢信，派传令兵送去。传令兵在山腰见到马部两个哨兵，有礼貌地敬礼交信。两个哨兵连忙回礼，将信送给了马飞龙。南下支队通过山下公路时，马飞龙部游击队都在两边山头站出来观看，没有发生意外的事。当晚部队到达龙船港渡口，在地下党组织帮助下动员一些船民，用木船分批将部队渡过湘江。8月8日，主力部队全部渡江去衡山。

我们第四支队送主力部队渡江后，仍返回湘潭县的射埠、坳柴一带活动。临别时，王震、王首道同志满意地说：“我们出发这么久了，还只在你们这里休息了一个礼拜。你们这里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做好了统一战线工作。一个礼拜没有日本军队来侵犯，也没有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来扰乱我们。”

8月11日，南下支队主力在衡山南湾收到党中央发来的电报，说苏联军队参战，日本投降，内战逼近，命令南下支队迅速到达湘粤边和广东部队会合，创建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部队随即发出电报，命令留在湘潭地区的第四支队跟进。我们接电报后，即于14日离开湘潭，沿部队主力去湘南的路线前进。我和刘亚球、张春林随部队走，还有10多个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了部队。张忠廉有病，抬着他跟部队走不方便，在南冲我劝他留下来，并要地下党员胡岁丰送他到长岭铁炉冲地下党员马伏全家隐居治病。刘鼎、周道等同志都留下来。湘中地委自然撤消了。为了加强湘潭、湘乡等县领导，我们决定成立潭（湘潭）湘（湘乡）中心县委，刘鼎任书记，刘资生、张忠廉等为委员。刘资生兼任湘乡县工委书记，张忠廉兼任潭湘宁边区县工委书记，周道任湘潭特区工委书记。

第四支队在石湾下游渡过湘江。这次又是马扬德部帮我们寻找木帆船和渔划子，由他们的游击队掩护我们过江。过江后，

我和支队长徐国贤在罗家桥召开给奖大会，表扬了护送渡江的马扬德部，奖给他们一些银元，鼓励马扬德继续革命，为人民服务。

8月下旬，南下支队主力在湘粤赣边境进入广东后，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和地方武装的堵击，会合广东部队有困难，便向党中央建议北返。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南下支队北上，向湖北的新四军第五师靠拢。随即南下支队突破顽军堵截，挥师北上。我们第四支队到衡山草市后，由于电台没有电池了，与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恰巧，在进入安仁潭湖时遇到了主力部队的直属侦察队。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我们一起顺利通过安仁至衡阳公路的国民党军队封锁线，跟踪主力前进。

随后我们由资兴彭公庙、汤边圩进入安仁和酃县边界的船形。当我们了解到中村、水口、县城都驻有国民党正规部队后，为了避免冲突，又由船形转向打醮坪。在打醮坪去黄毛墩的路上，碰到几个担盐的人，向他们打听到黄毛墩有国民党一个团正在修筑工事，堵截我们的去路。我们就请当地农民当向导，深夜绕小路经过桃村到了自源。第二天天刚亮，又从自源出发到酃县的下村。

下村的云里有个积谷仓，部队找到积谷仓的保管员，写了借条，借了谷，碾成米煮饭。又拿20块银元，买了辣椒、茄子、南瓜做菜。刚准备吃饭时，对面山上枪响，国民党军队从桂东追来了，向我们驻地刘家屋场打枪。我们部队立即向敌人还击，缴了敌人8条枪，随即向后山撤，把煮好的饭菜担着走。进入桂东境内大山后，摆脱了敌人，才休息吃饭。

8月底，我们经过桂东八面山，进入江西的崇义。9月1日晨，在快到思顺的大路上，发现排哨哨位和一堆堆柴草余烬。我们分析，可能主力部队昨晚就在思顺宿营，我们距离主力部队不远了。大家精神振奋，忘记了饥饿疲劳，加速前进。

9月2日,我们终于在江西的上犹墩头和主力部队会师了。王震、王首道同志前来迎接我们。在路旁茶亭前面,还贴了王震同志用红蓝铅笔在白纸上写的一行大字:“庆祝与四支队会合的胜利!”我们和主力部队欢呼着拥抱握手。稍事休息后,部队继续向井冈山方向前进。

部队路上犹附近一个要隘时,碰上国民党地方部队向我们开枪。我们部队派一个排从山上猛插他们的哨口,缴了一个连的枪。王震下令把人枪交还给他们,并向他们交代党的政策,说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

部队经过井冈山时,受到老根据地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给部队送茶水,送草鞋,还唱起了当年苏区欢迎红军的民歌。

在江西莲花六市乡,王首道召集我和刘亚球、张春林谈话,要我们留在湖南,坚持地下斗争。王首道说:“你们还是留下来,按原来省工委的那套办法搞,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准备再奋斗15年。”我说:“为革命准备奋斗一辈子,死而后已!”当时谁都没有料到,只有4年时间,湖南就解放了。

我们是分批离开部队的。刘亚球和张春林先从莲花回湖南。他们化装成卖铁货的小贩,到了湘潭,在射埠徐若飞家和刘鼎取得了联系。我和张友初、苏鉴堂到浏阳大围山后,才离开部队。我们也化装成小商贩,中秋节时回到长沙。我住在浏阳门外张友初的妹夫芦亦南鞋匠家里。此后省工委的机关就设在长沙,继续领导湖南地下党组织开展新的斗争。

南下支队在湖南经过18县。部队每到一地都张贴布告和标语,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散播革命种子,使湖南人民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随南下支队来湖南的刘亚球、罗振坤、谷子元、李林、方用、林煦春、耿在孝、肖伯鳌(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等湖南籍干部,也都留在湖南参加地下斗争了。

向中原局和上海分局汇报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经过八年抗战，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中国人民迫切地要求和平、民主，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恢复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在全国的反动统治。他们疯狂地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并准备全面发动内战来消灭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

当时我们从报纸上得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到了重庆，和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谈判。1945年10月10日，双方达成“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的协议。然而，国民党毫无诚意，纸面上写着“坚决避免内战”，实际上是坚决发动全面内战。

1945年8月，王震、王首道同志率领八路军南下支队北返时，到处遇到国民党军队的堵截围追。9月底北渡长江，与新四军第五师主力会合。10月正式撤消“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的番号，恢复三五九旅建制，加入中原军区野战军第二纵队序列。

自古以来，中原为必争之地。这时，蒋介石视中原解放军为心腹之患。他不久即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首先调集4个战区2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原解放区发动了进攻。

这年10月，南下支队干部罗振坤同志从湖北被派回湖南参加地下工作。王首道同志要他通知我，到湖北与河南交界的大悟

县宣化店,向中原局汇报工作。罗振坤按照我告诉王首道同志的联络点,先到湘潭韶山找到李勋启。李勋启又到长沙找到我。直到12月,罗振坤才和我见面。他告诉我去宣化店的路线和在武汉的联络地点,并要与他一起从部队回湖南的周秋保(又叫周长子),和我一起去宣化店。

1946年1月,我和周秋保从长沙乘火车到了武汉,在汉口的联络地点潘家米店住下来。主人潘正道老先生是董必武同志的老同学,思想进步,南下支队还带了董老给他的信,请他关照革命同志,支持革命活动。罗振坤经过武汉时接上了这个关系,住在他家。潘老先生是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在汉口较有声望,住在他家比较安全。

由于董必武同志和潘老先生的关系,潘老先生这次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化装成到河南去做生意的商人,通过他家米店办了一个通行证。潘老先生的老家在黄陂县,离宣化店较近,我们就到了他的老家。然后他请了一个可靠的人给我们当向导,带路去宣化店。

我们沿着湖北去河南的大路走了两天,过了几个国民党军队岗哨,才在宣化店找到我们的部队。在部队见到王首道同志,他介绍我去见了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郑位三同志。正好部队开干部会,通知我参加了,听郑位三同志作形势报告。当时形势紧张,国共双方虽然在1946年1月10日曾达成停战协议,但国民党随后却继续调集军队包围中原解放区,因此中原军区部队作了突围的准备。郑位三同志指出当前形势严重,动员干部要坚定、沉着,树立突围信心,准备冲出敌人封锁线,作战略转移。我在部队期间,郑位三同志和中原局组织部长陈少敏同志,先后找我谈话。我向他们汇报了湖南情况和省工委的工作。他们除了谈形势外,还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注重队伍质量,在发展中求巩固,在巩固中求发展;要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进步群众组织；党组织要隐蔽，不要暴露，秘密工作，同时进行合法斗争。随后，我又向党中央写了关于湖南工作情况的书面报告。

我和周秋保回湖南时，仍是化装成商人。陈少敏大姐帮我们准备了通行的路条，还派一个班武装护送我们走了一段路。然后通过秘密联络站，派向导一站送一站，避开国民党的岗哨，走另外一条小路，走了两天。最后一站向导把我们送到湖北花园铁路边，就回去了。我们从花园车站乘火车到汉口，又住在潘家。第二天，从武昌乘火车回长沙。

1946年6月，蒋介石反动集团悍然撕毁中共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签定的停战协定，破坏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政府改组、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等项协议，以30万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原军区部队主力于6月底分路突围。第三五九旅于8月返回陕甘宁解放区。王首道同志没有随部队突围。5月周恩来同志赴宣化店视察并促使三人小组赴宣化店调处时，通知王首道，中央决定调他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他随即离开部队，从武汉乘飞机去北平了。

我从宣化店回湖南后，1946年2月在湘潭韶山召开省工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工委委员周礼、张春林、刘鼎和新参加省工委的刘亚球、罗振坤，还有潭湘宁边区县工委书记张忠廉。开会地点在李勋启家仓库里。会上我传达了中原局的指示，大家讨论了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任务，研究了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在城市发动工人、学生开展民主运动，在农村准备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时开展武装斗争等问题。会上省工委分工：书记周礼，组织委员刘亚球，宣传委员罗振坤。

省工委机关设在长沙市。韶山会议后，在长沙成立了直属省工委领导的新闻支部，书记刘国安，不久发展为文教支部。支部一方面以湖南大学为重点开展学生运动，一方面以《国民日报》

社为重点逐步掌握舆论阵地。支部还利用《国民日报》社出版了《人民世纪》周刊,又帮助湖南大学进步组织世纪社出版了《天下文萃》半月刊,宣传民主进步思想,揭露国民党统治的反动、腐败、黑暗,反对内战独裁,促进和平民主运动的开展。

随后,省工委委员罗振坤在长沙市建立了泥木工人支部。地下党员段洪发在搬运工会进行工作,后成立码头工人支部。1946年5月,具有革命传统的长沙泥木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罢工取得了胜利,泥木工人每日工资由原来的银元5角6分增加到8角。6月,在泥木工人罢工斗争的影响下,圆木、锯木、竹篾、造船、石工、缝纫、织染等行业工人相继举行罢工,工资也有所增加。

6月下旬,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把湖南作为他们重要的战略基地,横征暴敛,拉夫抓丁,加强对湖南人民的反动统治和压榨。省工委指示各地下党组织,加强对农村斗争的领导,发动农民开展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的斗争。

9月,省工委派刘亚球到南京向中央南京局汇报工作。南京局负责人董必武同志和他谈话时指出:国共和平谈判没有希望了,内战已经打起来了,湖南省工委要按照党中央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做好党的工作。

1947年3月,省工委根据中央关于南方各省积极发动游击战争的指示,准备在党的群众基础较好的湘潭等地首先开展武装斗争。潭湘宁边区县工委等地下党组织,先后在县、区工委配备军事委员,组织武装工作队,开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不久,湘南各地在何大群、王来苏、谷子元等同志领导下,也先后建立游击武装,开展了武装斗争。

1947年1月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分局(5月改为上海局)后,湖南省工委由上海分局领导。4月,我去上海分局汇报工作。先到南京找到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任督学的地下党员刘寿祺同

志。他是1946年夏季我们派在南京担负湖南地下党与上级的联络工作的。他知道上海分局的联络点。我和他一起到上海，先住在一家旅馆里。他经过联络点告知了上海分局负责组织工作的钱瑛同志。钱瑛同志派一位女同志先到旅馆来和我们联系。随后她和这位女同志一起来旅馆看我们。我是第一次来上海，又是第一次见到钱瑛同志。她为了掩护地下工作身份，穿着时髦，象个做生意的阔太太。她看我穿着旧长褂子，便说：你这身衣服不行，显得太土太旧，住这种阔气旅馆，与环境不适应，容易使人怀疑。她要那位女同志和我一起上街，到服装店帮我买了一件灰色夹长袍子。随即那位女同志雇了一辆三轮车，和我坐上，转了几个圈子，将我送到钱瑛同志家里。刘寿祺住在旅馆里没有同来，他完成护送联络任务后，就回南京去了。

钱瑛同志住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路）辣斐坊一座房子里，由万流一夫妇带了一个小孩作掩护，和钱瑛同志住在一起。他们还请了一个做饭的师傅。万流一的爱人是湖南人，很高兴看到家乡革命同志。我住在楼上亭子间里，看文件，汇报工作，住了半个月，很少外出。我向钱瑛同志汇报，湖南党员由抗日战争末期的700多名，发展到1000多名，在城市发动学生、工人、贫民搞民主运动，在农村准备打游击搞武装斗争，湘潭韶山就成立了一个游击组。钱瑛同志说：现在不要公开搞。我说：是以党支部为骨干，吸收进步群众，不脱产，秘密的。她说：秘密的可以，你们要注意隐蔽，不要暴露。当前主要抓建党，发展和巩固党组织。在城市要抓学生运动，以学生为主开展群众爱国民主运动，进行合法斗争。

钱瑛同志向我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策略的指示，着重三点：一、要求针对蒋介石的镇压政策，扩大宣传我们党的主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

怖的广泛的爱国民主阵线。二、在工人和城市贫民、小商贩中，要着重领导好经济斗争，求得局部胜利，以便巩固阵地，利于今后发展。三、党的组织要严守精干隐蔽，平行组织，单线领导，不转关系，城乡分开，上下分开，公开与秘密分开等原则。

钱瑛同志 1927 年 5 月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曾去苏联学习。1931 年回国后，在湘鄂西特别是洪湖地区坚持斗争，人们一直传诵着她的英雄事迹。她到湘鄂西不久，她的爱人谭寿林同志就在南京英勇就义了。从此她再没有考虑个人的家庭生活，全部身心为革命事业而奋斗。我在上海和钱瑛同志接触期间，深感她待人诚恳热情，考虑问题细致周密，具有革命者的高尚品德和气概。她于 1946 年 5 月担任南京局组织部长及 1947 年在上海局负责组织工作后，一直分工领导湖南地下党的工作。

从上海回湖南后，我在长沙召开省工委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策略的指示精神，以及钱英同志的一些指示。省工委联系湖南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决定以长沙为重点，部署各地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反对内战和反对迫害的民主运动。会后，省工委委员分头向各地党组织传达和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

参加这次省工委会议的只有周礼、刘亚球、罗振坤。省工委委员张春林和刘鼎不幸病逝了。张春林同志是浏阳人，工人出身，1927 年入党，参加过红军，在湘南打过游击，经受过敌人牢狱的考验，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坚贞品质。曾任湘南特委委员兼郴县县委书记、湘宁中心县委组织委员、湘中地委委员、省工委委员等职。他 1940 年即化装成姓刘的卖布小贩，到韶山领导地下斗争。因他头发几乎全白了，人们称他“白毛”。他革命 20 年，历尽艰苦的斗争生活，因公致疾，肺病加深，不幸于 1946 年 9 月病逝于韶山。解放后，在韶山他的坟墓上立碑时，我写了张春林同志的碑记，韶山群众才知道这位叫白毛的“刘布客”，真名是张春

林。

刘鼎同志是长沙河西(今属望城县)人,贫苦农民出身,本人为搬运工人。1938年入党,工作积极主动,重视政治理论学习,曾任湘潭县工委书记、潭湘中心县工委书记,湘中地委委员、省工委委员等职。他为党工作,四处奔波,无法顾及家庭。1944年春季,他的母亲和两个儿子都得病死了,他的爱人也急疯了。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在地下工作中,他当过挖煤工人,推过土车子,隐蔽自己并维持生活。1946年秋天,他在湖区招福垸(今属华容县)做地下工作时,因积劳成疾,患火感伤寒病,发高烧昏迷不醒。同在招福垸做地下工作的张忠廉同志,因没有钱请医买药,焦急万分,星夜赶到长沙,找省工委筹措了医药费。可是当他赶回招福垸时,刘鼎同志已于先天去世,死时才27岁。

张春林和刘鼎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世纪社和湖南大学学生运动

1945年6月,抗日战争期间迁到辰溪县的湖南大学,由进步学生汪澍白根据他在重庆接受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刘光的指示,和同学刘善述等发起成立了进步的组织“人民世纪社”(简称世纪社)。1945年11月,湖南大学迁回长沙岳麓山后,省工委即派地下党员刘国安同志去湖南大学活动,和世纪社取得联系。世纪社知道昆明发生国民党军警特务镇压学生反内战运动的“一二·一”惨案后,在岳麓山黄兴墓庐举行了时事座谈会。刘国安以《国民日报》记者身份出席了座谈会,并谈了抗战胜利后的斗争形势和任务。经省工委研究,为了便于工作,刘国安也加入了世纪社。以后便以世纪社为重点,推动湖南大学学生运动。

刘国安根据省工委的指示,向世纪社负责人汪澍白等提出三项建议:一是要求保持组织的纯洁性,吸收社员必须经过严格审查,经过运动考验,要防止国民党的特务混进来;二是考虑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采取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方式,除几个已经公开露面的成员外,其他成员尽可能隐蔽下来;三是社员要继续加入到其他社团中去,或者另组外围组织,扩大活动范围,以便发现和培养更多的积极分子。

此后,世纪社加强与湖南大学各种社团的联系,争取和团结中间力量,并筹备联合各种社团的联谊会。1946年1月10日,湖南大学学术文化团体联谊会宣告成立。除1个社团的代表以“不谈政治”为名退出大会外,有9个社团参加。会上经过与特务

分子斗争,以多数票通过了世纪社起草的《对时局宣言》,明确提出“坚持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主张,随后将宣言印发 200 多份,向省内外传播。

参加这次会议的曹廷藩等教授都积极支持成立联谊会,只有负责学校教务又兼任国民党湖南大学区分部书记的某教授,不怀好意地说:“最近世界上有三个重要会议:一个是莫斯科三外长会议,一个是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还有一个是湖南大学的学术文化团体联谊会。三个会议都是政治协商性质的会议……”第二天科学馆墙上还贴出一个自称“麓风社”的声明,说什么昨天晚上的会议是国共两党的斗争,他们反对学术团体卷入政治斗争云云。迹象表明,斗争是复杂尖锐的。

1946 年 2 月,世纪社创办《天下文萃》半月刊,公开发行,着重揭露国民党政府以和谈为烟幕,进行内战独裁的真面目,报道各地人民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情况。刊物只出了 6 期,其中第四、五期与《国民日报》社地下党员黄明主编的《人民世纪》合刊发行。5 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迫使《人民世纪》停刊后,又以“宣传共产党主张”为由,查封了《天下文萃》。

1946 年 4 月,刘国安介绍世纪社社员汪澍白、易鼎铭、刘善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经省工委批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查封《人民世纪》、《天下文萃》后,《人民世纪》主编、地下党员黄明被迫离开湖南,刘国安也紧急撤退了,没有来得及告知汪澍白等已被批准入党和交接组织关系。汪澍白等和刘国安失去联系后,仍千方百计寻找党的关系。不知道他听谁说的,宁乡宗一中学的教师周太暄可能是共产党员。他就到宁乡紫林宗一中学,先找校长汤中问是不是有位周太暄老师。汤校长便介绍他和周太暄见了面。汪澍白向周太暄谈了湖南大学世纪社和学生运动情况,希望得到党的领导。周太暄和他约定,过两三天再到长沙去找他。

周太暄是省工委直接领导的宁乡宗一中学特别支部的支部书记，他到长沙先向我汇报了汪澍白找党的情况。然后我和他一起到了约见地点南门朝阳巷李宅，会见了汪澍白。李宅是后来随程潜起义的湖南省银行行长李维城的家，汪澍白和他的儿子是同学，在这里见面比较方便。汪澍白向我汇报了世纪社的有关情况。我说：世纪社的建立，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在学生运动方面打开了局面。《天下文萃》的创刊，和《人民世纪》一道，突破了湖南思想沉闷的局面，有广泛的社会影响。缺点是过于暴露，引起敌人注目。现在和平绝望，国民党在发动内战的同时，必定采取镇压措施。世纪社的活动要转入地下，隐蔽精干，注意策略，准备对付各种复杂局面。我告诉汪澍白，省工委已经批准他和刘善述、易鼎铭入党，成立湖南大学支部，他提任支部书记，以后由官健平同志和他们联系。

1946年6月，长沙新闻支部改为文教支部，官健平任支部书记。不久，我又和官健平一起到岳麓山爱晚亭附近一间小房子里，和汪澍白见了一次面，谈了形势和任务。此后世纪社社员发展到50余人。直到1949年1月，湖南大学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世纪社才停止发展。社员除了个别的外，先后都加入了共产党。

1946年12月，转入地下的世纪社决定利用湖南大学第二届学生自治会竞选的机会，依靠进步同学，团结广大中间同学，通过竞选掌握学生自治会，更好地领导湖南大学的学生运动。湖南大学从辰溪迁回长沙后的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以及以前的学生自治会，都由国民党和三青团控制。这次学生自治会竞选，世纪社支持以进步社团学行社和春秋社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戴伯淳竞选团。这个竞选团被誉为“人才内阁”，阵容整齐，群众基础雄厚。世纪社又联合各社组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助选团。结果戴

伯淳竞选团获得多数选票,击败了三青团支持的竞选团,组成了第二届学生自治会。这是1940年以来,湖南大学第一次由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力量掌握的学生自治会。在党领导下的湖南大学学生运动,也就进一步蓬勃开展。

1947年1月,驻北平美军于七月24日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事件的消息传到长沙后,湖南学生极为愤怒。湖南大学学生举行抗议美军暴行大会,开展“要求美军滚出中国去”的反美爱国活动,并通电支持北京大学学生的正义要求。长沙各中学学生也纷纷办墙报,开控诉会,抗议美军暴行。

我于1947年4月从上海回到长沙后,省工委根据钱瑛同志传达的中央关于在蒋管区斗争策略的指示精神,研究确定以湖南大学为重点,带动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开展反内战运动。随即由官健平向湖南大学地下党员黄泽奋和世纪社负责人徐传熙,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和省工委的意见。

5月18日,世纪社开会,讨论了平、津、宁、沪学生运动的形势,酝酿在湖南大学开展反内战运动。当时湖南大学学生正在反对教育部将湖南大学的校名更改为岳麓大学。在5月20日以世纪社和学生自治会为主发动召开的湖南大学学生反对更改校名大会上,我们的人贴出了“反对内战,反对饥饿”的标语。大会发言中,进步同学慷慨激昂地提出:“我们今天在这里反对更改校名,首先就要反对内战,因为一切罪恶都是内战造成的”,“政府用教育经费去打内战,迫使我们吃不饱饭,我们要反内战,反饥饿!”大会的主题,就由反对更改校名变成反内战了。最后大会通过决议,大会定名为“国立湖南大学反对内战反对更改校名运动大会”,自21日起暂罢课一周,22日举行反内战大游行。

5月22日,湖南大学1000多名学生,高举“湖大学生反内战大游行”的横幅,不顾国民党省政府和“长沙军警宪联合督察

处”施加的压力，冲破军警宪的重重拦阻，强渡湘江，举行反内战大游行。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也参加了游行，他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女同学走在队伍前面。同学们手执“反内战”的三角小旗，沿途散发反内战传单，张贴反内战标语，高唱《反内战进行曲》和《团结就是力量》的歌，高呼“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严肃整齐地进入市区。军警设了几道防线挡住去路。胡校长对一个军官说：“我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上对蒋主席负责，下对全体市民负责，请你们立即撤走，由我带着学生游行，保证秩序良好。”随即女同学手挽手地冲开一条路，继续前进。游行队伍在市内绕了一大圈，下午在划业工人支援下渡江返校，这次“五·二二”大游行，是解放战争时期湖南大学运动的一声春雷，打破了压抑沉闷的局面，在全省发生了巨大影响。

“五·二二”大游行后，湖南大学收到教育部收回更改校名成命的电文。这时，又传来北平国民党青年军士兵殴打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活动的学生，造成“五·一八”血案，南京国民党政府出动军警宪镇压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城市大专学校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请愿游行队伍，造成“五·二〇惨案”的消息。全国大、中城市学生愤怒抗议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的暴行。湖南大学反对内战运动大会主席团和学生自治会发出了《声援五·二〇惨案宣言》，并出版《湖大吼声》日报，报道本校和全国各地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消息。随后又召开学生大会，决定响应华北学联定6月2日为“反内战日”，全国大、中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的号召，联络长沙市各大、中学校于6月2日罢课游行。

当时上海局指示，针对国民党政府的镇压暴行，斗争总口号应加上“反迫害”，使“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成为全国学生和社会各界反对蒋介石统治集团的统一斗争。湖南大学“五·

“五·二二”大游行后，我找官健平、黄泽畲和派到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等校活动的张经武，了解湖南大学和全市大、中学校学生的动态。随后我在南门张经武家里，召开了有湖南大学世纪社社员周季平、邹乃山等参加的秘密会议，着重总结湖南大学“五·二二”游行的经验，研究进一步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我在讲话中，肯定湖南大学“五·二二”游行组织得比较成功，对全市以至全省学生运动起了带头作用。不足之处是联络各大、中学校的工作做得不够，没有发动各大、中学校学生参加游行。在“六二”反内战日，世纪社和学生自治会要发动全校同学响应号召，配合行动，并派积极分子去联络各大、中学校，争取各校同时参加总罢课和游行。同时我对湖南大学的工作提出了三点意见：一、在组织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要依靠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带动后进势力；二、争取学校行政当局和职员、教员等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团结、争取一切有爱国思想的人；三、孤立特务分子和顽固分子，防止他们捣乱。

根据省工委的意见，世纪社通过湖南大学反对内战大会和一些进步社团，派出一批积极分子加强和各大、中学校的联络工作。“五·二二”游行以后，每天都有长沙市一些大、中学校的同学，还有来自南岳国立师范学院、宁乡民国大学以及其他县市的同学，来湖南大学参观、联络和学习经验，并带回去大量宣传资料，推动了全省反内战运动的开展。

6月2日，湖南大学同学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巨大横幅，突破军警封锁，再次强渡湘江，在市区汇合冲出军警包围的各大、中学校游行队伍，共5000多人，首先游行到省政府请愿。同学们对北平、南京发生的“五·一八”“五·二〇”惨案提出严重抗议，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惩办肇事凶手，立即取消《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保障人权，停止内战；要求省政府保障学生

集会结社自由，不得再以军警包围学校。省政府秘书长刘公武接见学生代表并答复：同学们对北平南京流血事件的意见，省政府保证马上转达行政院；至于保障学生民主权利事项，省府理应接受。随后队伍继续游行，高呼口号：“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饥饿，要求温饱！”“反对迫害，要求民主！”游行队伍受到长沙市民热烈鼓掌欢迎。

这次长沙以湖南大学为主的“六二反内战日”总罢课和大游行，组织得比较好，显示了爱国学生团结起来的强大力量，对全省学生运动起了带头和推动作用。

1947年5月23日，党中央给上海局发出《中央关于蒋管区党的斗争方针的指示》，提出要灵活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1947年5月30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不是泛指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也不是单指学生运动，而是指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包括各阶级、各阶层的反美反蒋的广泛的统一战线。长沙学生的“五·二二”和“六二”大游行，正是起了开辟第二条战线的作用，推动了湖南学生运动和湖南和平运动的开展。

省工委重视湖南大学的建党工作，在世纪社起核心作用的学生运动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和锻炼党员。原党支部

成员汪澍白等离校后,1947年10月重新建立湖南大学党支部,书记黄泽畬,由长沙县委领导。这时长沙县委统管长沙市和长沙县的工作,由我兼任县委书记,并直接领导以湖南大学为重点的学生运动。1948年2月沈立人接任长沙县委书记后,由他领导湖南大学党支部工作。1948年11月,湖南大学建立党总支,总支书记周季平。到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前,湖南大学党总支已发展到下属7个支部和一个党组,包括各学院支部、教职员支部、工人支部和第四届学生自治会党组,共有党员175人。湖南大学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后,加强了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进一步开展了以争取民主为中心内容的学生运动。

省工委为了发挥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使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鼓励进步学生利用寒暑假回乡做群众工作,并根据工作需要,从湖南大学、世纪社(包括校外社员)派出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一些县、矿山和游击队工作。对一些因身份暴露而撤离学校,或毕业、辍学回家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也安排了工作。如贺湘楚、颜昌祺、邹乃山、雷普文去攸县,熊家宽去南岳,彭越去安化,文星朗去益阳,曾汉荃、胡焕球等去长沙县,颜述之、文诚生等去锡矿山和新化,曹伟如和郭昌荣等去湘东和萍乡煤矿;刘正、刘育才、郭静秋、邓岗、张瑞洁、刘长鑫、何信、姜懿德等和一些清华中学、长沙市第一中学学生共30多人,到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一支队、第三支队作政治工作,谢翼、杨奉达到湘中第二支队三团做政治工作,黄兆伯到湘中第三支队做联络工作,梁崇均到浏阳湘东四支队任参谋。同时派往各地传达省工委指示,协助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和主要做统战工作的,还有何长胜、郭仁成、张华莲等。湘潭、醴陵、宁乡、益阳、邵阳、衡阳、耒阳、临武、津市、安乡等地,都有湖南大学的党员、积极分子做发动群众、统战策反和武装斗争工作。

农村武装斗争

1946年6月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后,为了扩充兵源和搜刮粮钱,到处抓丁拉夫,强征暴敛,地主豪绅和高利贷者也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湖南人民深受其害,斗争情绪普遍高涨。省工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发动农民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许多地方还进行了抗租抗债斗争。在一些农民发动起来的地方,组织了翻身会、贫农团、农民协会。在发动农民的基础上,一些地方组织武工队和游击队(组),开展武装斗争。

关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武装斗争,党中央于1946年11月6日对南方各省工作发出的指示中指出:“凡有可能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者,应立即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凡条件尚未成熟之地区,采取隐蔽待机方针,以待条件成熟……但总目标仍然是积极发动公开游击战争,创立游击根据地之各种条件……。”1947年3月8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国民党统治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要趁国民党统治区后方兵力空虚,征兵征粮使得民不聊生,群众斗争情绪普遍增高的有利时机,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有步骤地发动与组织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省工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准备首先在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开展武装斗争。湘潭县特区工委和潭湘宁边区县工委等党组织,先后在县、区工委配备军事委员,从党员和积极分子中选出青壮年,成立不脱产的武装工作队和游击组,开展活动。

湘潭县特区工委根据省工委的指示,于1948年1月在银坡建立武工队,队长张鹏飞,湘潭县特区工委军事委员胡佑生(后为湘潭县工委书记兼军事委员)任政治委员。张鹏飞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组织游击队,狠狠打击了日伪军。1945年8月八路军南下支队驻扎在湘潭县盐埠时,曾委任他为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自卫军队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七十三军强行收缴了他的枪支。当时他埋藏了长枪两枝和短枪一支,准备日后起义。1947年10月,良佳区委书记王春和与张鹏飞取得了联系。11月,省工委指示湘潭县特区工委进一步争取张鹏飞。张鹏飞表示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于是省工委派组织委员罗振坤去湘潭与他面谈,要他建立武工队,并说明了武工队的任务和斗争方法。任务就是既要搞好武装斗争,又要做好群众工作。斗争方法就是声东击西,避实就虚,昼伏夜出,神出鬼没,集中力量狠狠打击敌人,分散行动做好群众工作。同时必须创建广阔的游击区,才有回旋余地与敌人周旋。但张鹏飞没有全部按照省工委的指示办。

在湘潭县特区工委军事委员胡佑生主持下,1948年1月22日正式建立武工队的当天,张鹏飞等就发动了银坡起义。他们选拔了18名武工队员,其中地下党员11人,张鹏飞旧部5人,积极分子2人。张鹏飞拿出他埋藏的3支长短枪,还收集了4把大刀、两把刺刀和几支梭标。当晚武工队直奔吟江警察所。警士们听说是日本人都怕三分的张鹏飞部队来了,不敢顽抗。只20多分钟,武工队就缴了警察所8条步枪。接着又急行军袭击古塘桥警察所,枪毙了为非作歹的副警长傅六和,警士们乖乖地交了7条步枪。第二天,张鹏飞起义的消息轰动全县,号称武工队为“十八罗汉”。数日内武工队发展到20多人。随即湘潭县警察局集中优势兵力,进剿武工队。2月,武工队被打散部分人员,良佳区委书记王春和不幸被捕牺牲。

1948年2月,湘潭县特区工委改组为湘潭县工委,书记周道。省工委在湘潭武工队受挫折后,除了指示继任的县工委书记兼军事委员胡佑生任武工队政治委员外,又派军事干部王来苏和原南下支队留在醴陵做地下工作的耿在孝(俊猛)去武工队,并由耿在孝担任武工队副队长兼参谋,加强对武工队的军事领导。并指出,湘潭反动势力较强,必要时武工队可离开湘潭,到外地活动。耿在孝、王来苏去武工队后,武工队在县工委和群众支持下,又发展到30多人枪。国民党湖南省保安司令部、长沙警备司令部和湘潭县政府,妄想利用和谈招降张鹏飞部。张鹏飞和耿在孝等为了麻痹敌人,争取时间,准备转移,4次应付和谈。因敌强我弱,胡佑生和耿在孝都主张执行省工委的指示,把部队拉到外地去活动,而张鹏飞留恋乡土,不愿离开湘潭。于是兵分两路,一部分由张鹏飞带领,留在湘潭继续与敌人周旋;一部分由耿在孝带领去醴陵打游击。敌人因招抚无效,便增强兵力进行“围剿”。同时因敌人威胁利诱,武工队中出了叛徒。武工队员谭荣华、颜运祥等先后被叛徒出卖而牺牲。县工委书记胡佑生此时已与张鹏飞失去联系。他准备去长沙向省工委汇报武工队情况,因叛徒吴碧凡告密,于5月17日在湘潭协和公酱园被捕。

胡佑生同志出身贫苦,自幼学中医,以行医为业。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积极参加农民协会。1938年入党。1948年2月继周道任湘潭县工委书记。敌人将胡佑生逮捕后,如获至宝,妄想从他口中供出线索,将湘潭共产党组织一网打尽。于是对他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使用了夹棍、老虎凳、倒灌辣椒水、针刺十指等酷刑。但胡佑生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没有供出一个党员,5月30日英勇牺牲于射埠。解放后当地党组织和群众为胡佑生烈士安灵祭奠。在他的遗像下写了赞词:“壮哉烈士,革命之英。为民为党,历尽艰辛。事变被捕,矢志牺牲。针刺十指,缄口无声。不屈

不挠，惨矣捐尘。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千秋不朽，万古长春。”

胡佑生牺牲后，张鹏飞、耿在孝分别率领的两个小分队也先后被打散。张鹏飞潜来长沙，不幸被捕。敌人于7月21日将张鹏飞等3人杀害。1948年10月，湘潭县工委根据张鹏飞烈士生前愿望和表现，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于1947年8月，派党员、广州中山大学学生张犀文等回湖南做地下工作，准备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初，增派中山大学学生黄道奇等中共党员和学生运动骨干20多人来湖南，由黄道奇负责，去邵阳、东安、慈利、辰溪等地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游击武装。8月，移交湖南省工委领导。

1948年夏天，我们接上海局通知，要省工委的三个成员——我和刘亚球、罗振坤都去香港向钱瑛同志汇报工作。钱瑛同志是3月间由上海到香港，主持党员干部学习班和西南地区工作的。我们汇报了湖南各项工作和张鹏飞事件。钱瑛同志说：“在敌人统治力量强的地方，你们不要搞武装斗争，不要暴露党组织，要尽可能避免破坏和损失。她对湖南工作提出分三线领导的指示：第一线，主要在湘南发动武装斗争，开展游击战争；第二线，在农村发展党组织，发动农民反对征兵、征粮、征税，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第三线，在城市发展党组织，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解放。她还向我们转告了香港分局（后改称华南分局）的意见，为便于在湘南开展武装斗争，湘南工委由广东五岭地委领导（湘南在1947年10月，即有五岭地委党员干部李康寿帮助进步青年郭名善领导了桂东沙田农民起义，起义队伍经过整训，命名为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北上先遣队，队长郭名善，政委李康寿）。我们同意香港分局的意见，并调刘亚求、李林、耿在孝、李同文等同志到五岭地委分配工作。湘南地区的武装斗争，在湖南省工委和广东五岭地委的领导下进一步开展起来。

在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大势已去。湖南不少地方的农民为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揭竿起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姜亚勋、李石锹等领导的宁乡县黄材、唐市两地农民武装起义。

1949年2月10日，姜亚勋、陈促怡、喻迈常等率领50多个农民攻打了黄材警察所和大泐乡公所，共缴获长短枪80余支。同一天，李石锹、谭荫南等率领农民20多人，攻打了唐市警察所，缴获长短枪30余支、手榴弹两箱。黄材、唐市两地的农民起义经长沙各报纸报道，震动全省。国民党的湖南当局立即命令五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胡维陞、宁乡县长张溉、保安团长熊建勋，率领自卫总队和保安队部队进行“围剿”。当时起义部队没有共产党领导，缺乏严密组织和训练，不久被打散。随后姜亚勋利用国民党当局与他们进行和谈的时机，3月间重整旗鼓，集结队伍，连同新参加人员共有200多人。为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编为四个大队，分地区活动，攻打各地乡警。此时，高露区委委员姜尚即派宁乡《人报》记者刘盛亚，和姜亚勋部取得联系。

当时，省工委也很关心这支起义队伍，指示潭湘宁边区县工委，迅速派人去了解姜亚勋部的情况，并取得联系。潭湘宁边区县工委即派清溪区委军事委员毛士凤，到姜部了解情况并担任联络员。不久，潭湘宁边区县工委书记庞柱中和潭湘宁中心县工委书记官健平，又先后会见了姜亚勋，并将会见的情况向省工委报告，同时派边区县工委组织委员钟耀夫和毛士凤等到姜部工作。省工委随即于4月中旬派湖南大学学生郭静秋、刘育才去姜部调查考察。4月下旬，姜部发展到1000余人。郭静秋和刘育才回长沙向我汇报姜部详细情况后，省工委决定领导这支部队，并派官健平、庞柱中率领一批党员进入部队，加强领导。

4月下旬，上海局通过华南分局，派欧阳方同志来湖南参加

省工委，加强军事领导工作。5月初，省工委在长沙召开全省武装工作会议，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参加。会上，欧阳方作军事报告，讲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会议决定：加强党对全省武装斗争的领导，在发动群众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的基础上，积极组织人民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南下大军解放湖南；各地党领导的游击武装进行整编，实行统一建制、统一领导，加强政治工作，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省工委以湖南人民解放总队的名义，领导湘中等地的游击武装。省工委并根据会议精神，发出进一步开展全省武装斗争的“五四”指示。

省工委以湖南人民解放总队司令员罗洪钧、政治委员谢国才的名义，发布了《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成立宣言》。《宣言》指出：“现在渡江南下的人民解放大军正横扫千里，势如破竹地将残敌打得四分五裂，土崩瓦解，华南各省的解放即将实现。本军为了更有效地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残余匪帮，迅速解放湖南，顷奉命成立湖南人民解放总队，以便加强领导和统一指挥全省人民武装及各种愿意接受中共领导之军事力量。本军是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建军原则而建立起来的，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切实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与正确的俘虏政策。……”

《宣言》提出了湖南人民解放总队当前的十大主张：第一，配合人民解放军彻底消灭祸国殃民的残余国民党匪军，解放湖南三千万同胞。第二，反对三征暴政，减轻人民负担。第三，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第四，肃清土匪，维持治安。第五，镇压地方反动恶霸，保护全体人民生命财产。第六，救灾救荒，发展生产。第七，保护城乡公私资财，协助解放军接管城市。第八，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第九，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第十，拥护共产党，爱护老百姓。

湖南人民解放总队为省工委虚设的军事领导机构。领导人未经上级批准,用了司令员罗洪钧、政治委员谢国才的假姓名。省工委决定,将湘潭、湘乡、宁乡、安化、益阳等县党领导的部分武装,统一编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一支队,任命姜亚勋为第一支队司令员,官健平为政治委员,陈仲怡为副司令员,徐上达为副政治委员,庞柱中为政治部主任,喻迈常为参谋长。全支队辖5个团,一个直属大队,一个机炮队,共有5000多人枪。为加强对湘中地区的湘潭、湘乡、宁乡、安化、益阳等县党组织和游击武装的领导,省工委决定成立湘中(地)工委,由官健平、庞柱中、熊邵安、刘资生、周政、杨汉钦组成,官健平任书记。

5月中旬,官健平在湘乡团田镇召开湘中一支队整编会议,有团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和支队政治部各科科长参加。会上,官健平传达了省工委的各项决定,宣布了各团政治处主任以上干部的任命,并报告了当时的形势和武装斗争任务。会后,各团传达贯彻了会议精神。省工委先后派了20多名湖南大学、省立第一中堂、清华中学等校学生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到部队做政治工作。同时通过进步人士、省卫生处处长龙伯坚和湘雅医学院院长凌敏猷,派出新从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回来的助教陈祐鑫和湘雅医院医生沈维廉,携带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支援湘中一支队。湘中一支队经过整编,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在湘中各县活动,声威大振。国民党军队数次进剿,都是无功而返。长沙警备司令刘进由宁乡督剿回长沙后,向记者发表的谈话时说:姜亚勋本人虽非共产党员,但顽强地执行共产党的政策。

湘中一支队整编后,经过省工委同意,由钟耀夫、毛士凤介绍姜亚勋、陈仲怡、徐上达等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支队司令部建立了临时党委,官健平任书记,庞柱中、姜亚勋为委员。在党的

领导下,湘中一支队部队素质提高,战斗力增强。6月消灭了土匪、特务相勾结的所谓“西南民主联军”尹立言部3000余人。6月底至7月中旬,取得了反白崇禧大围剿的胜利。7月下旬起,积极准备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湘中各县。8月1日,省工委派罗振坤赴支队司令部,指示湘中一支队配合人民解放军部队,向邵阳方向进军,护卫潭宝公路。湘中一支队和湘中地区其他游击队,都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为解放湘中地区作出了重大贡献。

省工委召开武装工作会议,作出“五四”指示后,各地党组织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5月,湘中地区除成立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一支队外,还成立湘中第二支队,司令员尹如圭(后牺牲),邵阳中心县委书记龙仲兼政治委员(后叶苓任司令员代政治委员),辖5个大队,在邵阳、武冈一带活动;成立湘中第三支队,司令员李石楸,政治委员张伯伦,辖5个团,在宁乡、湘乡、益阳边境和长沙、浏阳边境一带活动。6月,在潭湘宁边区建立湘中纠察总队,毛士凤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毛特夫任政治委员),配合湘中一支队作战;在浏阳建立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东第四支队,司令员彭汉云,浏阳县工委书记赵振湘兼政治部主任,辖3个大队。在衡(阳)西,以原人民赤卫队为基础,建立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五支队(一团队),司令员李建元,两衡(衡阳、衡山)工委副书记黄道奇兼政治委员,活动在衡阳、邵阳边境。

5月,在中共湘西工委领导下,建立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总队长陈采夫,湘西工委书记方用兼政治委员。6、7月分别在澧县、慈利、石门、临澧、益阳等地建立5个突击大队。陈采夫为原国民党联勤总部铁道军运指挥部第一区少将副指挥官,思想进步。省工委曾派地下党员刘寿祺协助他组织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在国民党军官中进行统战策反工作,并通过程潜,

安排他担任湖南省第四区(常德地区)行政督察专员。他密切配合湘西工委书记方用,领导开展了湘西北地区的武装斗争。

6月,在中共湘南工委领导下成立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司令部,由湘南工委负责人谷子元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先后组编了11个大队、1个警卫大队。在华南分局领导下成立的湘南地委和湘南支队,刘亚球任地委书记、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4个大队、5个县大队、1个独立团。湘南支队、湘南游击司令部和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北上先遣队,在湘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

在党领导下的游击武装部队,还有在湘阴建立的湘北人民自救军,司令员兼政委龙赞;湘西纵队和安(化)新(化)邵(阳)溆(浦)边区游击队合编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司令员陈策,政治委员谌鸿章;湘桂边境建立的湘南人民民主联军,负责人陈一凡,等等。

许多县的党组织也先后领导建立了武工队、地方兵团等游击武装。

到1949年9月,全省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发展到3万多人。全省各地还有一些与党组织有联系的起义武装。全省农村的武装斗争,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配合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加速了湖南的解放。随后,各地游击队经过整编,分别编入湖南军区、各地军分区、县大队和野战军部队。

统一战线与湖南和平运动

1948年7月，程潜回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辖湘、赣两省）兼湖南省政府主席。7月24日他刚到长沙，就在各界欢迎大会上发表反共演说：“我今年已六十有七，但我决不惜任何牺牲和共匪拚命。纵然我有一百岁了，我还有勇气和共匪拚命。……”

本来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代他拟了一个讲稿，强调和平、民主、建设，不谈“勘乱”、“剿匪”，但他却临时舍而不用，编了这一套激忿的话。

他在接见记者时又说：“在未来的八、九、十三个月中，共匪还无力渡江南犯，我湘人即可作好防御准备。倘三个月之后，匪果来犯，届时当可予以重大打击。如续有三个月的优裕时间，彼时不仅可防匪来犯，而且欢迎匪来自投罗网，葬身沅湘之间。”

此后几个月，程潜在公开场合，都要唱一唱反共的高调。当时他这种要将湖南投入战火的反共姿态，实在令人惴惴不安。

但是，程潜回湖南后的一些治湘措施，又颇为开明进步。1948年8月他发表《告湖南省属县市土豪劣绅书》，开头就说：“本党在誓师北伐的时候，即有一个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谁想这土劣在长期革命中，没有被本党打倒，竟有不少本党同志，反被土劣所薰染了。这真正可痛啊！”他认为土豪劣绅害国祸民由来已久，还讲了孔子当鲁国司寇并代理宰相时，下车七日就杀

了鲁国大劣绅少正卯的故事。他希望土豪劣绅们“改罪自新，努力向善”。同时，省政府发出了限租护佃的布告。程潜本人并将醴陵祖遗 400 石田产，全部捐献给县里作地方公益事业。9 月，程潜下令撤销省和县的“勘乱建国动员委员会”这个反共组织。同月，程潜查处大贪污犯前田粮处长黄德安，将黄德安扣押法办，后经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程潜还发表了《告湖南帮会书》，下令解散各种帮会组织。以后程潜还办了一些得民心的事。这时候，省工委对程潜的历史和现状作了一些分析。程潜，醴陵人，早年留学日本时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曾任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任第六军国民党代表的林伯渠为共产党员，两人配合较好。1927 年 4 月宁汉分裂时，他站在武汉国民政府方面，联共反蒋（介石）。1928 年 5 月李宗仁在汉口召开武汉政治分会会议时，借故将程潜拘押，并经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免除程潜的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职务。抗日战争时期程潜东山再起，历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行营主任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天水行营主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抗战胜利后任武汉行营（后改称武汉行辕）主任。1948 年参加副总统竞选失败，才回湖南。

程潜曾经反对蒋介石，与国民党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嫌隙甚深，而蒋介石与桂系素有矛盾，三方存在互相利用矛盾的微妙关系。1948 年 3 月，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国民大会）”时，演出了一场竞选副总统的闹剧。蒋介石当选总统，他属意孙科当选副总统，企图利用程潜竞选来减少李宗仁的选票，授意程潜将选票让给孙科。程潜非常反感，没有照办。结果仍是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蒋桂矛盾加深。蒋介石惟恐桂系在中央的势力过大，免去白

崇禧的国防部长职务，调到武汉任华中“剿匪”总司令，企图在内战中削弱桂系兵力。但他又顾忌白崇禧将辽阔的华中与广西、广东联成一片，扩大桂系势力。为了对付桂系，便任命与桂系有宿怨的程潜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将程潜安置在武汉与两广之间的湖南，掌握湘、赣两省以钳制桂系。

白崇禧也有他的想法，他拥兵盘据武汉，内战中要靠湖南提供兵源、粮源以扩充桂系实力，并将湖南作为他们老巢广西的屏障，以湖南为退路，因此力图控制湖南。他认为程潜过去反蒋，也曾反共，目前又无实力，对程潜主湘虽有疑忌，料无大害，因而企图利用蒋、程矛盾来联程反蒋。

程潜则由于过去深受蒋介石和桂系排挤之苦，加以对蒋介石的发动内战、独裁专制和种种倒行逆施不满，已萌回湘掌握实力、自谋出路之意。他在公开场合说了一些反共的话，对此曾向他的亲信解释，是为了要让蒋介石和桂系信以为他是坚决反共的，并借此在湖南扩充军队，培植实力，以便掌握湖南局势。在省政方面，程潜确也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

因此，省工委认为，程潜既是国民党元老，又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拥护国共合作，他与蒋介石和桂系都有矛盾，有可能争取他走和平道路，在国民党军政中发生重大影响。省工委随即决定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并确定地下党员余志宏专门做以程潜为主的上层统战工作，直接与我联系。余志宏毕业于中山大学，曾任前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的秘书，认识一些上层人物，后到湖南大学任讲师。他对党忠诚，办事聪敏、谨慎、机警。他和程潜都是醴陵人。我认为选定他来做这个工作是适宜的。

不久，省工委又成立专门的统战策反小组，余志宏任组长，主要做争取程潜及其亲信人员的工作，组员涂西畴主要做中下层军政人员的统战策反工作。省工委还派地下党员刘寿祺，协助

国民党少将军官陈采夫，组织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简称民促社），在国民党中下级军官中进行统战策反工作。1947年8月由进步人士肖规和中共地下党员胡鹏等发起成立的湖南经世学会，吸收国民党政府机关中的中下层人员、失业人员和其他阶层人员参加，学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开展进步活动。学会后来发展到800多人，为开展统战工作发挥了一定作用。

省工委认为要争取程潜走和平道路，就要通过接近程潜的人士去做工作。程潜回湖南不久，余志宏就和思想进步并与地下党有联系的马子谷商量，写信请在台湾被蒋介石以共产党嫌疑拘押过的程潜的族弟程星龄回湖南，做争取程潜和程潜周围军政人员的工作。余志宏又了解到，住在湖南大学附近桃子湖的省政府顾问方叔章，思想比较开明，在程潜任天水行营主任时曾任行营秘书长，程潜任湖南省主席后又请他当顾问。他经常出入省政府，可以和程潜无话不谈。于是通过湖南大学教授王啸苏介绍认识方叔章，并通过湖南大学教授李达动员方叔章去做争取程潜的工作。

程星龄于1948年9月来长沙后，我和余志宏多次与他见面，商量如何争取程潜。当时开展了两项影响大的活动。一项活动是王家菜园的时事座谈会。1948年9月，经过余志宏和程星龄、马子谷商量，组织了一个时事座谈会，邀请长沙绥靖公署秘书长刘岳厚、长沙市市长蒋昆、银行界知名人士唐文燮等五六人参加，每周座谈一次，经常在王家菜园蒋昆家举行，也轮流在刘、唐等家举行。通过座谈时事，提高对时局的认识，同时借以了解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一些情况。另一项活动是桃子湖的便宴。经过余志宏的安排，由方叔章出面，1948年11月19日在岳麓山下桃子湖他家里请了一次客，参加的有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伍蕙农，民盟湖南地下组织负责肖敏颂，接近程潜的湖南省保安

副司令肖作霖、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还有程星龄、余志宏。当时人民解放军已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正在进行淮海战役。大家漫谈时局，认为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败，经济困难重重，人心丧尽，和共产党打仗必败无疑。李达还直率地说：颂云（程潜字颂云）先生应当替湖南人民着想，湖南不能打仗，只有走和平的道路。他还谈到蒋介石不会有兵到湖南来，白崇禧可能还要打的，要注意对付桂系，善于自处。事后肖作霖、邓介松将这次便宴谈话情况告诉程潜，对程潜很大的影响。

这年冬天，省政府顾问方叔章受地下党之托，多次与程潜谈话。有次方叔章说：“颂公，如果共产党的军队来了，你准备走哪条路？打吧，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打垮了，白崇禧那二三十万人更打不赢；为湖南人民着想，也是不能打的。跑吧，是去美国，还是去香港、台湾？你一家二十多口人，你又只有那么多钱，到美国去不够用，到香港去也花不多久。到台湾去，蒋介石不要你，你和白崇禧也搞不来。怎么办呢？”程潜说：“我总不能投降呀！”方叔章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说不能投降，日本天皇还投降呢。何况可以讲和，这又不是投降。”这席话对程潜有很大的影响。程潜对今后出路考虑再三，他不能打，不能跑，只能和。

1948年底的一天晚上，程潜和程星龄就时局变化和对策作了一次长谈，决定委托程星龄代表他和地下党联系。

1948年秋后，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基本被消灭。美国眼看蒋家王朝即将土崩瓦解，又不愿让共产党统治中国，企图依靠桂系来扭转残局。12月，桂系在美国支持下乘势而起，白崇禧在武汉通电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随即联合程潜等要求停战和谈，并发起华中五省和平运动。由湖北、湖南等省参议会先后发出呼吁和平通电，要求蒋介石“恢复和谈”。其意实为逼蒋下台，由桂系取而代之。

白崇禧利用蒋、程矛盾，曾派李书城来湖南，动员程潜采取主和的一致行动。程潜也不含糊，既表示同意白崇禧“和平解决”的主张，又暗地写信给蒋介石，派绥署高参、军统特务杨继荣持信去南京，将白崇禧的图谋向蒋介石告密。这样就使蒋介石安置在程潜左右的绥署参谋长刘嘉树和杨继荣之流，认为程潜是忠于蒋介石的，一起来对付桂系。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同志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同日，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的新年文告。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蒋介石在新年文告中提出的“和平”建议的虚伪性，提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21日，蒋介石不得已以“因故不能视事”为名，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22日，李宗仁发表文告，表示愿即开始和平谈判。蒋介石、李宗仁和白崇禧等，都企图利用和谈，实行“划江而治”，形成“南北朝”局面，保持反动势力，以便在美国扶持下卷土重来。

湖南人民历经战乱，要求休养生息，和全国人民一样，盼望实现真正和平。在全国急剧转变的有利形势下，湖南地下党积极进行统战工作。于是程潜主张和平，群众要求和平，上下配合，掀起了全省和平运动。1949年1月15日，由于与地下党有联系的省工业会理事长陈云章的积极活动，省工业会、省商联会、省农会、省总工会，长沙市总工会和市商会等六团体，分别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呼吁和平。省参议会召开座谈会，主张促进和平运动，向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发出呼吁和平电文。程潜在收到行政院长孙科征求和谈意见电文后复电，对中共所提八项条件，除对惩办战犯一条提出不以和谈对象作为战犯外，其他各条均表赞同。复电并在长沙《中央日报》等报上公开发表。1月23日，程潜

发布命令湖南暂停征兵。2月2日,成立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仇鳌、方鼎英等30多人当选为干事,仇鳌为主任干事。湖南大学教授会、湖南辛亥首义同志会等,从1月起,召开座谈会,或致电国共双方,一致呼吁和平。

1949年4月,国共进行和平谈判,和平运动掀起高潮。省工委领导以学生为主的城乡人民,开展了以反对假和平,争取真和平为中心的群众运动。

4月1日,南京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军警镇压和平示威游行学生,打死3人,打伤100多人的惨案发生后,由湖南大学发起,4月7日联合长沙各大、中学校师生,举行声援南京“四·一惨案”受难学生及争取真和平大会。6日深夜,湖南大学得到消息,国民党特务已作准备,可能在学生举行大会和游行时制造血案。7日晨,湖南大学、第一师范学校和清华、岳麓等中学3000余人,不顾风险,仍手持白旗,胸佩白花,渡江来到中山公园。克强学院、音乐专科学校和湘雅、广益、明德、周南等20多所学校队伍均先后到达。南岳国立师范学院、宁乡民国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也派代表参加了大会。还有一些市民自动参加大会。到会人数达一万余人。这时传来快报:程潜已下令,全市军警不得携带武器阻止学生开会和游行,且须维持治安。

大会充满肃穆悲愤的气氛。会场四周悬挂悼念烈士,控诉反动派暴行的挽联和标语。其中一首挽联写道:“为和平呼吁,为正义牺牲,如此精神,不愧贞诚烈士;用枪炮屠杀,用江水掩埋,这般残暴,岂是真正和平!”大会由湖南大学自治会主席胡书卿主持。首先举行公祭仪式,宣读祭文,同学们流着眼泪,高呼口号,表达了对烈士的悼念、敬意和争取和平的决心。大会主席在讲话中,呼吁程潜主席顺应湖南人民的要求,为争取湖南的真正和平作出贡献。

大会结束后，以周南中学女学生为前导，湖南大学学生殿后，冒着风雨，举行万人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高举孙中山遗像和孙先生的“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言，沿途散发《大会宣言》、《告同学书》等传单，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和“冒着统治者的炮火前进”的歌曲，高呼“反对假和平，争取真和平”、“湖南人民不要战争”、“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人站起来”等口号，书写“停止征兵征粮，实现真正和平”等大幅标语。许多工人、郊区进城农民和公教人员自动参加了游行行列。这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震撼了麓山湘水，使争取真和平的浪潮波及全省。

4月12日，在中共长沙市工委领导下，《长沙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争取真和平联合会》成立。

4月13日，岳阳发生反动军警镇压争取真和平示威游行学生的惨案。长沙学联声援岳阳学生，决定全市学生罢课一天，并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各校分头召开了声援大会。程潜接见请愿代表时，表示接受惩办肇事凶手等要求，并表示赞同国共和谈协定。他再次说：“关于争取和平的集体行动，命令军警不加阻止。”

4月15日，南岳国立师范学院、国师附中、岳云中学等校大、中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下，举行了反暴行大游行，并成立南岳学生联合会。随后汉寿、醴陵等地学生也都举行了争取真和平大游行。

我们从长沙报纸上，看到程潜在省政府4月份扩大月会上的讲话。他明确表示本省决不作备战打算，并吁请全国争取真正的和平。他说：“湖南过去在八年抗战中，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的损失已无法估计。再加上三年内战，更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所以我主张停止征兵，减少征粮，限租护农，救济水灾，修复堤垸，都纯粹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现在全国人民要和平，我们

只有排除万难，力谋真正和平之实现。”

由于各地党组织的发动，以及在程潜的影响和省会长沙的带动下，湖南全省普遍开展了和平运动。

4月21日，在长沙学联的推动下，省会各界组成长沙市人民争取真和平联合会，22日改名为湖南省会各界争取真和平联合会，并决定24日举行省会10万人争取真和平示威游行。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已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已于21日强渡长江，挥戈南进。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由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改名）长官白崇禧，一面急电程潜制止游行，一面密电在长沙的蒋、桂嫡系军警特务，准备武力镇压。当时列入他们黑名单的湖南大学师生，就有李达、曹廷藩、刘正、彭越、曹伟如等100余人。由于支持程潜起义的原军统局中将主任秘书张严佛和宪兵第十团团长姜和瀛，及时将这一情报和黑名单告知余志宏、涂西畴，省工委立即进行研究，决定停止游行，避免重大牺牲，由学联通知各校有关单位，改24日游行为学校罢课三天。

4月23日下午，我和余志渡江来到湖南大学党总支委员朱剑农教授家里，把总支书记周季平找来，通知他们立即布置停止游行，并派出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分赴各校去说明情况，同时布置撤退上了黑名单的党员和积极分子。24日停止了10万人大游行。上午仍有一些同学上街宣传。左家垅的农民还在附近游行，要求停止征兵征粮，保护佃农利益。

4月下旬，省工委遵照党中央关于除了做程潜、陈明仁的工作外，还要争取地方势力的指示，加强了对省参议会、省会各公法团体，湖南耆宿唐生智和仇鳌等的统战工作。当时程潜准备请唐生智来长沙共商湖南和平起义大事。省工委经过研究，同意与地下党有联系的省工业会理事长陈云章，代表省会人民团体，和

省参议会席楚霖、和平促进会周翊襄，同往东安县迎接唐生智来长沙，与程潜合作，发动地方势力，进一步开展和平自救运动。

5月2日，在长沙成立了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唐生智（代表湘南）为主任委员，陈渠珍（代表湘西）、仇鳌（代表湘中）为副主任委员，刘公武（代表湘北）为常委兼总干事，统一规定各市、县建立自救委员会，负责编组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实行自保自救。当时为了避免蒋介石和桂系的忌讳，委员会没有用“和平”的字眼，而实际上形成了争取实现湖南局部和平的运动。程潜和唐生智、仇鳌过去互有嫌隙，但现在却在争取湖南局部和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

5月上旬，白崇禧率部退到湖南后，即采取高压手段，撤销了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然而，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运动不可阻挡地发展为反桂系白崇禧的斗争和争取湖南和平解放。

促进程潜、陈明仁起义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战役的重大胜利。12月，淮海战役也取得决定性胜利，同时胜利进行了平津战役。国民党败局已定。

1948年的12月25日，白崇禧在美国支持下，致电蒋介石，主张“和平解决”，企图逼蒋下台，由桂系掌权。此时国民党内部出现主和、主战两派。蒋介石在屡战屡败和各方压力下，也就在1949年元旦文告中唱起了“和平”的高调。于是国民党发动了“和平攻势”，要求和共产党停战和谈。而其目的，不论是蒋介石或者是李宗仁、白崇禧，都不是要真正的和平，而是企图通过和谈，阻止人民解放军继续进军，实现以长江为界，国民党和共产党南北分治的局面，以便获得喘息时间，在美国扶助下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引退”前，曾拟定一项利用“和谈”，争取3个月到6个月时间，在江南重新编练国民党军队的计划，准备再战。1月29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向国民党军队发出密电：“吾人为求捍卫国家民族及党与军之生存，应下最大决心，与之（指中共）誓不两立，坚决从事长期自救、自卫与救民之战斗。”白崇禧竟于2月4日将这个通令转发其部下。4月国共双方进行和谈。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终于暴露了他们所谓“和谈”和

搞假和平的真面目。

随即，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于4月21日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同时“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程潜的主张和平，与蒋介石、白崇禧等的“以备战求和”、“求和以备战”不同。他下令湖南停止征兵，支持和平运动，是希望实现真正的和平。他不愿为蒋介石和桂系而战，更不愿湖南人民再遭战祸。而且他的主张和平，反对内战，早在1945的9月国共重庆谈判时就有所考虑了。据程潜夫人郭翼青后来回忆，她曾经埋怨程潜不该竞选副总统。程潜对她说：“不是我本心要去搞，那年毛主席到重庆，我们见面时漫谈时局，谈到将来会要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毛主席怂恿我参加竞选。他说，搞成了，好主持和谈；如果搞不成，你就只要个湖南。”郭翼青说：事隔18年，在1963年毛主席70岁生日前，程先生费了将近半年时间，苦心经营锤炼了七律十二首《毛泽东主席七十大寿祝诗》，其中有“我本多年邀默契，喜从中夜挹光明”之句。“默契”什么呢？指的就是这回事。由此可见，毛主席当年在重庆谈判时就亲自走访程潜，做了争取程潜主和的工作。以后程潜起义，和平解决湖南问题，是有历史渊源的。

然而，程潜的起义，却经过了复杂而又激烈的斗争。他有不少顾虑，又遇到很多困难。但他深明大义，能以湖南人民利益为重。经过我们党的政策宣传和思想工作，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终于帮助他解除了顾虑，度过了难关，团结湖南地方势力，联合

陈明仁等将领一同起义，走上了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光明大道。

程潜的一个顾虑，是1948年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宣布蒋介石43人为头等战犯，新华社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又公布了战犯名单，他被列入第26名战犯了。而1月14日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第一条就是“惩办战争罪犯”。程潜发生了疑虑：既是战犯，且要惩办，和谈又何从谈起？他过去也有反共的言行，还怕中共与他算旧帐。他和程星龄谈话时，就表示希望不被当作战犯惩办，幸保余生，以终余年，并示意要程星龄找共产党“搭线”。

1949年1月，程星龄向余志宏提出，他受程潜委托，希望会见地下党负责人。于是我和余志宏一起，到了程星龄住处，马子谷也在那里。程星龄说：程潜愿意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条件，但是对共产党把他当作作战犯有顾虑。我表示欢迎程潜走和平道路，只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一定会记得，希望他不要顾虑这个问题，而是要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决心。

程星龄问：要有什么样的实际行动呢？我提出目前希望程潜能够办几件事：一、由我们推荐新任醴陵、新化等5县县长；二、撤换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三、不得进攻我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四、不让特务宪警逮捕共产员和进步分子，不压制群众运动；五、在湖南军政高级人员中做主和的工作。

程星龄向程潜转告了地下党希望他目前办的几件事，程潜满口答应尽力去办。于是省工委经过研究，指定余志宏代表省工委与代表程潜的程星龄经常联系，交换情况和意见。

省工委为了帮助程潜解除关于战犯的疑虑，随即通过程星龄、方叔章等去向程潜做工作，说明共产党的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并指出，如果接受和平条件，也就不成其为战犯了。再说，如果战犯名单中不列程潜，蒋介石和白崇禧不是更怀疑他站

到共产党一边去了吗？为了使程潜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消除疑虑，方叔章和程星龄还出了一个主意，由程潜发了一个电报给他上海的长子程博洪，要他回长沙谈一谈。肖作霖也给程博洪写了信，请他回来做程潜的工作。程博洪当时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曾主编进步杂志《时与文》，一贯倾向进步。过春节时他回到长沙，通过父子谈心，基本上帮助程潜解除了关于“战犯”的这个思想上的大疙瘩。

当时列入战犯名单的傅作义将军，按照中共八项条件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受到了人民尊敬和优厚待遇，也为程潜走和平道路做出了榜样。

程潜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蒋介石虽然派他回湖南主持军政，但并不信任他，又派一批黄埔军校毕业的湘籍将领回湖南掌握军权。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就有李默庵（兼第十七绥靖区司令）、黄杰（兼设在衡阳的国防部第五编练区司令）。他如果不能掌握实力，没有军队，要控制湖南局势，自谋出路，主持和平，也是办不到的。虽然他以加强湖南反共兵力为名，组建了5个师，扩充了保安部队，但仍势微力弱。因此，程星龄和原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向程潜建议，把陈明仁调来长沙，协助程潜掌握军权。程星龄同时征求省工委的意见。

省工委认为：陈明仁和程潜既是醴陵同乡，又是程潜早年任校长的陆军讲武学校的学生，两人关系较深。1947年陈明仁任七十一军军长时，在东北四平街和解放军打了一场硬仗，国民政府给他颁发青天白日勋章，将他升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可是，陈诚却借故要将他撤职查办，蒋介石便给他安排了一个国民政府参军的闲职。因此他对蒋介石、陈诚非常不满。后来白崇禧想利用他和共军作战，起用他为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二十九军军长，后又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但是，他和桂系没

有渊源，靠白崇禧也靠不住。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形势下，他随程潜一道走和平道路是可能的。于是省工委同意了程星龄和刘斐的建议。当时程潜提出不由他出面向白崇禧要求调陈明仁，以免白崇禧生疑。因刘斐与白崇禧关系较深，就由刘斐去做说客。

1949年春节期间，刘斐即去武汉向白崇禧说：现在湖南有军事实力的是蒋介石的嫡系，要派个人去湖南掌握军权才好。白崇禧问他派谁去好。刘斐说：最好是派陈明仁，他也是蒋介石的“天子门生”，便于和那些黄埔生打交道。白崇禧说他准备要陈明仁当武汉卫戍司令，守卫武汉，刘斐说：陈明仁指挥不了桂系军队，靠他自己那两个军是守不了武汉的，不如要他回湖南去掌握军权，坚守湖南，保障武汉到广西的通道，所起作用还大些。白崇禧听刘斐说得有道理，便同意了。他不知道调陈明仁回湖南是另有计谋，还打电话征求程潜的意见。程潜当然表示赞同。

刘斐又去见陈明仁，说靠白崇禧是没有前途的，还是回湖南和程颂公一道自谋出路的好。陈明仁也有回湖南的想法，他不愿为白崇禧去拚命守武汉，马上同意回湖南。1949年2月，陈明仁率部来湖南后，即向程潜表示“愿跟随颂公走”。陈明仁随后兼任长沙警备司令，第一兵团也由两个军扩充到三个军。

陈明仁的调来湖南并掌握军权，是以后程潜、陈明仁能够起义成功的一大关键。

但是，陈明仁和解放军打过硬仗，怕算旧帐，来湖南后仍顾虑重重，对走和平道路动摇不定。省工委认为必须多做工作，把陈明仁争取过来。经过程星龄和余志宏研究，又设法把陈明仁的亲信旧部李君九从台湾请来，通过李君九做争取陈明仁的工作。以后并由李君九（第一兵团高级参谋、人事处长）、温汰沫（第一兵团经理处长）担任陈明仁与地下党的联系人。

《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第一条第一项明确规定：

“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并明确规定，凡愿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都可以签订地方性的协定。这些政策规定，对程潜有重大启示。

人民解放军于4月23日解放南京，继续挥师南下后，程潜提出要见地下党负责人。省工委认为在人民解放军胜利南进，国民党阵营四分五裂的形势下，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政策，可以进一步争取程潜、陈明仁起义，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于是派余志宏去见程潜。

那时余志宏只有32岁。第一次随程星龄去见程潜时，程潜对他说：“我看你不象地下党负责的，我要见你们的负责人。”余志宏便到我那里，说程潜要见我。当时党中央有规定，地下党负责人不要轻易出面。我对余志宏说：“还是你去见程潜，就说你是地下党派来的代表，有话尽管对你讲，可以保守秘密，还可以保证将意见呈送党中央和毛主席。”于是余志宏第二次去见程潜，程潜才和他接谈。

余志宏按照省工委的意图，向程潜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精神，特别是关于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政策。程潜表示愿意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愿意拿出走和平道路的实际行动来。余志宏便代表省工委向程潜提出三条要求：一、释放一切政治犯；二、保护国家财产、机关、档案和工厂、交通、桥梁；三、不捕杀革命群众。程潜表示第一、二条可以做到，第三条有些难办，因为蒋介石和白崇禧的特务要抓人，他管不住，但是他可以打个招呼，提出抓人要经过他

批准。接着程潜对余志宏说：“我也有三条要求：一是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但不参加共产党；二是反对蒋介石、白崇禧，但不背叛孙中山的国民党；三是起义后把我在上海的房子留给我住，我就心满意足了。”作为国民党元老，程潜当时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以后事实表明，他的起义对华南、西南、西北各省影响很大，党中央和国家给了他崇高的荣誉以及重要职务和实权。

1949年5月，白崇禧从武汉退到湖南后，叫嚣什么“湘桂合作”，“与共军决战”，反对湖南局部和平；改组湖南省政府，安置桂系亲信；撤销湖南人民自救会，镇压学生运动；甚至在公开场合当着程潜的面指桑骂槐，对程潜不断施加压力，并准备把程潜搞到广州去当考试院长。

程潜对白崇禧的施加压力难以忍受，还担心白崇禧加害于他，便于1949年6月派程星龄和刘岳厚去香港，商请参加国共和谈后去香港的刘斐回湖南担任省政府主席。刘斐不愿回湖南，并对程星龄说：“我与白健生（即白崇禧）的关系，你是深知的。颂公配合子良（即陈明仁）共同欺骗白健生，我怎能扮演颂公这样的角色呢？请你转告颂公，有子良掌握兵权，白健生深信子良是坚决反共的，认为颂公只不过是愧儡，就决不会危害颂公，颂公不必过虑。”

程星龄在香港还会见了章士钊。章士钊见面就问：“颂公对起义有没有动摇？”程星龄说：“没有。”章士钊连声说“好！好！”程星龄把程潜受白崇禧欺压，程潜商请刘斐回湖南接任省主席，被刘斐拒绝的经过告诉章士钊。章士钊认为刘斐的看法很对，并说：“桂军在湖南呆不了多久，你们应付得很好，要劝颂公大胆地再顶住一个时期。章士钊接着说，毛主席对颂公走和平道路，期望甚殷，对陈明仁也不会追究过去在四平街和解放军打仗的问题。他谈到毛主席说过：当时，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

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会重用他。

程星龄回长沙后，转达了刘斐和章士钊谈话的意思，帮助程潜、陈明仁消除顾虑，进一步酝酿起义。程星龄将去香港的情况也告诉了省工委。他还说在香港会见了新华社分社负责人乔冠华，向乔冠华汇报了程潜准备起义和处境困难的情况。乔冠华表示即电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

1949年6月，程潜写了决心和平起义的备忘录，请省工委送交党中央和毛主席。程潜在备忘录中写道：“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平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一俟时机成熟，潜当立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反动势力。”备忘录中还提出了双方指派军事代表成立军事小组和短期内设立联合指挥机关、整编部队等意见。程潜在备忘录上亲自签了名，盖了章。

我收到程潜备忘录后，立即请做篾匠的地下党员赵连生，特制一担夹层篾篓，将密写的省工委向华中局的报告和程潜备忘录，一起藏在篾篓夹层中，派地下党员黄人凌、张友初化装成商人，送汉口华中局。华中局经王首道和肖劲光于6月30日转报党中央。

毛主席看过程潜备忘录后，于7月4日给程潜复电：“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复电同意程潜所提成立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部队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并说已派李明灏到汉口，请程潜派员到汉口第四野战军洽商有关问题。

这个复电是批发党中央设在长沙的地下电台转交程潜的。负责电台的是党中央派来湖南做地下工作的周竹安。他通过湖南省在乡军官会副主任委员黄雍，在长沙县桥头驿车站附近乡下秘密建立了这个电台。黄雍也是程潜任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时的学生，他直接和程潜联系。长沙市内还有一个华中局（原中原局）派张大平来建立的地下电台，省工委委员欧阳方和这个电台取得了联系。

程潜收到毛主席复电后，即派刘纯正（国防部第五编练区司令部设计委员、民促社成员）去汉口与第四野战军联系，要求解放军从速入湘。刘纯正走以前，余志宏曾和他见面交谈，省工委并派交通员刘尚文同他一起去汉口，以便联络。后刘纯正随人民解放军一道入湘返长沙。

这时，党中央派来参加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李明灏已经到达汉口。李明灏和程潜、陈明仁都是醴陵同乡，他在程潜任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时为该校教育长，也是陈明仁的老师。此役时他在程潜的第六军任第十七师师长。1948年他投奔解放区之前，到汉口会晤程潜。程潜当时任武汉行辕主任，知道他要去解放区，表示赞成，并嘱他代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问好。李明灏进入华北解放区后，在华北军政大学任总队长。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考虑到李明灏与程潜、陈明仁关系较深，特意安排他参加策划与协商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电告程潜。同时指示第四野战军派代表数人与程潜的代表会商时，其中应有李明灏。

李明灏来汉口后，经过他和王首道、肖劲光等同志研究，决定派他的一个亲戚、在汉口开办大公电池厂的陈大寰，去长沙和程潜、陈明仁联系。陈大寰的父亲在大革命时期曾任第六军军需处长，是程潜的旧部。陈大寰以商人的身份，带了李明灏借用经

商口气，分别给程潜、陈明仁写的敦促起义的信，还带了毛主席勉励程潜起义的密信（与毛主席接备忘录后复电内容同）。毛主席的信是用薄纸小字抄写的，卷在电池锌筒上，覆以薄油纸，再贴上“大公报”商标，装在手电筒内带来长沙的。陈大寰于7月9日和第四野战军派到长沙做秘密工作的刘梦夕一道来长沙，将毛主席的密信和李明灏写的两封信，分别面交程潜、陈明仁。

程潜和陈明仁见到毛主席的信和李明灏的信，与第四野战军取得联系后，更具体地进行起义的准备，力争实现湖南和平解放。

开展反白崇禧的斗争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命令，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第三野战军，于4月21日强渡长江，4月23日解放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林彪、罗荣桓等领导的第四野战军，于5月16、17两日，解放了华中重镇武汉。6月，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向中南进军。7月，解放军分中、西、东三路进入湖南，接连解放临湘、平江、浏阳、岳阳、澧县、湘阴、醴陵等县，长沙指日可下。

白崇禧早在人民解放军逼近武汉的时候，就作出退守湖南的计划，并进一步加强对湖南的控制。他陆续将桂系部队撤退到湖南。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迁至衡阳，长沙设立指挥所。他本人于1949年5月6日到达长沙后，即杀气腾腾，叫嚣什么“局部和平无异投降”，“实行湘鄂桂联防进行决战”。顿时长沙上空乌云滚滚，白色恐怖笼罩全城。由于白崇禧采取各种手段严密控制湖南，不断对程潜施加压力，镇压湖南和平运动，他便成为湖南实现和平解放的主要障碍。于是，在省工委领导下，湖南各界人士开展了一场反白崇禧的激烈斗争。

首先，白崇禧在军事上作出部署，充当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建

立的湘粤联合防线的的主力，妄图在中南地区负隅顽抗，并在湖南和解放军大打一场。他率领张淦的第三兵团和鲁道源的第十一兵团入湘，坐镇长沙，加上陈明仁的第一兵团，共约 30 万兵力。左翼有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宋希濂等的部队，右翼有江西省主席方天等指挥的部队，三个方面联合起来，共有六七十万人马。他将长沙、株洲、醴陵地区作第一线作战部署，将衡阳、宝庆（邵阳）地区作为第二线作战配置，摆出了要和入湘解放军拚战一场的架式。此后还可南退两广，西窜川、黔、滇。由于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5 月 15 日率部 2 万余人在武昌以南贺胜桥、金口一带起义，白崇禧胆战心惊，对程潜新编部队很不放心。为了剥夺程潜的武装，同时为了拉拢陈明仁，他将程潜回湖南后新编的两个军（五个师），和杜鼎的第一百军，拨归陈明仁的第一兵团，与陈明仁的两个军一起重新组成第一兵团的三个军。此时第三一四师师长陈达在长沙岳麓山起义，事先没有各方面联系好，轻举妄动，被白崇禧的部队包围击溃。

当时省工委注意掌握白崇禧的军事部署和行动。省工委统战策反小组涂西畴同志，秘密联系两条情报线：一条线是陈明仁第一兵团的参谋长文于一。他参加白崇禧指挥所召开的军事汇报和部署会议，将每次会议的内容及时告诉涂西畴。白崇禧于 1949 年 4 月下旬向第一兵团下达的《武汉撤退及关于尔后作战部署行动计划》的机密文件，即由文于一抄送给涂西畴转交省工委。另一条线是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陆空联络通讯组的组长李人珍。他掌握不少白崇禧指挥的军事系统通讯情况，也经常向涂西畴提供情报。此外还有长沙火车站副站长、民促社成员张继武，经常将铁路军运情况向涂西畴汇报。这样，省工委就能够及时了解白崇禧的军事部署和行动，并向华中局汇报，以便人民解放军

作出切合情况的湘赣战役部署。后来,经过发起湘赣战役和程潜、陈明仁起义,江西吉安等地和长沙附近地区解放后,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在游击队配合和人民群众支持下,进行衡宝战役,歼灭白崇禧部主力4.7万多人。桂系军队残部大部分逃往广西。

其二,白崇禧在1949年4、5月间即着手改组湖南省政府,免去一些主和拥程(潜)的重要军政人员的职务,安排桂系亲信,并企图将程潜调离湖南,以便掌握湖南军政大权。白崇禧非常恼恨程潜的和平主张,不容许湖南搞局部和平。他采取“清君侧”的办法,除去程潜周围主和人物。对程潜左右出谋划策的一文一武一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和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主任兼长沙警备司令肖作霖,更是必欲去之而后快。1949年4月初,即逼使程潜免去邓介松的省政府秘书长职务,由桂系亲信杨绩荪接任。5月,又命陈明仁接替肖作霖任长沙警备司令,并接替邓介松任省政府委员。邓介松和肖作霖随即被威逼离开长沙去湘乡和邵阳。接着白崇禧派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政工处长、桂系田良骥接替邓飞黄任湖南省民政厅长。同时撤销程潜设立的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主任肖作霖、副主任程星龄被无形免职。此时广州国民党政府经过白崇禧建议,也准备将程潜调离湖南。省政府改组之说,一时甚嚣尘上。

程潜如果调离湖南,湖南上层人士的和平运动便难开展,湖南人民必遭战祸。当时经过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的积极活动,省会仇鳌等耆宿、李默庵等将领和各人民团体,5月间均致电代总统李宗仁 and 广州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以武汉失守后亟宜稳定湖南等理由,要求挽留程潜,保持湖南现状。广州国民党政府惟恐湘局动荡,李宗仁即电程潜,并复电湖南省参议会和李默庵等将领,表示对程潜“倚畀方殷”,“时危势迫,尤赖领导”,尚希省参议

会暨各将领“多所襄赞，悉力以赴”。同时省工委和长沙市工委通过新闻支部和“民革”、“民盟”成员掌握的几家报纸，大造舆论，说程潜这位湖南“家长”不会走，不能走，省政府不能轻事更张，省政府改组之说不确，起了支持程潜、稳定程潜的作用。直至7月下旬，白崇禧迫使程潜去邵阳后，广州国民党政府才正式任命陈明仁为湖南省政府主席。而此时的陈明仁，已决心随程潜起义了。

白崇禧为了进一步控制湖南全省，对抗人民解放军，还提出实行所谓“总体战”，“军政一元化”，以师长兼行政专员，团长兼县长。对专员、县长人选的原则，是优先选拔湖南籍而又与桂系有关的人充任，至于湘桂走廊地带（即现零陵地区），则广西人也可当专员、县长。由于形势急剧变化，程潜暗中抵制，白崇禧的这一谋划未能实现。相反，经过地下党向程潜建议，免去一些反动专员、县长的职务，并推荐与地下党有联系的进步军人或由程潜选定能随其起义的人员，任专员、县长。如陈采夫任第四区（常德地区）行政督察专员，蔡杞材任第五区（益阳地区）行政督察专员，颜健任益阳县长，伍光宗任新化县长，肖道柏任醴陵县长等。新任专员、县长不少是“民促社”成员。这样，地下党和程潜方面就争取更多的地方势力，控制了一些地区和县，从而加快了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

其三，白崇禧在其假和平面目暴露后，即大肆镇压湖南和平运动。1949年5月，白崇禧来湖南后，即撤销湖南人民自救会，逼走唐生智。随后他成立“反共宣传委员会”，指定一些知名人士参加。其中周昭怡等登报声明退出或不参加其反共活动。白崇禧还组织所谓“人民服务队”“和青年救国团”，进行特务活动，并指示其心腹人员成立反动组织“保农会”。6月，大肆镇压爱国学生运动。12日长沙市学联执委会和区代表联席会议开会时，特

务抓走湖南大学代表龙汉河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代表钟振龙。后经地下党组织设法营救出狱。19日晚,特务将省立克强学院学生自治会理事长高继青秘密绑架杀害。24日宣布解散长沙学联。学联被迫转入地下,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白崇禧还准备逮捕100多名湖南大学师生、文教界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由于省工委统战策反小组联系的原国民党军统局主任秘书张严佛和宪兵第十团团团长姜和瀛,向地下党组织提供了情报,我们及时将列入黑名单的人员撤退转移,避免了牺牲。国民党特务还企图暗杀主和的民主人士陈云章等,也没有等得逞。

高继青惨案发生后,长沙各报连续报道,一场全市规模的声援和追悼活动迅速开展起来。高继青烈士尸体是1949年6月24日在南门外左家塘苏州公墓中发现的,颈项被勒,全身九处刀伤。27日,湖南大学成立“声援高继青惨案反迫害运动大会”。经地下学联研究决定,将全市性的追悼大会改在湖南大学举行。29日上午,克强学院先在藩后街二院举行追悼大会。随后,由数百名各校派来的代表,护送烈士灵车经蔡锷路、中正路、黄兴南路到灵官渡。沿途市民冒雨肃立致敬,挥泪相送。许多人自动参加送葬行列,队伍增至两千余人。还有各区学校派出的代表,举行路祭。护灵队伍过江时,湘江划业工会为哀悼烈士,调集了大批划子免费运送。灵柩上岸时,岳麓区各校代表又举行了路祭,然后护送灵柩到湖南大学礼堂。

7月3日,在湖南大学操场隆重举行长沙市各界追悼高继青烈士大会,65个单位的代表4000余人到会。高继青烈士的父母兄妹参加了追悼大会。主席台上高悬高烈士遗像,台下摆着40多个花圈,会场四周挂满挽联和祭幛。有一首挽联写道:“为自由为民主你倒了下去,要生存要活命快站起拢来!”追悼大会充满哀痛和悲愤的气氛。当学联等单位代表致哀词,读祭文时,

台上台下一片哭泣声。追悼会后，代表们护送烈士灵柩安葬于岳麓山集贤村后墓地。高继青惨案揭穿了白崇禧一伙屠杀人民的魔鬼狰狞面目，更激励湖南人民为民主、和平与解放而斗争。高继青同志是人民永恒怀念的英烈。

其四，白崇禧封锁新闻，控制舆论，查封报纸，打击进步新闻工作者。解放前，中共地下党员在长沙各报社工作的有58人，民主党派成员和进步人士都参加了各报社工作。长沙大多数报纸都能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拒登国民党发出的造谣污蔑共产党的专稿，利用“本报专电”、“特约记者通讯”等方法透露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真相，报道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为开展和平运动，支持程潜和平起义大造舆论。因此，白崇禧多次下令颁布“军事新闻颁布法”、“戒严区域新闻界应注意事项”等，对新闻界采取高压手段，企图控制舆论。1949年5月到6月，连续有《晚晚报》、《长江晚报》、《实践晚报》、《经济报》被罚停刊。《晚晚报》总编辑戴哲明、《长江日报》副社长陈燕平等6人先后被捕。6月11日，长沙《中央日报》因刊载“国军撤离赣州”的消息，被勒令停刊三天，社长段梦暉（民革成员）被拘留三天，随后被撤职。《国民日报》社长刘虚也被撤职。6月23日，中共长沙市工委领导的《实践晚报》被查封，两名从业人员被捕。6月26日，白崇禧还亲自出席记者招待会，叫嚣什么“湘桂合作”，“实施总体战”，坚决“剿匪”“戡乱”，镇压“分化戡乱阵营，煽动学联会和青年学生”的“共匪”和民革民盟份子”，对新闻界施加压力。

长沙新闻界对白崇禧的高压手段忍无可忍。中共地下新闻支部积极领导新闻界团结斗争。由长沙市报联会、新闻从业员互助会、铅印工会联合发起，6月21日全市报纸停刊一天，以示抗议。同时出版“联合特刊”，发表新闻界的抗议书、各报的评论和各界人士的声援。在《我们的抗议和申诉》一文中说：“长沙各报

在一个月以来,被迫停刊七次,社长及新闻从业员被扣留凡四次。现在长沙中央日报社社长段梦晖又突奉国民党中宣部命令撤职、查办了。长沙报界同人认为事态之演变,至此已属最严重关头。谨以忍痛罢勤方式,向国民党中宣部抗议,向各界人士申诉……。长沙报人的‘获咎’,是不该反映湖南人民的广泛意志,要求和平,不该真挚沉痛地为湖南人民申诉苦难!因此,我们不能不严重抗议。因为我们不但要为本身伸张正义,而且还有更重大的为人民伸张正义的责任在我们肩头。”特刊指出:“这次停刊,是长沙市新闻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而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它不但促进了长沙市新闻界空前未有的大团结,而且表现出长沙市新闻界忠贞不屈的精神和报人的人格。”各报停刊后,许多知名人士发表谈话,支持长沙新闻界的正义行动。22日,长沙学联并宣布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一天,抗议逮捕学生,并声援新闻界。这样,就把新闻界的斗争和省会各界争取湖南和平解放的斗争,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次长沙新闻界的联合抗议行动,也就是对封建法西斯反动统治头目白崇禧的联合抗议示威。

省工委和长沙市工委通过新闻界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扩大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并经常和长沙绥靖公署秘书长刘岳厚、省政府新闻处长刘伯谦等联系,了解国民党军政等各方面的动向。由地下新闻支部联系的新闻界知名人士,有长沙《中央日报》社长段梦晖(民革成员)、《国民日报》社长欧阳敏谏、《湖南日报》总编辑李幻如(民盟成员)、《长江日报》社长廖文岛(民革成员)和副社长钱去非(民革成员)、《晚晚报》社长蓝肇祺(民盟成员)和副社长康德(民盟成员)、《实践晚报》社长严怪愚(民盟成员)、《法报》发行人唐文燮、《时代日报》发行人魏方等。他们在宣传反内战,反独裁,要和平,要民主,支持程潜和平起义,反对白崇禧的反动统治,掩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报社开展工作等

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湖南和平解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五,白崇禧派部队围攻湘中地区的游击队。在1949年3月间,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就在其“敌情”态势图上,插上了一面“姜亚勋匪部”的小旗子,并在《敌情通报》中惊呼:“姜亚勋匪部的存在,是江防战略决战的一个威胁。”几次命令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迅速剿灭”。可是游击队剿而不灭,反而越剿越多。1949年6月下旬、7月初,人民解放军进至鄂南,即将入湘。湘中各游击队根据省工委指示,活动在潭宝、长常等公路上,准备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阻止敌军逃窜。白崇禧为对抗解放军,保障其交通线,调动7个师、22个团的兵力,“围剿”被他们视为“心腹之患”的湘中游击队,特别是姜亚勋率领的湘中一支队。7月3日,敌以营为单位,齐头并进,层层包围,向湘中游击队发动进攻。为广大人民群众爱护的湘中游击队避免与敌人主力决战,采取避实就虚,保存自己,牵制敌人,各团相机作战的方针,待敌人合围时,跳出包围圈,打其腹背,粉碎敌人“围剿”。7月12日,将敌人主力吸引到雪峰山地区。13日深夜,部队撤退,分三路突围,使敌人扑空。由于人民解放军于7月进入湖南,先后解放临湘、平江、浏阳等地,加之陈明仁准备随程潜起义,他派出的部队并没有尽力“围剿”,随即陆续撤回。至7月21日,历时3周,湘中游击队取得最后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白崇禧从军事、政治等方面控制湖南,镇压湖南和平运动,迫害进步人士,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学生。他的桂系部队在湖南强行抓丁、派款、要粮,搜括和抢夺人民财产,在岳阳、平江、长沙、株洲、衡阳等地,甚至敲诈勒索,大肆抢劫,强奸妇女,致使“丁男不敢耕于野,妇女不敢织于室”。因此,更激起各界人士和湖南人民的愤怒。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齐心协力,发动

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开展了反白崇禧桂系的斗争,从而促进了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湖南宣告和平解放。

华中局的重要指示

抗日战争胜利后，省工委执行党中央和南方局、南京局、上海局、华中局的指示，在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发动武装斗争，扩大统一战线，促进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们感到省工委领导力量不强。1946年省工委成员为书记周礼，组织委员刘亚球，宣传委员罗振坤，委员张春林、刘鼎，而张春林和刘鼎于当年病故，刘亚球又于1948年秋调去华南分局另行分配工作。1949年4月下旬，才从华南分局调调来欧阳方同志参加省工委。省工委书记仍是周礼，组织委员罗振坤，宣传兼统战军事委员欧阳方。1949年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我们思想认识不足，加上地下工作的局限性，我们在工作中也出现一些缺点。1949年6月，我们向华中局报告了省工委的工作情况。华中局在肯定我们前段工作成绩的同时，也帮助我们指出了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地方，并作出了重要指示。这样，我们才更好地适应形势发展，配合人民解放军的进军湖南，进一步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促使程潜、陈明仁起义，实现湖南省会和平解放。

在恢复和发展党组织方面：抗日战争结束时，全省党员约700人。1945年10月到1948年10月，全省党员发展到约2000人。此后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和湖南人民革命斗争觉悟的提高，党组织发展很快。到1949年5月，全省党员发展到6000

多人。农村中有些地方发展党员时没有坚持党员标准。省工委曾提出从组织上进行初步整顿,在党员已经达到相当数量的地区,一般停止发展,进行教育巩固工作;在组织薄弱的地区,如湘南和铁道、交通、工厂等方面,仍可有重点地慎重地发展党员,建立领导机构。可是有些发展党员较多的地方,仍在继续发展。特别是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武汉、上海等地,继续挥师南下,国民党已呈败局后,要求加入共产党的人更多,也有极少数不够党员条件的人被发展为党员。

当时随着党员的发展,许多地方逐步建立党组织和领导机构。1946年7月,我兼任中共长沙县委书记,统管长沙市和长沙县党的工作。1947年7月,省工委决定在湘南地区成立湘南工委,谷子元任书记。1947年8月中共湘北工委在华容成立,书记谢介眉。同月,中共湘西工委在常德成立,书记方用。1948年一度成立中共湘东北工委,书记李峰,因情况变化未开展活动。1949年1月,在长沙县委的基础上分别组建长沙市工委和长沙县工委,长沙市工委书记沈立人,长沙县工委书记刘建安。1949年3月,中共广东五岭地委根据华南分局指示建立中共湘南工委,6月改为湖南地委,书记刘亚球,7月划归湖南省工委领导。1949年5月,中共湘中工委在湘乡成立,书记官健平。到1949年6月,全省党组织有很大的发展,建立了长沙市工委、5个地区工委、一个中心县委、28个县(市)工委,还有7个县建立区工委,党员发展到8000多人。

在省工委和各地党组织领导下,建立了一些党的外围组织和进步组织,如世纪社、新民主主义文化协会、新民主主义建设协会、工人解放社等。还有一些党领导的或与党有联系的公开“合法”的进步团体,如长沙市即有长沙学生联合会、新闻从业员互助会、小学教师互助会、妇女联谊会、湖南经世学会等。这些组

组织和团体中的积极分子,经过在斗争中考察培养,合乎党员条件的都吸收为党员。

在武装斗争方面:1949年5月以前,特别是1949年1月至4月出现和谈气氛及国共和谈期间,省工委主要做军事策反和建立两面武装的工作。原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同志曾提出湖南主要在湘南地区搞武装斗争,在敌人统治力量较强地区不要轻易搞武装起义的意见。因此前一时期没有普遍开展武装斗争。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形势发展很快,群众革命斗争觉悟提高,各地除党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外,还出现不少自发性的武装起义和国民党地方军警的起义。对这些自发性起义,党组织都有责任进行调查了解,或加以领导,或进行联系,防止他们被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和土匪利用,制造混乱,骚扰地方。还有一种情况,即由外地党组织领导和联系的武装起义。如中共华南分局五岭地委、中原局社会部,还有江汉军区等,在湖南一些地方领导和联系武装起义,或进行军事策反工作。

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省工委加强军事工作。1949年4月下旬,上海局通过华南分局派欧阳方来湖南,参加省工委并主管军事工作,加强了对武装斗争的领导。5月初,省工委召开全省武装工作会议,发出“五四指示”后,全省党领导的武装起义蓬勃开展起来了,同时策动了一些国民党地方部队起义。主要矛头是反蒋(介石)反白(崇禧),打击蒋桂残余势力。但是,当时有的同志也提出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企图单靠湖南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提早解放湖南的不切实际的想法。省工委批判了这种错误想法。1949年6月间,发生了国民党三一四师师长陈达抗拒整编,率部起义,被白崇禧桂系军队打垮的事件。三一四师是程潜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后组编的一个师,都是湖南子弟、美械装备,为

程潜亲信部队，却被白崇禧视为眼中钉。这个师隶属一〇二军，师长陈达和军长成刚也有矛盾。白崇禧通过国防部，将长沙绥靖公署组编的两个军和另一个军，与陈明仁的两个军统一整编，重新组成第一兵团的三个军，撤销了三一四师的番号。陈达非常不满，不考虑对程潜的影响，轻举妄动，准备将部队带去湘西起义。在宁乡被桂系部队包围袭击，部队被打散。这个师的九四二团团团长是程潜的侄孙程杰，幸好他没有率部随陈达盲目行动，使白崇禧没有办法栽诬程潜。湖南地下党组织和这个师没有联系，但可以从这个师盲目起义和遭到失败中吸取教训。

1949年6月底，华中局派洪德铭和湖南省工委交通员刘尚文一道来长沙，向省工委传达党中央、华中局关于程潜起义和湖南迎接解放的指示。华中局根据中央精神和湖南情况作的指示非常重要。首先分析形势，指出人民解放军已经在数量上、质量上、装备上占绝对优势，有足够的力量消灭蒋介石、白崇禧的残余部队。因为发了大水，大军也需要适当休整，所以进军长沙要等一个月至一个半月，但解放湖南已指日可待了。因此湖南地下党的工作方针，要在促进程潜、陈明仁起义的同时，从发动武装斗争，破坏敌人统治，削弱和牵制敌人力量，转到发动组织群众，保护城乡，抓紧准备迎解、接管、支前等各项工作，以配合大军顺利地解放湖南，作为中心任务，把湖南完整地交给党和人民。根据这一方针和各大、中城市迎接解放的经验，华中局对湖南省工委迎接解放的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指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程潜起义问题：中央收到程潜准备和平起义的备忘录后，基本上同意程潜提出的各项要求，并已指示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组织代表团和程潜进行和平谈判，李明灏将参加谈判工作。希望程潜不要着急，特别是陈明仁要不动声色，不能有任何暴露。现在他还是国民党的第一兵团司令官，还得在表面上按照蒋

介石、白崇禧的命令办事，千万不能使蒋、白怀疑他。现在也不要搞什么“驱白”运动，也不必大张旗鼓地搞和平运动。这样做只会使蒋、白提高警惕，提早逼程潜下台，提早搞破坏活动，以致引起他们对陈明仁的怀疑。这对实现湖南和平解放是很不利的，千万不能疏忽大意。

二、立即停止到处武装袭击白崇禧军队和军、警机关的行动。党掌握的和受党影响的还没有打出旗号起义的合法武装，目前不要公开打旗号搞武装起义。根据其他城市的经验，敌人在溃逃前必尽其可能，大搞破坏、屠杀，破坏工厂、交通、学校和市政建设，给我们留下烂摊子。如果我们现在到处武装袭击敌人，就可能打草惊蛇，使敌人提早进行破坏、屠杀。现在的湖南必是人民的湖南了，要千方百计地避免破坏和损失。目前党的武装队伍（包括党掌握的合法武装）的主要任务不是到处袭击敌人，而是加紧训练，等待时机，为以后配合入湘大军进行战斗，作好准备工作，并尽力保护交通、资财和维持社会秩序，防止敌人和散兵、游勇、流氓的破坏。

三、要宣传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和党的各项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力组织工人、学生、市民，开展反迁移、反破坏，护厂、护校及保护交通、机关、档案和一切资财的斗争。要运用社会上的各种关系和各种形式，组织群众性的护厂、护校队伍，掌握应变机构，对城市进行保护。要使工厂、企业在解放时都能坚持生产，正常营业。要保证水、电、邮政、交通完好正常，不能中断。要组织力量，编造人、财、物的清册，为接管作好准备工作。解放大军一日未到，地下党组织仍处于敌人屠刀之下，一定要提高警惕，把党组织继续隐蔽好，不能让敌人狗急跳墙的破坏、屠杀阴谋得逞。不要勉强做那些暂时可不做而且有危险的事情。那些公开扭秧歌……等活动，必须坚决停止。

四、形势的发展有利于团结各界人士,瓦解敌人。要进一步加强统战工作,利用一切社会关系有效地开展策反工作。必要时,可由党员干部出面去搞一些关键部门、关键人物的策反工作(但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无充分把握时,要避免由党员负责,干部直接出面搞策反工作)。在真空时期,要组织强大力量,如基本群众的纠察队、人民治安队、护厂队和利用旧警察队伍等,维持社会秩序,打击特务、流氓、溃兵的破坏活动。对于冒称解放军、地下党胡作非为的人,必须坚决制止,予以打击。

五、解放前夕放手组织迎接解放的群众队伍是必要的,但目前党的省、市、县领导机构不要公开出面,即使敌人已经完全撤退,在解放军未入城之前,还是要用群众团体的名义,去组织迎接解放的各种活动,地下党组织不宜直接出面指挥。

六、立即停止发展新党员。严防投机分子和坏人混进党内、党的外围组织和党领导的武装队伍。

七、要抓紧党内的政策教育、组织纪律教育。解放大军到湖南后,地下党组织一定要服从领导,紧密配合,协助他们完成好接管任务。

洪德铭同志在和我个别谈话时,还谈到华中局委员、组织部第一副长钱瑛同志肯定了湖南省工委前段的工作,特别是认为省工委对促进程潜等人起义的工作很重要,有成绩。同时钱瑛同志指出:省工委有的同志提出“放手组织,放手发展,搞人搞枪,搞湖南式的解放”的口号和作法是不妥当的,如果布置和贯彻下去,会发生不好的作用,甚至可能影响湖南和平解放的大局。目前在实际工作中还没有出现大偏差,必须停止执行,立即纠正。

省工委认真讨论了中央指示精神和华中局的指示,并作出了几项规定:一、立即向各地党组织进行传达,切实贯彻执行。二、立即通知各地党组织停止武装起义和袭击敌人的部署。三、

一般停止发展党员,加强教育,巩固组织。四、原先由上海局(后华中局)领导的长沙特别支部合并到长沙市工委,干部统一安排,长沙特别支部在外地的党员关系交给省工委。五、长沙市各战线和各基层党组织抽调党员,抓紧调查国民党军政机关和重要企事业单位的情况,掌握人、财、物等各方面资料,以便接管。随即省工委又将中央和华中局有关指示精神,转告程潜。

7月初,省工委根据华中局指示精神和湖南情况,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作好准备,迎接解放的指示。省工委在指示中指出:由于我解放大军占有绝对的优势,湖南即将解放。今天的问题不在军事上如何提早解放湖南,而是按预定计划,力争消灭桂系军队于湘境,尽量避免损失和破坏,以便达到完整地解放湖南与接收湖南的目的。在这种形势和任务下,湖南党的目前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是而且只能是掩蔽力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解放军行动。我们不要过早地广泛地发动武装起义,到处袭击敌人,暴露基本力量,以致刺激敌人进行破坏和摧残;而是要在解放大军入境、敌人开始撤退的时机,发动一切力量,配合大军行动,消灭桂系军队于湖南境内、接收湖南的任务。根据这个方针,首先应积极策动国民党各派系的武装和一切反蒋反白的力量,作好准备,以便配合解放大军消灭桂系军队。对一切民变武装,不能采取不理的态度,必须在方针政策上给予指导。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维持地方秩序,其组织纯洁的并可派人去领导。对于我党领导的武装,已经发动的应坚持下去,还未发动的则应继续隐蔽,等待时机。其二,广泛发动、组织和教育群众,开展反迁移、反破坏、反紊乱斗争,号召各阶层人民团结应变,维护秩序,保管城市、财物、厂矿、交通、桥梁、农村粮食,以达到完整地接收湖南。要发动群众,组织警察,依靠社会力量,成立治安组织,维持社会秩序,制止混乱和破坏。要严明纪律,严禁冒

牌,对于一切资财只有看守保护之责,而无接收分配之权,以待军管会接管。省工委的指示还提出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准备接管;支援前线;加强党的建设,做好教育和审查党员工作,准备解放后分配工作;进一步做好统战策反工作,扩大同盟军,分化瓦解敌人。为迎接解放,省工委还要求全体地下党员,认真学习、宣传和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虚心地向南下进入湖南的解放军和解放区干部学习,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作风和工作经验,尊重他们的领导和意见,共同做好接管、支前工作,建设新湖南。

当时由于地下工作环境,不可能很快将华中局的指示精神层层传达下去。武装斗争方面,湘中工委、湘西工委、湘南工委等党组织在接到省工委派专人通知后,都停止了党领导和策动的武装起义,所有武装待机配合大军南下,解放各地。至于一般停止发展党员,也有一些基层党组织没有及时接到通知或没有接到通知,仍在继续发展。

到1949年9月,全省党员发展到一万多人,其中有极少数不够党员条件。解放后经过审查和考验,绝大多数地下党员是好的,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继续发挥了作用。

1949年7月后,省工委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将工作重点转向促使程潜、陈明仁起义,开展群众性的反迁移、反破坏、反紊乱斗争,作好准备,迎接解放。

和平解决湖南问题

黎明前的黑暗是短暂的，但解放前夕的斗争却是非常激烈的。我们坚持斗争，紧张工作，促使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和平解决湖南问题。1949年7月5日，人民解放军到临湘县后，按兵未动。待程潜和第四野战军取得联系并催请部队南进后，人民解放军随即于7月18日至21日，连日解放平江、浏阳、岳阳、华容等县，接近长沙。程潜、陈明仁积极准备和平起义。湖南人民迫切要求和平解放。白崇禧则要把长沙变成四平街第二，命陈明仁坚守长沙；同时为了防止程潜起义，采取调虎离山之计，想方设法将程潜调离长沙。这时我们还从准备随程潜起义的原军统局主任秘书张严佛那里得到消息，国民党保密局派了特务来长沙，准备杀害程潜、程星龄和一些准备起义人员。一场起义与反起义的斗争，进入激烈而又微妙的最后阶段。

7月14日，国民党广州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贾景德乘专机来长沙，名为慰问湖南水灾灾民，实为敦促程潜赴广州就任考试院院长，并借口请程潜去广州，调解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的矛盾。程潜在湖南和平起义关键时刻，坚决拒去广州任职，婉言谢绝。15日贾景德即飞返广州。

白崇禧见此计不行，又生一计。他对与桂系有渊源并安排为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唐星说：长沙就要成为第二个四平街了。我决定移驻衡阳总部，这里就由陈子良（即陈明仁）负责。湖南地

方部队可以随颂公到广西去,以免临时陷于混乱。请你向颂公报告一下,准备早点离开此地。”把程潜和湖南地方部队搞到广西去,这正是程潜最担心的事。唐星和我们早有联系,是支持程潜起义的,也就将计就计,对白崇禧说:“湖南地方保安部队和其他正规军在10万人以上,若拿来维持地方秩序,暂时还可以起作用;若一调动,地方就会大乱起来,共产党游击队就会到处出击,连陈子良都会站不住脚。再说,把这10来万七七八八的队伍调到广西去,只怕广西那个穷地方也养不起,就连你的这些作战部队后方的交通运输,也会搞得混乱不堪。这都是兵家之忌呀!”白崇禧点点头说:“你说得有道理,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不过颂公和这些部队,也不能让他们当俘虏,总得想个妥当的办法才好。”于是唐星提出建议:“依我之见,湘西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芷江又有公路通云、贵、川各省。我和颂公可以先到邵阳,邵阳战事紧急时再去芷江。万一到了湖南和广西都顶不住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到大西南去会师。”白崇禧马上同意了唐星提出的这个计划,并决定湘西设长沙绥靖公署指挥所,由唐星负责指挥。

唐星将会见白崇禧的情况向程潜报告后,程潜也就采取权宜之计,于7月21日上午离开长沙去邵阳。白崇禧亲自将程潜送走后,才放下心来,当天下午即乘专机去衡阳。他这个“小诸葛”,这次却没料到上了大当。程潜去邵阳不到10天,便于7月29日秘密返回长沙,8月4日宣布起义了。程潜没有被白崇禧挟持去广西,这是唐星立下的一大功劳。当时余志宏将唐星的计划告诉我后,我认为这个计划很好,并派地下党员张立武随程潜去邵阳,以便随时联系。

7月16日晨,第四野战军派来长沙的干部刘梦夕在程星龄陪同下,和程潜晤谈3个小时,听取了程潜关于起义的意见并商量了行动步骤。程潜谈了几件事:白崇禧决定由陈明仁守卫长

沙；15日晚，程潜和陈明仁会商，陈明仁已下决心随程潜起义，程潜可以对陈明仁的一切负责；程潜已拒绝去广州；这避免白崇禧疑心，准备在白崇禧离开长沙前暂去邵阳；起义时，要求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或国民党人民自卫军名义出现，以便对西南有所号召。

刘梦夕当天通过地下秘密电台，将他和程潜会谈情况电告第四野战军领导。林彪、邓子恢随即于17日将会谈情况电告中央军委。18日，中央军委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拟稿的复电指示：在程潜、陈明仁等宣布脱离伪中央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出现，以便给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以打击。俟我们占领湖南各要地后，将其部队交我们整编。我们现在不怕程潜仍挂国民党名义，因他挂此名义利于暂时团结内部，又利于在政治上给蒋、桂以打击。我们也不怕他挂人民解放军名义，因为不久该部即可被我们改编，而且挂了此名义，即区别于蒋、桂的国民党。复电并说：我们已经过我们在长沙的电台转告程潜，我军从侧面占领平江、浏阳，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暂不占领长沙，以利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叫程潜及有关各方保持镇静，不要恐慌。但长沙、益阳、宁乡、湘潭、湘乡、衡山、衡阳诸县及粤汉、湘桂两路沿线地区，两星期内，程潜必须和平交出，以利我军进驻和攻击桂系。……这些都需你们派代表数人（其中应有李明灏）与程潜代表数人举行会议商谈确定，并组织联合机构，然后行动。

程潜通过中共中央设在长沙的地下秘密电台，接到中共中央军委上述通知，知道人民解放军即将进军湖南，对长沙取钳形包围态势，暂不占领长沙，以便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后，即和陈明仁会商起义事宜。他们对长沙防务作了妥善应变部署，派程潜的侄孙、新调任一九七师副师长兼五九一团团长程杰，在平

江、浏阳到长沙必经之地的黄花市至永安市一带布防，并秘嘱程杰，在共军接近时不能放一枪，要尽可能避免冲突。然后程潜去邵阳，并准备在适当时机，返回长沙起义。

7月23日，我们看到当天长沙报纸报道了代省主席陈明仁在省政府的讲话。就在程潜和白崇禧走后第二天，7月22日上午，陈明仁召集各厅、处留长人员200多人开会。他说：“程主席出巡外地，本人奉命代理，一切秉承程主席的意志办事。目前时局看起来很严重，长沙周围的平江、浏阳已被共军占领，大家会认为长沙岌岌可危。今天我可以明白而负责地告诉各位，只管安心工作，不必顾及安全。我敢说，长沙什么时候都没有危险……我是湖南人，我祖宗的坟墓在湖南。我决不逞个人的意气，而牺牲三千万湖南人民和五十万长沙市民的利益。这就是说，如果拿个人的意气守长沙，长沙就会变成四平街第二。可是我决不使长沙变成焦土，要打，一定在长沙郊外打，不在市区内作战。我保证：长沙不会听到枪声。”

陈明仁有军人气概。个性虽强，但有心计。他在公开场合，一直以反共主战面貌出现，蒋介石、白崇禧都信任他。他在白崇禧走后公开说的这番话，语意双关，可战可和，至少立下了不会让长沙变成四平街第二的诺言，让长沙人民在程潜走后惶惶不安的心情，暂时缓和一下。

7月22日，第四野战军派出的以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为代表的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平江。程潜派去汉口和人民解放军联络的刘纯正，随代表团到平江后即回长沙向陈明仁汇报了他和人民解放军联络的情况，并将人民解放军和谈代表团希望程潜方面也派出代表团，准备和平谈判的意见，转告陈明仁。陈明仁知道李明灏到了平江，27日派程星龄（代表程潜）、李君九（代表陈明仁）去平江和人民解放军联系，

并邀请李明灏先来长沙商谈。省工委委员欧阳方也和程星龄、李君九一道去平江联系。省工委还派地下党员刘寿祺去邵阳,请程潜速回长沙,商谈和平解决湖南问题。陈明仁也急电程潜,请程潜立即返长主持起义。

7月29日,程潜由邵阳秘密返回长沙,李明灏也由平江秘密来长沙。程潜、陈明仁和李明灏一起,初步商谈了有关和平起义事宜。

这时,湖南和平解放经过长时间酝酿,已趋成熟。在省工委领导下,长沙市和各地方工委通过地下党组织、外围组织、进步团体,广泛宣传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和党的各项政策,发动群众保护工厂、学校、机关、交通设施和国家财产。针对白崇禧的空室清野,强迫搬迁,以及为了防止桂系军队、特务撤退时的破坏和散兵游勇捣乱社会秩序,还开展了群众性的反迁移、反破坏、反紊乱斗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同盟在湖南的地下组织,也都开展了反蒋反白,支持程潜起义的活动。

国民党广州政府和白崇禧此时为了防止程潜搞湖南局部和平,并利用陈明仁守长沙和共军大打一场,继续采取拉拢陈明仁,排挤程潜的方针。7月30日,广州政府正式任命陈明仁为湖南省主席,使他能集湖南军政大权于一身。对程潜则严加监视,必要时置于死地。程潜于29日秘密返长,白崇禧和广州政府很快就知道了。白崇禧在当天晚上打电话给陈明仁,要陈明仁注意程潜返长的活动。第二天白崇禧又发绝密电报指示陈明仁:“程潜率武装人员潜返长沙,图谋不轨,着即剿除护卫武装,实行兵谏,迫其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长。”

8月1日,广州政府派国防部次长黄杰、政工局长邓文仪乘飞机经衡阳到达长沙,会见陈明仁,一方面鼓励陈明仁坚守长沙,一方面表示迎接程潜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长。邓文仪还将蒋介石

石的一封信交给陈明仁。蒋介石在信中表示信任陈明仁，并说如守长不利，可退守湘西；同时说什么“对卖身投靠分子，应羞与为伍，必要时，不惜大义灭亲，将之明正典刑。”也就是指示陈明仁，对程潜要采取强硬手段。陈明仁应付这两位中央大员说：“颂公近日去邵阳巡视，行踪不明。”随后第一兵团代理参谋长黄克虎和副参谋长陈庚商得一计，由陈庚去向陈明仁报告，说共军推进到黄花市以西，离长沙只有十来公里，市郊和飞机场附近出现游击队，似有破坏机场企图。黄杰和邓文仪听为一惊，赶快乘专机飞走了。

7月底，经地下党组织和民主党派人士的发动、串连，省会各界知名人士积极参加呼吁和平签名。在8月1日、2日的长沙《中央日报》、《晚晚报》上，刊登了500多人签名的《长沙各界为拥护当局主张避免战祸呼吁和平宣言》，号召各界同胞团结一致，誓为程潜主任、陈明仁主席作后盾，力争湖南局部和平的实现。此后，湖南和平解决问题的局面日渐明朗。

8月3日晚，省政府新闻处长刘伯谦以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的发言人的身份，在长沙《中央日报》社的会客室举行记者招待会。首先宣读了程潜的《答记者问》，为程潜由邵阳返长沙时被解放军俘虏的谣言辟谣，宣布程潜认为湖南只有和平解决问题，为人民迫切需要的真和平而努力的主张。接着向到会人员散发了印好的程潜8月1日向全国呼吁和平的通电。

程潜在呼吁和平通电中说：“……行政院以中共和平条件征询各省意见，潜即主张全部接受。乃经代表磋商之后，不征各省同意，遽予反对，惟逞私人意气，置全国人民利益于不顾。旬日之内，首都倾覆，师徒挠败，措置无能，古所未有；尚欲困守一隅，残民以逞，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湖南在抗战期间，负担最重，破坏最剧。连年水灾惨重，救死不遑。潜呼吁罔闻，维持无术，数月以

来，神形交瘁。近顷共军南下，桂系军队复不战而退，麇集全湘，念凶危，立即化除成见，继续和谈”，“以为今之秉政者，苟犹有丝毫之天良未泯，当能翻然憬悟，立致祥和。粤、桂、川、康、滇、黔、甘、宁、青、新各省人民，求安厌乱，同此心理。务望一致奋呼……慎毋再为反动宣传所误，甘自绝于和平康乐之途。”程潜这一通电，对西南西北各省都有重大影响。

程潜随即于8月3日发电报给毛主席、朱总司令，提出：即将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拟权宜之计，暂设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由程潜、唐生智、陈明仁、仇鳌、唐伯球任委员，并推程潜为主任委员。同日由军政委员会推定陈明仁任湖南省政府临时主席，并决定第一兵团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推定陈明仁兼司令官。

8月5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在给程潜、陈明仁复电中说：“为对抗广州伪政府；为维持湖南秩序，稳定军心，便利谈判；为号召各方面，所提设立由颂云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子良将军的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临时的省政府主席，及临时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可即施行。”“总之，凡对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的事，均可商量办理。此次两先生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解放事业，大义昭著，薄海同钦。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陈明仁个性很强，比较注重权位。李明灏在8月3日给林彪、邓子恢电报中，介绍了陈明仁的性格，并说“此次湘事之解决与应付桂系之压力，陈力最多”，建议中央在电报上予以鼓励。因此，毛主席、朱总司令给程潜复电中将程潜、陈明仁并列。

8月4日，程潜发表《告湖南民众书》，正式宣布脱离广州政府。当天由《国民日报》发出号外，全文刊载。接着，由程潜、陈明仁领衔，37位将领联名发出通电，宣告湖南和平起义。程潜在

《告湖南民众书》中说：“我对广州政府及白崇禧等，已经尽了最大的容忍，进了最后的忠告。我劝他们赶快放下屠刀，立即停战议和，切勿再以人民作为赌注。可是他们执迷不悟，定要同归于尽。”“现在我们已经根据中共提示的国内和平条款，在长沙成立和平协议，正式宣布脱离广州政府，使湖南获得和平的解放，藉以减轻人民痛苦，避免地方糜烂。大家一向热诚要求和平，现在和平到了，大家应当拍手欢迎。在湖南境内，桂系军队和蒋介石路线的某些反动分子，仍是和平的障碍，大家要起来肃清他们，然后再把和平引向西南和西北，使全国迅速实现和平，永远根绝内战……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富强、康乐的新中国。”

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的起义通电说：“八年抗战，民力已尽。方期休养生息，和平建国，谁料蒋（介石）与好战分子破坏政治协商会议，重启内战。外则勾结美帝国主义，不惜丧权辱国，内则肆行独裁，变本加厉，豪门聚敛，贪污横行，结果经济崩溃，军民离心。蒋既被迫退位，李宗仁代为主政，和谈重开，举国喁喁。”“孰知言和实所以备战，阴谋欺骗，恬不知耻。故南京政府旋踵即告倾覆，流亡广州，生意早绝，残骸仅存。”“潜等顺从民意，呼吁和平，声嘶力竭。而蒋与李、白执迷不悟，仍欲以我西南西北各省为最后之孤注。用是忍无可忍，爰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八条二十四款，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依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所望我西南、西北各省同胞，洞察蒋与李、白坚持内战，祸国殃民之罪恶，以人民之意旨为意旨，以人民之利益为利益，一致响应，奋起自救，铲除此倒行逆施之残余封建政权。全湘军民，誓为后盾。”

唐生智、周震麟、仇鳌、曹典球、龙绂瑞等湖南耆宿和各界知名人士 100 多人，也于 8 月 5 日联名发出通电，响应程、陈二将

军起义，欢迎湖南和平解放。

因发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起义通电迟至 8 月 15 日收到，毛主席、朱总司令于 16 日复电。复电称：“程潜将军、陈明仁将军及全体起义将士们：接读八月五日（注：应为四日）通电，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已成全世界公认的定局。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残余匪党不甘失败，尚图最后挣扎，必被迅速扫灭，已无疑义。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尚望团结部属，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

迎 接 解 放

1949年7月下旬,在白崇禧去衡阳,陈明仁部控制长沙后,长沙市工委开始在火后街8号集中办公,指挥全市迎接解放的工作。随后,省工委秘密机关也由麻园岭迁至湘雅医学院内办公,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决策和指导。

这时,和平解放省会长沙已成定局。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时候,长沙市发生一些混乱现象。一、国民党特务和死硬分子作垂死挣扎,他们造谣污蔑,蛊惑人心,暗中进行破坏活动。二、社会上一些坏分子招摇撞骗,敲榨勒索,有的甚至假借名义,出售什么“迎解证”,收受什么“迎解捐”,等等。三、在长沙做地下工作的,除省工委系统外,还有其他方面派来的人员,各民主党派也在进行活动,他们中有的对当前形势和长沙实际情况不甚了解,行动不统一。由于以上原因,使长沙市民人心惶惶,真假难分,不知所从。为了维护共产党政策的严肃性,维护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威信,制止混乱现象,安定人心,做好迎接长沙和平解放的工作,省工委采取了以下几项紧要措施。

7月底,省工委由委员欧阳方通过各方面的统战策反关系,召集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开会,说明当前湖南和平解放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强调统一步骤和统一行动的必要性。会上并宣布三条:一是一切行动要听从省工委的统一领导。二是不得违反我党、我军公布的各项政策。三是制止一切不法行为。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迎接解放,省工委于7月底决定成立长沙市人民临时治安指挥部,涂西畴任政委,姜和瀛(宪兵第十团团团长、民促社成员)、刘鸣球(湘东师管区补充第四团团团长、民促社成员)为正副指挥。由宪兵第十团、湘东师管区补充第四团和长沙自卫总队、省会警察局等与地下党有联系的武装和警察,维持社会秩序。8月1日,省工委统战策反小组在坡子街聚兴诚银行召集姜和瀛、刘鸣球、刘人爵(省会警察局长)、胡之祉(长沙市政府常备自卫队队长)等开会。涂西畴传达了省工委关于成立长沙市人民临时治安指挥部的决定,以及保护城市人民、物资、交通设施的安全,和平解放长沙的计划与部署,研究了统一领导,分区布防,配合行动等问题。

8月3日,在长沙市工委领导下,由长沙学生联合会、新闻从业员互助会、小学教师互助会、交通事业工会联谊会、妇女联谊会等五单位发起,省会53个团体和单位组成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迎解联”),市工委委员刘晴波为党组书记,会址设中山东路省议会内,积极开展迎接解放的各项筹备工作。随后参加“迎解联”的团体和单位增加到230多个。

“迎解联”发出的宣言,指出长沙和平解放,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威力,人民坚决主张和平,程、陈两将军明智抉择的结果。“保全了五十万市民的生命财产,树立了西南千城市解放的模范”,吁请各机关、团体和各界同胞,“踊跃参加工作,为迎接解放而献出力量和热情,庆祝长沙的和平解放,维持秩序,保护公私产业,制止任何可能的破坏与混乱,协助接管,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解放军南下,消灭残余匪军,解放全中国”。

在8月4日长沙《中央日报》上,中共长沙市工委第一次公开出面,发布了迎接解放的标语口号84条。8月5日,根据省工委的指示,长沙市工委在长沙《中央日报》发出通告。通告中说

在解放军未进城之前，全市五十万人民团结一致，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公私产业，制止一切可能的破坏和混乱。希望各团体各界人民加强区域联防、警卫巡逻工作，服从治安当局指挥，检举匪特破坏分子；希望各级军警行政人员各安职守，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为人民立功。在军管会未成立之前，任何部队，任何人员，任何党派，对机关、学校、公私产业，只有看守保管之责，没有接收处理之权。这是我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纪律，凡冒名进行接管敲诈者，应报请治安机关缉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长沙市“迎解联”所散发的城市政策、工商政策、迎解宣传要点等文件，对我党的政策均有清楚明白的说明，敬希全市同胞，根据这些文件加以研究，接受我党领导，顺从人民政府法令，为迎接解放，建设新民主主义的长沙而共同奋斗。

1949年8月5日，这是一个令人激动难忘的日子！灿烂的阳光刚照耀麓山湘水，长沙市就出现湖南大学、克强学院、总工会、邮汇局、新闻界、妇联等单位的20多部大卡车，挂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大幅像，贴着红绿标语，敲锣打鼓，唱歌、呼口号，沿着市区各条马路街道，巡回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宣传长沙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本日就要进城了！

晚上11点钟，在长沙市50万人热烈欢呼解放声中，人民解放军一三八师由小吴门进入长沙市区。红旗飘扬的两部卡车，载着解放军文工团奏乐先行。接着以18支军号为前导，威武雄壮的解放军队伍整齐行进。长沙市民扶老携幼，夹道鼓掌欢迎。湖南大学和许多大、中学校的男女同学们、工人们，欢快地唱起来，舞起来，扭的扭秧歌，打的打腰鼓，耍的耍龙灯。到处是“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到处放鞭炮，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欢迎人民解放军！”“建设新湖南！”

8月6日晚,人民解放军和谈代表团进入长沙。程潜、陈明仁的代表和湖南军政当局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唐星,代表唐生明、刘公武、熊新民、刘云楷。和谈中熊新民、刘云楷改为彭杰如、王劲修),我和沈立人等省、市工委代表,“迎解联”主席团,各团体代表,前往东屯渡欢迎。“迎解联”主席团代表梁绮(地下党员、市妇联负责人)向人民解放军和谈代表团献了“人民救星”锦旗。湖南大学也献了“人民胜利万岁”锦旗。

在欢迎会上,金明同志热情讲话。他说:“湖南和平的实现,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无敌的胜利进军,以及湖南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与程颂云、陈子良两位将军毅然率部英勇起义的结果。我在此特向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湖南人民致敬,对程颂云、陈子良两将军及所部全体官兵表示敬意。对湖南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艰苦工作,争取和平解放表示敬意。今后,人民解放军将继续前进,解放两广,解放西南,解放中国。希望湖南三千万人民,全力支援战争;希望程、陈两位将军率所部官兵,在人民解放军的统一指挥下,努力作战,歼灭蒋、白残余匪帮,加速全国胜利的到来。我军愿与湖南三千万人民共同努力,为建设进步繁荣的新湖南而奋斗。”

从8月8日开始,人民解放军和谈代表团与湖南军政当局和谈代表团举行会谈,就湖南省政权机构和起义部队改编起义部队等问题进行协商。经过几次会谈,对正式成立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湖南临时省政府和改编等问题达成了协议。16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电陈明仁,仍请陈明仁担任湖南省政府临时主席。2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程潜任主任委员,黄克诚任副主任委员,肖劲光、王首道、唐生智、陈明仁、仇鳌、金明、唐星、唐天际、李明灏、周礼、袁任远为委员。8月中旬,起义部队约7.7万多人移驻浏阳整编。11月1日正式改

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陈明仁，政委唐天际。

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湖南省工委与随军南下的湖南省委合并，成立新的中共湖南省委。黄克诚、王首道、肖劲光、金明、高文华、周礼、袁任远、谭余保、唐天际、刘型、曹瑛、周小舟、武光、乔晓光、徐启华、宋新怀为省委委员，黄克诚、王首道、肖劲光、金明、高文华、周礼为常委，黄克诚为书记，王首道、金明、高文华为副书记。

8月25日，原南下湖南省委和原地下省工委在长沙市青年会电影院举行会师大会，庆祝新的湖南省委成立。大会由长沙市委书记曹瑛主持，周礼代表湖南地下党组织讲话，沈立人报告长沙市地下党的工作，肖劲光讲了解放大军南下形势。省委副书记王道道、金明等同志讲话，勉励南下同志和地下党的同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互相学习，加强团结，为建设新湖南而奋斗。

8月31日，程潜应邀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9月3日，陈明仁也应邀赴北平参加政协会议。程潜于9月7日抵达北平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柏渠等同志到车站热烈欢迎。程潜起义后，一直受到党和人民的崇高待遇。

9月13日至10月16日，人民解放军为了消灭白崇禧部主力，于衡阳、邵阳（宝庆）地区发动了衡宝战役。衡宝战役共歼敌4.7万余人。战役期间，湘中、湘西、湘南待解放地区的人民群众和游击武装，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抗丁、抗粮、抗捐、护厂、护路、护桥，积极配合解放军作战。已解放地区的人民，踊跃支援前线。

衡宝战役后，人民解放军继续向湖南尚未解放的地区进军，许多县和平解放，不久湖南全境解放。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昂首阔步,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

周里简历

周里，原名周策海，曾改名周礼。1903年11月生，酃县策源乡人。1924年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受到进步思想影响。1927年考入国民党湖南省党校，在这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合办的党校里，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

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发生，省党校也遭到反动团长许克祥部袭击，并被解散。周里回酃县凉桥家里，隐蔽地做恢复农民协会的工作。这年7月，由黎育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临时党支部书记。10月中旬，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到酃县水口，周里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作。毛泽东指示：农村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要多找满脚泥巴牛屎的人做朋友，把他们发动起来办农会，打土豪，分田地，搞武装斗争。1928年2月，成立中共酃县特别区委会，刘寅生任书记，周里任宣传委员。在特别区委领导下举行了酃县三月暴动，3000多农民参加。道任乡和中村一带还开展了分田运动。1929年周里任中共酃县县委书记、湘赣边界特委委员。1934年任酃(县)遂(川)中心县委书记兼新九营政治委员。

三年游击战争初期成立湘粤赣特委，陈山任书记，方维夏任宣传部长，周里曾任组织部长兼湘粤赣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后任特委代理书记。蔡会文任湘粤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在特委和游击支队领导下，管辖和开辟了包括湖南桂东、汝城、酃县、

资兴、江西上犹、崇义和广东始兴等十余县边界的游击根据地。蔡会文和方维夏等牺牲后，周里、游志雄等又率领游击队转战安仁潭湾等地。1936年周里任湘南特委书记。1938年春，湘南党领导的三支游击队，都编入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

1938年2月，重新组成湘南特委，王涛任书记，周里任组织部长。卢良任宣传部长，1940年9月周里再任湘南特委书记。1941年7月去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学习和汇报工作，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对他指示：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要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与反共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942年12月，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等撤离商湖南赴延安，湖南省委改为湖南省工作委员会，周里任书记。

1944年5月周里第二次去南方局汇报工作。回湖南后遵照南方局的指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派地下党员去湘南、湘中等地组织抗日游击武装。周里并在湘潭韶山一带组织指导抗日游击队工作。

1945年7月底，八路军南下支队进入湘潭。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与省工委书记周里等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湘中地委，周里兼任书记；第四支队留在湘中一带协助地方党组织开展抗日宣传和敌后游击战争，周里兼任第四支队政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南下支队北返。10月，周里在长沙召开省工委会议，确定近期的工作是重新进入城市，领导工人、学生、平民开展民主运动，继续抓好农村工作，在全省范围内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组织武装斗争。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省工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发动农民开展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的斗争。在长沙市，领导泥木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取得胜利，工人运动逐

步开展。

1947年4月,周里赴上海向中共中央上海局汇报工作。回湘后传达了中央关于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策略的指示,部署各地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

省工委以湖南大学为重点开展学生运动。1947年5月22日湖南大学1000多名学生举行反内战大游行后,周里专门召开会议总结这次游行的经验。他指出在学生运动中要依靠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带动后进势力,孤立顽固分子,湖南大学要联络各大学、中学学生一起参加斗争。6月2日,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长沙市第一中学等校3000多名学生,高呼“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1949年4月7日,长沙市各大、中学校学生和市民上万人,举行了声援南京“四一惨案”争取真和平大会,会后游行示威。此时长沙和岳阳、南岳等地学生运动达到了高潮,影响遍及全省。

1947年,省工委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国民党统治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先行部署湘中和湘南、湘西、湘北各级党组织配备军事委员,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继1947年10月桂东县郭名善在中共广东五岭地委领导下发动沙田一带农民武装起义后,1948年1月湘潭县特区工委领导张鹏飞武工队起义,1949年2月宁乡县姜亚勋、李石敏等领导黄绢一带农民武装起义后。5月初,省工委召开全省武装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党组织在农村中发动武装起义,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湖南。省工委在长沙开办了军事学习班,周里和省工委军事委员欧阳方等组织学员学习党的政策和武装斗争知识。省工委还派了一批湖南大学党员学生,到游击队去做政治工作。全省解放前,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发展到3万多人。

从1946年到1949年6月,省工委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先后建立了长沙市工委、5个地区工委、1个中心县委、28个县(市)工委,还有7个县建立了区工委,党员由700人发展到8000多人。省工委曾决定整顿党组织,暂不发展党员,但有些地方仍在发展。并存在忽视质量现象。

省工委在1948年7月程潜回湖南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后,成立了统战策反小组,余志宏任组长,由周里直接领导。周里多次和程潜的族弟程得龄见面商谈做争取程潜的工作。为了使程潜能掌握军事实力,并通过刘斐向白崇禧建议,将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从汉口调来长沙。以后又派余志宏先后与程潜和陈明仁见面,阐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和共产党的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等政策。1949年6月,程潜写了决心起义的备忘录,由省工委转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党中央收到备忘录后,确定了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的方针,毛泽东并给程潜复电表示“极为佩慰”。随即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派出和谈代表团,与湖南军政当局商谈有关和平解放事宜。省工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破坏、反迁移、反紊乱的斗争,保护城市、厂矿、交通,积极准备迎接解放。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起义通电,8月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省会长沙,湖南宣告和平解放。

湖南解放后,周里历任中共湖南省常委兼组织部长,湘南区党委书记,湖南省副书记、书记,湖南省副省长,第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四届湖南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离休后,仍然关心湖南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任湖南省革命老根据地经济开发促进会理事长,为革命老根据地的建设和脱贫致富作出了贡献。

Vertical lin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后 记

这篇回忆录,记述了我在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 20 多年的历程。那些年代的许多激动人心的事件和人物,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常在我的记忆中出现,激励着我在党的指引下继续前进。我深深体会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不忘记过去斗争的艰苦,才能更珍惜今天的幸福,增强对党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不畏艰难险阻,坚持革命斗争,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由于他们用鲜血灌溉了革命之花,结出了胜利之果,才会有社会主义幸福的今天。我们应当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回忆录以个人的斗争经历为主线,叙述一些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回忆录是湖南省委党史委特邀顾问、研究员黎风同志,根据我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 20 多年的主要经历整理的。在整理过程中,得到杨准芝、周绍颐、吴开胜、周金海、肖泽华、肖一鸣、章友发等同志的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由于事隔多年,有的史实可能记忆不够准确,稿中难免有遗漏或有出入之处,请读者谅解,并予指正。

周 里
1990 年 9 月

